

雍阳代有才人出（代序）

李蔚兰

武清亦称雍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浑厚，于是名人辈出，英才荟萃，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纵观历史，曾出过封疆大吏、朝廷重臣；出过国学宗师、书画巨子；出过武林盟主、戏剧名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更是涌现一批又一批为国为民的时代英才。《英才风采》就汇集了众多当代英才大师。其中有桃李芬芳的名师、学贯中西的鸿儒、叱咤体坛的宿将、巨笔如椽的画家……他们有的出生武清，负笈远游；有的根在故土，入京建功。总之都是走出武清而有所成就的雍阳骄子、杰出英才。他们是中国的骄傲，是武清的骄傲。把他们的事迹收集起来，汇编成书，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说过：“正确的道路是这样的：吸取你前辈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俄罗斯文学史》第1406页）读一读《英才风采》这本书，可以让你知道，武清是个好地方，武清人真是了不起。特别是在武清出生的人们，将会十分欣慰地发现：在自己的身边，原来有那么多杰出的知名人士。真是不说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们为家乡的昨天和今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武清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劳绩。吸取这些前辈的一切，将使你获得更多的人文营养和精神力量，帮助你更好地往前走。

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智力资源的挖掘是无限的。请看，武清有那么多的英才，他们的智力资源，同样是人类重要的知识财富，也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经过我们的挖掘，弘扬开去，发扬光大，就可以转化为非凡的物质力量。

这是一本完全写实的书。它纯粹但并不单纯，它是文学作品但完全可以当做励志指南来读，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能从中得到大量的、真实的信息，从而嗅出人生成长的气味，收获一份难得的感动。

我首先被作者的真诚和执著所感动。他告诉我，利用三年多的时间，数百次上京下卫，走南闯北，在外采访，街头小馆仓促一顿，有时干脆忍饥挨饿，但收获的是精神慰藉。几年来，他的心思都被这些所采访到的家乡英才人物占领，日思夜想，欲罢不能，奋笔疾书，一吐为快。正是这上百位“熟悉的陌生人”，陪伴着作者，也激励着作者。因此，在这部纪实作品里，作者满怀对家乡英才深厚的感情，记载的不单单是一些事件，更多的是记录了他们曾走过的路，指明了一代人生命的路标，必将照亮又一代人延展的前行之路。这在充斥着虚饰浮嚣的当下社会，尤为可贵。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弘扬本地英才的影响，和一般地弘扬英才的事迹，还有着不一般的意义。因为这些名人就在我们的身边，他们离我们一点也不遥远，有的人还可能和自己有点沾亲带故。这样一来，他们的事迹更为可亲可敬，更容易仿效。

读一读这本书，对武清的读者来说，其积极影响比其他的名人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作者系武清区文联秘书长、区作协主席、《运河》文学主编）

梦系五环旗的篮坛宿将

2005年4月13日，中国篮球协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篮球至尊杯暨CBA联赛总冠军牟作云杯揭幕仪式，被誉为“世界体育史上最昂贵最豪华”由翡翠制作的“中国篮球至尊鼎”揭开神秘的面纱，中国篮球以九十二岁高龄的中国篮球泰斗牟作云老先生的名字为奖杯命名“CBA联赛总冠军牟作云杯”。该杯重约十公斤，底座套装一樽重达十五公斤、刻有“中国篮球至尊印”的翡翠印章。未来的CBA总冠军将流动收藏“CBA总冠军至尊杯”，每位冠军队员将获得一幅装裱过的“中国篮球至尊印”。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李元伟将第一幅“中国篮球至尊印”赠送给了参加揭幕仪式的牟作云这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

1913年牟作云出生在天津市武清黄花店的一个农民家庭，几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先后在育英小学、育英中学读书。上初中时，他已比同龄人高出半头，并且肩宽、腿长，更重要的是他对体育运动有着特殊的悟性和灵气。他既好动爱玩，又踏实不浮躁，对老师的指点，总要认真地琢磨，不仅成了学校的体育尖子，也是全市中学生中的知名人物。

牟作云不仅田径好，足、篮、排球等项目也样样都行。他当时还入选北平市中学生排球代表队。1928年，他考入北平育英中学，第二年就参加了全市运动会，获得了跳高、跳远、三级跳三项冠军。初三时，他人选校篮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得了冠军。高中二年级，牟作云又代表北平市参加华北中学生运动会，得了三级跳、标枪、跳远三项冠军，个人总分第一名，标枪成绩还打破了全国纪录。1934年，高中最后一年，他又入选国家篮球队，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获得亚军，冠军为菲律宾所得。没拿到冠军，牟作云很遗憾，但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队，也为中国人长了志气。在那一刻，他初步有了将来从事体育的想法，想到已经沦陷的东北，想到在日本铁蹄下的三千万同胞，体育也是可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学生流亡关内，当时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百米全国记录保持者刘长春也来到北平，借育英中学场地继续进行训练。牟作云也因之结识了这位旧中国田坛上的佼佼者。

牟作云的学习成绩也很好，高中毕业时，完全有条件报考名牌大学，从事任何专业的学习。但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国立师范大学（北师大前身）体育系，这主要是受清华大学体育教授、著名体育家马约翰先生的鼓励。他突出的体育成绩，自然会受到关心体育事业的马约翰的注意。马先生很喜欢这个极具体育才华的青年人，多次对他说：“你应该学体育，要立志改变国家体育落后的面貌。国家要富强，体育也是不可缺少的，你要为国家的体育事业做贡献。

北师大体育系聚集着一批当时杰出的体育人才，有袁郭礼、董守义、徐英超、曾仲鲁、郭毓彬、万福恩、王石卿、王耀东等著名教授。牟作云在名师们的培养下，如鱼得水，他不仅是篮球赛场上的“师大五虎”之一，而且学习刻苦，准备将来以体育报效祖国。

由于田径基础十分优秀，牟作云成为校篮球队前锋，很快又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优秀选手。1936年，柏林举办11届奥运会，牟作云无可争议地入选了。

代表团团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经费预算是 22 万法币，政府只拨给了 17 万，其余的要靠体育协进会四处化缘。不足部分还要靠球王李惠堂的足球队先期出访东南亚赚取一些门票收入补齐。为了节约开支，69 名运动员只配一名随队医生。

1936 年 4 月 10 日至 6 月 10 日，田径队、篮球队在清华大学强化训练两个月，由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担任总教练。

在马约翰教授大运动量的强化训练下，两个月就打破了 9 项全国纪录。

集训期满到上海后，放假一个月让大家做出国准备。哪知一些运动员在假期中被上海的款爷请去寻欢作乐去了，到出发时，有些运动员萎靡不振，气得马约翰捶胸顿足：“你们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东亚病夫’的帽子还想戴多久？！”

这件事给牟作云印象很深，他叮嘱自己要抵御社会恶劣环境，全身心投入体育事业。

6 月 26 日中国代表团乘坐意大利邮轮“康梯罗梭”号从上海启程。

近一月的行程，极大地消耗了体力。到柏林后，精神都未调整过来便仓促上阵。

结果与代表团事先估计大相径庭，只有符保卢的撑杆跳进入了决赛，但技术未发挥好，未取得名次，而足球队首场对英国就输了。

篮球队抽签结果是首战日本、次战法国、秘鲁、巴西，按当时各队实力，中国队完全可能冲进前 6 名。

当时留德华侨和留学生及驻德大使都纷纷来到中国代表团住地，要求首场必须胜日本队。教练董守义住进了医院，哪知这样的赛前施加压力给队员造成严重的思想包袱。精神一紧张，技术发挥不会正常，加之无教练临场指导，结果以 19：35 惨败于日本。

虽开局不利，但 8 月 8 日，仍小胜法国队，比分是 45：38、8 月 9 日，战秘鲁队又 21：29 输了。10 日，与巴西的交战，中国队已毫无斗志，以 14：32 惨败。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全军覆没！

更惨的是中国队被淘汰后，没钱回国，只能留在奥运村看别人比赛，等闭幕式。

闭幕式结束后，运动员必须离村。牟作云他们因为没有回国旅费，只能撤到柏林一个极简陋的小旅馆里去等钱。使大家愤愤不平的是，团长王正廷根本没到柏林来，带队的官员闭幕式后竟带夫人到美国旅游一番后飞回国内！

后来，还是靠使馆内工作人员募捐了一部分钱，李惠堂等人又拿出来一部分旅费，才得以买了车、船票原路返回。

当时的沮丧心情就别提了，六尺男儿的牟作云和伙伴们，望着茫茫大海欲哭无泪，满腹除了屈辱感还是屈辱感，牟作云痛心疾首地想：中国体育什么时候才能在世界之林崛起？……

厄运并未到此结束，第 11 届奥运会一结束，希特勒就撕下伪装进攻波兰，不久中国也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后，同学们四分五散。

家境贫寒的牟作云在大学读书时曾半工半读，在育英中学兼课外老师，事变后书没法念

了，他就去了育英中学教体育。

日本伪政权成立后，拟举办一个“中日满亲善运动会”，用来装饰门面。听说牟作云是篮球“五虎将”之一，参加过奥运会，就派人拉他参加代表团去东京。牟作云当即拒绝。

牟作云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便伪装成一个阔少爷，穿着西装革履，留着小胡子，坐头等车厢逃到了天津。在租界同学家住了一天，又乘船到了上海。本想继续去后方，但囊中羞涩，就住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宿舍里。

这时他才得知，他离开育英中学的当晚，日本宪兵队就来抓他。在旧中国，体育带给他的不仅是屈辱，还有杀身之祸……

牟作云逃亡到上海后，手中的钱也花光了。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马约翰教授。马教授不仅在奥运会代表团集训时接触过牟作云，而且是他就读的国立师范大学的兼职体育教授，给他上过一年多体育课。马约翰对青年人的爱心给牟作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向马教授求援。

这时，北大等校成立了西南联大迁到了昆明。于是他就给马约翰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境。马约翰果然很快给他回了信，鼓励牟作云来后方。这样牟作云从上海乘船辗转路过香港、越南河内才到了昆明。

马约翰热情地接待了他，安排他当体育教师。后来又让他到国立师范大学继续念体育系，以便拿到毕业文凭。毕业后联大正式聘牟作云为体育老师，从此他成了马约翰的得力助手。

当时西南联大校舍简陋，体育设施什么也没有。教授们全住乡村，每天步行很远来上课。马约翰一如既往地坚持学生必须上满四年体育课，成绩及格才可以毕业。他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徒手操、军事操练、跳障碍物、爬墙等体育课程，让学生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锻炼坚强的意志品质，以便为民族救亡冲锋陷阵。

牟作云担任的课程很重，每天五六节课，但他教课一丝不苟，所以马约翰很喜欢这个有强烈上进心的年轻人，做什么事总让牟作云当助理，牟作云都做得很出色。他虚心好学，经常登门向马约翰请教，几乎每周都要到马约翰家开会，研究帮助昆明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计划。时间一长，他和马约翰家的人全都很熟悉了。

马约翰的二女儿马佩伦，是云南大学毕业的中学英语教员，性格热情开朗，有一副银铃般的好嗓子，他和牟作云常一起出去参加体育活动、看电影……后来两人就不愿再离开了。

1944年4月，牟作云和马佩伦举行了婚礼，牟作云成了马约翰的爱婿兼助手，这使中年失掉长子和长女的马约翰夫妇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慰藉，而牟作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耳濡目染马约翰的学识风范。抗战胜利后，马约翰推荐牟作云去他的母校——美国春田体育学院学习。

在这篮球发源地，牟作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体育行政、体育统计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员健康检查与治疗等课程；主修了初级篮球、中级篮球、高级篮球的训练理论，为将来振兴祖国篮球事业拼命武装自己。牟作云在美国还有机会观摩了世界一流的篮球比赛，使他不仅学习了美国篮球教学方法，也了解了篮球队的训练方法，大大开阔了视野。

正当牟作云在春田拿到学士学位向硕士学位努力时，国内因准备参加1948年奥运会而催他火速归国担任篮球队教练，为雪柏林奥运会奇耻，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国。

不想等待牟作云的却是厄运，他回国才知道篮球队教练已换了别人。马约翰看到被自己召回的爱婿报国无门，毅然辞去代表团总教练，以抗议当局不顾国家荣誉出尔反尔的行径！

北平解放了，牟作云见到不少体育工作者去问马约翰：“共产党还要不要体育？”

马约翰十分坚定地回答：“当然要，体育不可能取消！”

事实很快验证了马约翰的预见：新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体育，而且要像抓其他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一样抓出名堂来。

194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接到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和第十届大学生运动会组委会及主办国匈牙利的邀请。经周恩来副主席报请毛主席同意后，决定派一个150人左右的大型文艺体育代表团前往。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和从清华走上革命道路的团中央秘书长荣高棠，去拜访老师马约翰，请牟作云出任联欢节中国代表团篮球队的领队兼教练，马约翰爽快地答应了。

牟作云连续奔波，经过几个月反复筛选，到6月底，从京津两地选拔出8名选手组成代表队参加培训。

离成行还有一段时间，代表团早早组成。起初，团长是廖承志，副团长是杨尚昆的夫人、剧作家李伯钊。代表团临出发前，由于廖承志有其他重要任务，改由肖华将军任团长。1949年7月2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那天，大家早早列队等候，当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走进来时，人们拼命鼓掌，许多人流下了热泪。毛主席特意走到篮球队员面前，风趣地指着他们说：“还是你们高大威武。我打篮球不行，踢过足球，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当过守门员。”毛主席又一一握着队员们的手，勉励他们：“出国比赛很辛苦，记住，你们是代表新中国的，一定要为国争光。”领队黄振声、教练牟作云向毛主席一一介绍队员的情况。当介绍到程世春、张文仁是天津队员时，周副主席笑着补充道：“天津是篮球之乡，曾涌现出名扬海内外的‘南开五虎’。”“好！‘五虎’就是不怕外国人，你们就是要有种虎劲，‘东亚病夫’的帽子将从你们开始把它扔掉！”毛主席再次鼓励大家。

8月初，牟作云随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率篮球队坐火车经莫斯科抵达布达佩斯。1951年他又率篮球队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1952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通过了邀请新中国参加第七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决议，荣高棠接到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佛兰凯尔的邀请电时，距奥运会开幕式只有几个小时了。没有集训，没有时间做充分准备，这样仓促上阵能赛出好成绩吗？如果篮球队重蹈1936年奥运会惨败的覆辙，自己又怎么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呢？

牟作云想来想去，觉得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发出的这张迟到的邀请真是出了道难题，不仅是体育难题，还有政治难题，因为他们同时也对台湾发出了邀请……

基于这些考虑，本来在会议上大部分人倾向放弃这届奥运会，荣高棠将报告打了上去，周总理却批示“要去。”

军令如山，牟作云火速调兵遣将，选拔好篮球队人马，自己夜以继日地投入了训练。

7月23日深夜，牟作云在荣高棠带领下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他第一次当面聆听周恩来指示。周恩来说：“关于你们担心台湾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问题。据我看，现在他们尚未到达，也就不一定去了。即使想去，你们走北路也会比他们先到。总之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的三架伊尔-14型小飞机，7月24日凌晨5点起飞，到达赫尔辛基已是29日上午11时。

中午，在奥运村为中国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看升国旗、听奏国歌，对牟作云来说，更有一种感染力，他不禁热泪盈眶，感到灵魂接受了一次洗礼……

来自全世界的记者把镜头对准五星红旗，对准这庄严的仪式，对准致欢迎词的组委会副主席马托拉将军，对准中国体育代表团40人的队伍……在此时，牟作云才进一步理解了周恩来的政治眼光。

果然，台湾当局得知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进村，取消了参加此届奥运会的计划。

遗憾的是代表团到达的时间太晚，错过了足球、篮球的预赛，只有吴传玉第二天可以赶上仰泳预赛。预赛游出了1分12秒3的成绩。虽然没取得决赛权，但在奥运会上留下了新中国运动员的第一个纪录。

看到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苏联取得了与世界体育大国——美国平分秋色的好成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敬羨之余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新中国的体育怎样迎头赶上去？！

40年后，北京奥申委代表团200多人乘专机飞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将在这里召开，会上将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此时已80岁高龄的牟作云作为奥申委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也随团乘专机飞上万里云空。望着窗外湛蓝的天、雪白的云，听着代表团里李宁、邓亚萍、李小双、伏明霞这些年轻运动员的欢声笑语，饱经沧桑的牟作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要一鼓作气地申办2000年奥运会了，是不是在做梦？

这的确是个梦，这个梦中国人做了近一个世纪。1932年，第10届奥运会上，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只有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1936年第11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虽然全军覆没，但留下了牟作云这些立志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火种。1952年中国终于争取到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后来一些敌视新中国的反华势力，在国际奥委会里制造“两个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为此，中国不得不于1958年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和8个国际体育组织……

1979年，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敞开后，国际奥委会在主席基拉宁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主持下，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的决议。

中国又回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1980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提出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中国奥委会和国家体委讨论通过的三名候选人中排在第二名的就是牟作云。

牟作云所以能获此殊荣，是与他对中国体育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

解放初期，他带的中央体训班培养出了大量人才，第一个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的游泳选手吴传玉、打破最轻量级世界挺举纪录的陈镜开和打破世界女子跳高纪录的郑凤荣都是这个班的学员。

1956 年任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的牟作云，为振兴祖国篮球事业呕心沥血。在他的主持下，球类司制订了国家篮球竞赛等级制度、教练员等级制度、裁判员等级制度。他还投入大力气抓全国甲乙级教练员培训工作。每个甲乙队的年度训练计划，他都亲自过目，检查该队训练大方向对不对。他还提出教练员升级时必须写一篇对篮球训练的体会与设想，作为评选等级的根据。与此同时，牟作云还把统计学运用到训练比赛中，如全国甲级联赛，抢篮板球抢多少次？投篮命中率多少？罚球命中率多少！……既有统计又有分析，注重训练科学化。

事实证明，这一套科学可行的规章制度、训练方法对中国篮球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篮球队逐渐超越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和菲律宾队，而且还曾战胜欧洲强队。

牟作云曾率领中国篮球队出访过 40 多个国家，不仅锻炼了球队，也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谊。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我国与菲律宾尚未建交时；曾经获亚洲篮球冠军的菲律宾队来华比赛，结果输给了中国队。随后牟作云又率团回访，马科斯总统在总统体育馆里邀请牟作云与他打壁球，通过广播实况，在菲律宾引起广泛良好的影响。

翌年，牟作云率篮球队访问日本时，曾得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接见。1978 年，牟作云率队访问了美国的 5 个城市，在华盛顿两场比赛都赢了对手，在纽约也打得不分上下，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官方给予球队很高的礼遇：卡特总统的母亲热情亲切地接见了球队；美中文化交流协会将一支刻有“体育大使”字样的笔赠送给牟作云，称他们是继乒乓外交后又一个开展两国人民友好活动的使者。

牟作云退休了，国际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委员（世界只有 6 人获此殊荣），亚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主席。

在蒙特卡洛举行的中国申奥新闻发布会上，身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特向各国记者介绍了牟作云：“这次来的还有我们老一代体育工作者牟作云先生，他是我国篮球宿将，曾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会”这时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牟作云的镜头。

投票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当听萨马兰奇主席说出了“悉尼”时，牟作云惊愕万分，不禁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当时，牟作云甚至想到，也许他今生会留下一个巨大遗憾：不会见到在自己祖国举办奥运会！没想到 7 年后的 2001 年，中国申奥就取得了成功！

国学大师、布衣学者 张中行

张中行先生 1909 年出生于武清河北屯镇石薄庄村一个普通农家，1931 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193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中学、大学，主编过佛学杂志。1951 年 2 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长期以来张老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年已七八十岁的张中行先生的大名和一系列作品，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纸和杂志上，并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声名鹊起。

张中行不同于一般的老人和文人。首先，他身上有光环，这种光环是由他的道德和文章交相辉映而成的；其次，他身上有阴影，这种阴影则是由杨沫那本小说《青春之歌》涂抹上的。张中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就是带着仰慕和好奇这两种心情购买了张老许多书。几年来，我既读张老的书，又对这位大师级人物进行了走访；认真读张老其人，使我不断加深了对于他的了解。

2006 年 2 月 24 日，张老在解放军 305 医院安详地停止了呼吸，享年 98 岁。

他是一位国学大师

冰心老人生前有句名言：“人生从 80 岁开始”。张中行先生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张老是在 80 岁左右的晚年才“暴得大名”的，人称“文坛老旋风”。

张老出名之后，前些年有人把他与季羨林、钱钟书、施哲存并列，称之为当今中国的四位“国学大师”。也有人把他与季羨林、金克木、邓广铭并称为北大的“未名四老”。这虽然不是正式评选（老实说也难以评选）的结果，但张老的确是众多人们所公认的国学大师。

季羨林在一篇文章中，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章时，季先生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需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罕见。在我眼中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与张老密切交往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启功先生，称张老既是“哲人”，又是“痴人”，赞他“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

一身傲骨、满腹才华的吴祖光先生说：“我那点学问纯粹是蒙事，张中行先生那才是真学问。”

比较年轻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记者唐师曾（绰号“唐老鸭”）说：“没读张老的书，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张老的书，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

上述这些评论，绝非溢美之辞。张中行在读师范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新文学，博览群书，追求新知。在沙滩红楼的北大四年，他进一步开阔了知识视野，接受了科学、民主思想。他终生孜孜不倦，广泛涉猎，潜心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过去说一个人学问大，

往往说“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现在说一个人学问大，又往往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把这些说法用在张老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肚子里有没有墨水是一回事，能不能通过文笔表达出来又是一回事。一个人如果只是堆积了很多知识，但却不能创造性地表达出来，那就无异于鲁迅笔下只会记忆的“两脚书架”。张中行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文笔奇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清明，已届耄耋之年的张中行亦如老树发新芽，开始了散文随笔的创作。这一写竟如大河开冻，滚滚而下，陆续流出了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顺生论》、《禅外说禅》等为代表的数百万文字。一时举国上下，书店书摊，到处摆放着张中行的著作，国人争读，影响巨大。有的地方还有专门阅读和讨论张中行书籍的自发性组织，名曰“张迷协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出版业和读书生活中的一大奇迹。

跨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开始蔓延，各种各样的“大师”也多如牛毛。但是，何谓国学？何谓大师？何谓国学大师？未必人人都能说得清楚，当然人们更讲不明白。

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称得上大师的人物，应具备四个条件：一、学术上博大精深；二、有创造性的思想贡献；三、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追随者、继承者；四、不仅学问高，道德也高。就张老的品德、学识、著作、影响而言，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张中行的确是一位“国学大师”。

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

人一出名，各种各样的称谓也就随之而来。比如对于张中行，除称为国学大师外，还有称之为著名作家、著名学者的，也有称他为杂家的，此外还有什么文学家、散文家、教育家、哲学家、编辑家，等等。的确，对于张老这样的大师，确实很难用一个头衔，比如用一个什么“家”来加以概括的。有人这样问过张老：“总结一生，您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适合？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张老这样回答：“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张老的这个回答既令人意外，又发人深思。

思想之于人的确是最为重要的。2005年9月29日，总参谋部原兵种部政委田永清少将和《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同志去305医院探望张老。小蕙请教了张老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您觉得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想了想，拼足力气回答：“思想最重要！”并且在小蕙带的本子上郑重地写下了这5个字。

张老的这个回答，和古今中外许多大人物的看法是一致的。马克思说：“人是靠思想站立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拿破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思想，一种是利剑，而思想最终总是战胜利剑。”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两句名言：“笑和让别人笑，思考和让别人思考。”美国阿诺德·施瓦辛格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美国哈尼·鲁宾说：“注意你的思想，它们会变成你的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它们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它们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们会变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它们会决定你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是思想，最令人敬佩的“富翁”是思想的富有者。一切大有作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思想、善思索。

张老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强调个人服从整体、下面服从上面，从而淹没于整体、淹没于上面。很多有思想、有个性的人才，就这样被埋没甚至被扼杀了。倘若一个人思想平庸，没有独立见解，阻挡者很少；倘若一个人很出色，很有思想，则阻挡者很多。真正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的人，是无私无畏的人。在张老“自己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存疑”，就是不自盲从、不轻信。这种“存疑”，这种“不信”，是建立在渊博的知识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没有知识，没有思想，就缺乏判断力，就可能过于轻信。

张老的“自己的思想”，有许多是围绕着“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主题的，因此显得很博大、很整体，也很深刻。他曾经这样回忆说：“主要是两点。其一，是大学毕业前后，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怎样活才好的相当强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后必随来‘求’，于是在治学方面就转了方向，改为钻研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有人称张老为哲学家，他主要研究的是人生哲学，其结晶就是历经数十年学习、研究最终写作而成的《顺生论》这部书。在张老的“自己的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顺生”。概括地说，所谓“顺生”，第一顺其自然的生命规律，淡泊名利，不跟自己较劲；第二顺从内心的道德律令，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不与别人为难。这是他能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张老的“自己的思想”，贯穿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他的一些著作，堪称经典之作，必能传之久远。好的文章不仅是词藻华美、抒情动人，更重要的是能表达思想。有些人的文章，长篇大论，水分很多，看来说南道北，想起来没有东西。张老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名副其实大家，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文采、情感、深思、哲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无穷余韵，在别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张老的作品对于广大读者有着一种独特而又强大的吸引力。张老是一位思想多于行动、思考多于言谈的人。这样的人一定会拿起笔来宣泄“自己的思想”，而使张老名扬四海的，正是他的许多饱含人生哲理的著作。

他是一位大度君子

在当代中国文坛，曾经流传过两男两女历史恩怨和感情纠葛的故事。

一个是说，关于“张恨水”之名，有传言说是张恨水曾经追求冰心，但始终得不到青睐，失恋失意之余，愤而借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女人是水做的”话，引申而成“恨水”。实际上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儿。他取“恨水”两字为笔名，是借用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南唐后主李煜《乌夜啼》句）之本意，为的是时刻勉励、提醒自己珍惜时间。事实上，张恨水的婚姻浪漫而美满，他的妻子小他近 20 岁，原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因为特别喜欢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而对他产生爱慕之心，后来两人结为秦晋之好。就冰心这方面而言，田政委的老战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的李一信同志，曾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当面向她询问过这个问题。冰心老人并没有因为李一信的唐突而面带愠色，她安详而诙谐地说：“那些小道传言都是没根的事儿，我那时早已跟吴文藻恋爱订婚，他恨哪门子水呀！”

另一个传言是，张中行与杨沫年轻时曾经相爱并且同居。这个倒是确有其事，并且由此演绎出了许多故事。

大概是在 1931 年夏至 1936 年春，也就是张中行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和刚毕业从事中学教育之初，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年仅 17 岁的杨沫因抗婚而离家出走，在走投无路时，请张中行帮她介绍工作。经过一段接触，因互有好感而从热恋到同居，时间大概将近 5 年。其中的前两年，即由相识到共朝夕的两年，还被张老称之为“婚姻的花期”，到老也是“难得忘却的”。他们还有过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出生不久便夭折了。一个是女孩，是他们离异之后才出生的，至今已 70 岁的老人了。新中国成立后，杨沫从解放区回到北京，他们还见过面。对于这些，张老从不隐讳，谁问到他有有关情况，他都如实相告。因为这在那个大变动的年代，本来是属于极其正常的事情。

问题发生在后面。上个世纪 50 年代，杨沫写了一部影响极大的小说《青春之歌》。实事求是地说，这部小说突破了当时文艺上的禁锢，把一个本来小资产阶级味道十足的知识女性林道静当作全书的主角，还大胆地描写了作为革命者的她连续不断的爱情，这都是反潮流的、先锋的、叛逆的。后来，这部小说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由青春秀丽的谢芳扮演林道静，电影一路绿灯、一片轰动，引起了更加强烈的反响。可以说小说和电影中的人物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周总理还亲自邀请主创人员到家里看片，邓大姐甚至这样说：小说看到“忘食”，电影看过不止一次。

这本来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在小说和电影中，还塑造了另一个叫作余永泽的人物，此人与林道静和其他革命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是一个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而这个余永泽，据称影射的就是张中行。在这之前的张老，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虽然默默无闻，但还算平安无事。随着《青春之歌》小说和电影引起的轰动效应，张老的生活变得不平静了，他在单位里被弄得灰头土脸，也被社会有些人传得沸沸扬扬。

其实，真实的张中行与余永泽根本就不是一种类型的人。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他不仅作风正派，学识渊博，也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更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虚构了许多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戴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但他对杨沫的评价却始终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

也有人对他打抱不平，劝他写文章为自己辩解。但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更为感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是非颠倒的日子里，张老自己的日子已经十分难过，他先是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几次挨批斗，后来又被赶回农村老家，甚至还停发了工资。与此同时，也有人全面否定杨沫写的《青春之歌》，并且诬蔑她是“假党员”。在这种情况下，杨沫单位来人外调，希望张中行说杨沫的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威吓、辱骂，让他按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份材料，大意是说，那时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还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思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强多了！”据说后来杨沫看到了这个材料，她很感动，并写信向张中行表示感谢。

但到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杨沫写文章追述往事时，言及当年与张中行分手之事，又是明说或是暗示，张中行当年负心兼落后，所以她才由幽谷而迁于乔木。闻听此言，张中行笑曰：认定我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我落后，是人各有道。总之，“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只得分手。张老在《流年碎影》中谈到婚姻问题时，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张老与杨沫分手，当年自然是有“不可忍”之处了。杨沫逝世之后，他们的

女儿徐然给张老写信，主要意思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吧。张老复信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有人曾经说过这样四句话：“以德报德是常人，以怨报德是小人，以怨报怨是恶人，以德报怨是伟人。”从张老在困境和屈辱中对杨沫的态度而言，我们不必称他是伟人，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他的确是一位大度君子。

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阅读张老的作品，或与张老直接接触，都给人们这样一个深刻的感觉：他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他是中国古典文人的典范。

“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这是张老经常说的两句话，他自己的确也是这样做的。张老一生清贫，生活简朴，他 85 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小户型三居室，没有进行任何装修，屋里摆设也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一物。可张老却从无怨言，他甚至还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作“都市柴门”，安于在“柴门”内做他的布衣学者。

季羨林先生有个被北大新生当成工人师傅，并请他临时照看行李的故事。张中行也有个被当成看门老头的故事。张老还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有一次在楼下，看到传达室的人去买饭了，他就在传达室那里坐着。这时来了一个人，说找人，具体找谁也没说。张老就说你等会儿，中午都休息呢！后来传达室的人回来了，那个人说，我要找张中行，这个老师傅让我等着。传达室的人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张中行先生！说完，那个人特别吃惊，哎呀！这就是我要拜访的张老啊！然后又说了很多尊敬的话。张老回到家里对女儿说，你看这多好，人家把我看成个老师傅。就这样他挺高兴。季羨林、张中行这些著名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心无旁骛，专心治学，淡泊名利，俭朴生活。

“言必信，行必果”，是张老终生奉行的信条。张老是“左撇子”，自谓“学书不成”。其实，他的书法很见功力，书论也颇有独见。他曾亲口对田政委说过，在书画创作上造诣深厚的人，一般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天赋，二是勤奋，三是学识。他还以启功和赵朴初为例说明这个问题。田政委曾直接观摩张老写字，他握笔较低，运笔舒缓，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属于文人字，书卷气很浓。他曾给田政委写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闻鸡起舞”、“奇石共欣赏”等几帧条幅。在后面这帧条幅上，他还写上了“永清先生有米颠爱石之癖书以奉之”一行小字。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张老知道田政委喜欢收藏“闻鸡起舞”这四个大字，他就开列了一张名单，放在书桌上，并亲自写条子或打电话，先后给田政委求来了顾廷龙、梁树年、任继愈、欧阳中石、刘炳森等名家的书法墨宝。田政委收藏的名家“闻鸡起舞”墨迹多了，曾经打算出一本集子。书名叫什么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张老说：“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出自西晋时爱国将领祖逖和刘琨年轻时的故事，书名就叫作《祖刘遗韵》吧！田政委听后连声说好。不仅如此，那时已经 90 多岁高龄的张老，有一天还带着田永清、孙健民同志以及张老的三女儿张彩，直奔他的老朋友启功先生家中，让启先生给他们写字。启老当即给田政委写了《祖刘遗韵》书名，给孙健民同志写了“达观”两个大字，唯独没有给张彩写，张老也

根本没有提出让启先生给她写。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有时田政委和孙健民同志说起来，还是念念不忘、感慨不已。

张老的夫人李芝銮是旧时的大家闺秀，年轻时体态清秀而性格温婉。妻比夫大一个半月，都属猴，他们于1936年结婚，张老一直称夫人为“姐”，两人相濡以沫近70年。李芝銮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平生志洁行芳，任劳任怨地操劳了一辈子，于2003年先张老而逝。两位老人都在时，田政委每次去探望，他们都十分高兴、热情接待，分别时还步履蹒跚地坚持送到电梯门口，令人十分感动。

张老与李芝銮生了四个女儿，大女儿张静，二女儿张文，三女儿张彩，四女儿张莹。张老家风很正，家教很好，四个女儿都受了高等教育，人人既传统又现代，既事业有成又品德端正，颇具乃父遗风。张老一家三代共有8人毕业于北大，除本人外，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二女儿的女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都毕业于北大。大女儿张静毕业于河北医学院，一直在张家口工作，经过长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钻研，终成名教授、医学家，并且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后代，这样的素质，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罕见的吧！

张老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从不趋炎附势，从不攀高结贵。他一辈子没有正式参加过任何党派、任何组织。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张老掀起的那股“文坛老旋风”席卷全国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托人给他送去了入会申请表。张老考虑再三，决定放弃入会申请。他的解释是，我这一辈子什么组织都没有参加过，现在快成入土的废物了，就不麻烦中国作协了。张老就是这样淡泊名利，他对一切都看得很淡、很透。

张老虽然是国宝级的人物，但因为他是“无冕名家”，无官无位，无权无势，所以到了迟暮之年在某些方面也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有一件事虽然过去几年了，但人们想起来一直觉得心里非常难受。那一次是张老到地方某医院看病，田政委派司机开着车早晨6:30就赶到了张老家，司机和张老的二女儿张文陪着老人到了医院，挂了专家号，张老坐在轮椅里静静地等着，一直等了四五个小时，那位专家说有别的重要事不再看了，就这样把一位90多岁的国宝级人物甩到了一边，只好白去一趟、叹息而归。司机回来给田政委说起这件事，他心里觉得又难过又气愤，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国，“官本位”的影响还很严重，干什么都讲究级别高低。对此，张老和张文倒显得比较平静，他们没有过多抱怨。张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能享大福不算真本事，能吃大苦才算真本事。”试想，他们对于这种现象大概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张中行的养生之道和座右铭

近10年来，每到1月7日，田政委都到张老家中给他祝寿。其中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2005年1月7日给张老祝贺96岁华诞那一天。田政委把那天的情况，写成《给张中行先生祝寿》一文，经由韩小蕙同志发表在了《光明日报》的文化副刊上。那天上午，田政委赶到张老家，向他表示热烈祝贺。等了一会儿，张老的三女婿林教授唤醒他：“爸，田政委来看您了！”张老慢慢睁开眼睛，认出是田政委之后，拱手作揖道：“将军驾到，欢迎、欢迎！”他发现张老的身体和精力的确已大不如从前。家人说他卧床睡眠的时间明显增多，

在房间走动也需要手拄拐杖或他人搀扶。但他的气色还好，脸上没有常见的老年斑，也没有多少皱纹。他的思维还比较敏捷，说话也比较流利，而且还像过去那样，与人见面之后喜欢开玩笑、说笑话。

张老起来之后，就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和大家交谈了起来。田政委觉得机会难得，就向张老请教了几个问题。

他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张老，您一生历经坎坷，竟然活到如此高龄，请问您有什么养生之道？”

张老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养生之道。要说有的话，就是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他请教的第二个问题是：“张老，指导您一生言行的座右铭是什么？”

张老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也没有什么座右铭。要说有还是刚才说的那两句话：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说起张老的座右铭，他的四女儿张莹说：“我爸这几句话哪里像什么座右铭呀！不过说实在话，他这一辈子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

他请教的第三个问题是：“张老，您写了那么多大作，您最喜欢、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张老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多年来我涂涂抹抹，写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要问我最满意的是哪一部，实在不好说。不过，我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写得比较苦的是《顺生论》这本书。我上大学开始，至今70余年，一直致力于思考和研究人生哲学问题，这本书算是这方面的一个总结和成果吧！”

说到这里，田政委和张老的三女婿林教授以及前来为张老祝寿的刘德水老师都深有同感。正如有人所讲，如果说张老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是中国当代《世说新语》的话，那么张老的《顺生论》就堪称中国当代的《论语》，的确是一本值得人们用心研读的人生哲学教科书。

他请教的第四个问题是：“张老，您对后生晚辈有什么希望和嘱咐？”

张老想了一会儿，说了八个大字：“多读好书，多做好事。”

张老那天言简意赅的谈话，一直牢记田政委的心中。他认为这既是张老一生为人、治学的经验总结，也是他留赠给人们的珍贵遗言和精神财富。

张老逝世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紧急赶制了一部专题片，介绍了张老的生平事迹。在选择采访对象时，张老的家人推荐了田政委。这大概是把田政委看作军队中张老读者兼友人的一位代表吧。专题片播出时，使用了张老大女儿张静、二女儿张文、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作家刘心武与田政委的画面和言语。他们谈得较多，都很好，他排在最后，作为结尾，说了这样几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但没有创造学问的奇迹；有的人创造了学问的奇迹，但没有创造生命的奇迹。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既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又创造了学问的奇迹。张老就是这样一个人。”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生前安居“都市柴门”，甘做“布衣学者”，成为“无冕名家”的张中行先生，其道德文章、仁者情怀、智者风范，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全国劳动模范、“毛泽东号”机车长 陈福汉

陈福汉，1936年10月生于武清灰锅口村。初中毕业后进了北京机器制造学校，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一年后就退了学。1957年1月正式参加工作，上“毛泽东号”做学员。195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7月任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毛泽东号”第七任机车组司机长，1979年1月至1981年2月任北京铁路局工会副主席，1981年2月至1982年10月任北京铁路分局副局长，1982年10月至1999年6月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兼组织部长，1999年6月至2003年8月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是北京市第七、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北京市第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十三次党代会代表，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毛泽东号”蒸汽机车，并不是毛泽东的专列，却被人们看作是中国蒸汽机车中的“领袖”。在它历任的司机长中，许多人都担任过领导职务，虽然多数都已过世，但他们与“毛泽东号”一起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三十多年间所有特有的历史事件：战争，大生产，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号”是1941年由日本人在中国大连制造的最后一台蒸汽机车，最初运行于哈尔滨机务段。

1946年4月，哈尔滨解放，东北解放区成立了东北铁路局。党领导下的哈尔滨机务段，为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带领工人支援解放战争，军代表发动工人们给这台机车取个响亮的名字。结果，工人陈捷三取的“毛泽东号”被选中。1946年10月，经过哈尔滨铁路局、东北铁路总局的逐级上报，直至上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经陈云同志批准，10月30日，“毛泽东号”机车在哈尔滨机务段正式命名，陈捷三也被机务段任命为“毛泽东号”第一任司机长。1949年3月，“毛泽东号”奉命离开哈尔滨机务段，落户北京机务段。

“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陈福汉正式参加工作，上“毛泽东号”做学员，直到1973年始终在“毛泽东号”上做司机。这期间，他经历了1958年“毛泽东号”的改型，1966年，“毛泽东号”被造反派批斗。陈福汉始终对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人正直朴实，平易近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他不断钻研业务，埋头苦干，和工友们先后对“毛泽东号”进行了102项技术改造，时时刻刻呵护着这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老战友”。

1973年7月，陈福汉接任“毛泽东号”第七任司机长，机务段里斗争依旧，运输不能

正常进行，有人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不管是哪种主义，陈福汉知道，从上车当学徒起，师傅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晚点。

当陈福汉回忆起那段历史，陷入了从来未有过的深思。“文革”前，日本、法国、印度等国家的民间访问团都曾参观过“毛泽东号”，还一定要上车留影，陈福汉早已习惯了用各种词汇褒奖“毛泽东号”。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陈福汉作为“毛泽东号”司机长，代表首都工人，站在毛泽东遗体前守灵。三个月后，“毛泽东号”蒸汽机车退役，正式启用国产第一代东风4型0002号内燃机车。

每当回忆起和“毛泽东号”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陈福汉抑制不住无比依恋的心情，有时他就到中国铁路博物馆看一看曾经在中国铁路上奔驰了30年，为我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老朋友”，内心感触溢于言表，毕竟陈福汉在这辆车上整整工作20年。

从命名那天起，“毛泽东号”一直是中国铁路多拉快跑、安全行车的一面旗帜，它见证了新中国铁路事业由弱到强飞速发展的历程，也造就了象陈福汉这样的工人代表。他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劳动英雄等荣誉称号，和郭风莲、邢燕子等工农代表一起参加了党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郭振清

人们喜欢郭振清，源于看过的电影《平原游击队》，源于把鬼子打得团团转的“李向阳”；人们喜爱郭振清，源于重温老片《平原游击队》，源于喜欢那个坚强沉着、机智勇敢的“李向阳”；人们热爱郭振清，源于走近《平原游击队》，源于多年以后仍无人能取而代之的“李向阳”。

郭振清，1927年8月15日（农历）出生，祖籍武清石各庄。父亲靠摆小摊所得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郭振清断断续续念了四年私塾，后来由于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少年时代他就是个活泼、爽朗的孩子，好舞刀弄棒，还能踩高跷，遇有民间文艺活动场所总要去看热闹。对曲艺大鼓、杂耍、驴皮影等都有浓厚兴趣，早就产生了想当艺人的念头。十三岁，由于家境所迫，去天津市里拉洋车。在他十六、七岁时，由于家境日趋贫困，到天津市电车公司当学徒，后来就在电车上当售票员。天长日久，他结识了一些乘车的艺人，跟他们处得挺熟，并学会了单弦、数来宝、相声和评剧等多种表演技巧，为了消愁解闷就自编自演一些讽刺性的顺口溜或评剧小段给工友们听。

天津解放后，他被推举为电车公司的文教委员，把工会的文娱活动搞得热火朝天。1949

年5月被保送到全总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学习，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同年11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1949年底开始了他的表演艺术生涯，1949年底至1953年，他先后在天津市总工会工人文工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从事话剧表演工作。1953年至1981年，他先后在北京电影演员团、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电影表演工作。1981年至1988年，他回到天津，先后在天津广播电视艺术团、天津电视台电视剧部从事演员、导演工作。1988年离职休养，享受司、局级政治、生活待遇。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专家政府特殊津贴。他历任吉林省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常委、中国电影表演学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电影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天津电视艺术家协会顾问、天津戏剧家协会会员等职务，国家一级演员。

他参加演出的话剧、电影、电视剧上百部，曾主演《独立大队》、《英雄儿女》、《英雄司机》、《羌笛颂》和《花好月圆》等影片，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特别是他主演的电影《六号门》、《平原游击队》荣获国家文化部的嘉奖，他塑造的艺术形象家喻户晓、广为传颂，成为教育人民、教育青年的爱国主义经典作品。他在多部盛映不衰的影片中有突出表演成就，在观众中影响至深，备受爱戴，成绩卓著。1957年荣获全国最受观众欢迎的演员荣誉称号，1995年荣获第五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特别奖”，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郭振清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奔放而又细腻，质朴无华而又真实可信。尤其是看过《平原游击队》的观众，不会忘记那位手执双枪、纵横驰骋在敌人心脏里的游击队长李向阳，这个传奇的抗日英雄，以自己独特的思想的行为轨迹，一度成了勇敢、机智的代名词。他在《独立大队》中塑造的大队长马龙的形象，也令人难忘。他把马龙的自信、怀疑以及最后的转化刻画得细致入微、真实可信。在长影建厂35周年的大会上，他主演的《六号门》《平原游击队》《独立大队》，被评为优秀影片。

郭振清对待艺术创作的态度从来一丝不苟，严肃认真，永不满足。他说：“作为一名演员要创造一个成功的角色，一要生活，二要真实，三要动情。要让观众从演员的动作和表情中去看出人物的思想感情。”1957年，郭沫若在“北京日报读者推选1956年最受欢迎之电影演员郭振清同志荣膺第五名”的奖品上，曾题诗一首赠郭振清同志，诗曰：凤头鸠见桑葚，独立枝头有所思。自我陶醉不可耽，高飞四海颂和平，月桂菊可寻。郭沫若的这首诗，在当时看来，是对郭振清的赞誉和希冀；在今天，是对他所走的艺术道路的一个真实而概括的写照。2005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由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举办的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评选活动中，郭振清当选为中国电影百年明星。

郭振清于2005年8月24日逝世。他为话剧、电影及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驰骋影坛几十载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胡同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 蓝荫海

蓝荫海，这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写剧本为主的顶梁柱，曾荣获 1991 年北京精神文明建设奖章、1994 年文化部文华剧作奖、国务院对文化艺术事业有突出贡献者表彰和奖励。

他是国家一级编剧，一生奉献给北京人艺。

他是京味作家、平民编剧。笔底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北京风情。

他创作的《杳见胡同》、《吉祥胡同甲五号》、《好人润五》、《风雨同仁堂》、《如意胡同》、《立体大杂院》等戏，受到各界赞誉，这一系列写北京胡同生活的剧本，使蓝荫海得到了“胡同剧作家”的雅号。

一

蓝荫海，1931 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大孟庄镇小押虎寨村。“七七事变”后便投亲去北京谋生。

为创作，他几十年来坚持深入生活，奔走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厚积薄发，终于在晚年赢得了成功与辉煌。

蓝荫海的创作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少年时，母亲早逝，他郁郁寡欢。尽管作为知识分子的叔父婶母，给予他父母般的关怀，但具有敏感气质的他，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生活的多愁善感，他用纸笔记录下来，开始最初的创作。

他的剧本创作是从演剧开始的，当他上中学时，寻找到了宣泄内心世界的办法——演戏。他与富于革命激情的青年们，将解放区创作的《白毛女》搬上旧北平的学校舞台。这些演出、改编，使蓝荫海受到大众文艺的启迪和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他献身戏剧。1951 年，跻身于北京人艺。当时，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他，在明星荟萃的艺术殿堂里，只能跑龙套，充当群众演员。《龙须沟》中搀扶老妇在小客栈避雨的后生，就是蓝荫海扮演的。当时同台当群众演员的有现在大名鼎鼎的黄宗洛、李婉芬、林连昆等。

从演员到编剧，古已有之，但并非每个演员都能成为剧作家。蓝荫海这条道走得较顺，得利于他有作家的敏感素质，得利于对舞台的熟悉，得利于人艺这个艺术殿堂，得利于名家的指点和帮助，更得利于他深入生活，刻苦用功。

蓝荫海没上过大学，没学过戏剧创作，可说来幸运，他一出道，就与焦菊隐、老舍、曹禺这些大师共事。焦菊隐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一丝不苟的导演要求，培养出一批名演员、名剧作家。作为群众演员的蓝荫海，不敢丝毫放松对角色的体验，即使演一句台词的角色，焦先生也要求他们组成“家庭”，写演员日记，人物自传，与“家庭”成员一起编小品，

写完后由导演评论。潜移默化的熏陶，对一个有志编剧的年轻人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编剧能力的培养。

老舍的剧本对蓝荫海是绝好的范本。老舍多次到人艺讲解他的剧本，从取材、结构、人物、矛盾乃至细节处理都认真与导演和演员交流座谈……这使蓝荫海受益匪浅。蓝荫海是有心人，对《龙须沟》、《茶馆》等剧，他琢磨了上百遍。

当然，手把手教蓝荫海写剧的是曹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蓝荫海给曹禺当助手，天天到曹禺家里上班。一次，为以一个优秀售货员为原型创作剧本，曹禺带着他一头扎进北礼士路副食店体验生活。师徒俩穿上工作服，在柜台上卖油盐酱醋。曹禺深入生活的认真态度，至今令蓝荫海记忆犹新。

副食店下班后，师徒俩住在店后小屋中，那是个酷夏，天热蚊咬，无法入睡，他们就坐在院子里聊天。他们谈剧本，谈生活。曹禺耐心地讲解创作《雷雨》、《日出》等名著的心得。曹禺注重深入生活，给蓝荫海留下难忘的印象：“不要信编剧法，那是套子，从生活中找素材，提炼主题，走自己的路”这句话使蓝荫海受益至今。

环境是良师。蓝荫海生活在北京人艺这座独具北京韵味的艺术殿堂，街坊邻居不是大导演，就是大明星，几代艺术家创造的人艺风格，四十多年的熏染，造就了蓝荫海。

二

蓝荫海在创作中，坚持深入生活。他坦言：“没有大量的调查研究，没有火热的生活冲撞，我写不出剧本！”

1990年，京城实施危旧房改造，市领导建议蓝荫海，抓住百姓的热点、难点，写一台危改大戏，对这种“遵命文学”，蓝荫海也发怵。当时，同类电视剧和话剧都有过，别人劝他：“甭去碰它，危改令人头疼！”他在水本子上写下两句话：民以食为天，民以房为地。到生活中去，一种责任感催促着他。深入到德宝小区、槐柏树街、菊儿胡同，火热、鲜活的生活扑面而来。

深入到小胡同、大杂院中，接触三代、甚至四代同居陋室的群众，当然都是满腹牢骚、一腔怨气；接触房管干部、职工，也都是一肚子邪火，一位房管所朋友劝他：“老蓝，这么大岁数别添堵了。戏怎么写，都挨骂。”甚至有人给他支招：“你把房管干部写成乌龟王八蛋，老百姓肯定叫好！”

从哪儿下笔？蓝荫海困惑了。他想起了曹禺的教诲：“从生活中找素材，提炼主题！”他一头扎进危改办公室，天天在那儿上班，跟着工作人员调查走访，参与谈判，目睹大量房管干部的苦衷。在找不到主题，找不着切入点时，一幕幕发生在生活中的活戏给了他启迪。

晚上九点多了，拆迁科长接待了十几个拆迁户，已经口干舌燥、嗓音嘶哑，刚泡下一杯胖大海，想润润喉咙，坐下歇会儿。门开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踢开了房门：“一进门，我就憋气！”

科长明白了：老太太在子女怂恿下发难来了。科长忙陪笑脸：“大妈，您憋气不是？我开窗，您先透气，慢慢消气。”

老太太指着科长的鼻子：“告诉你，我可有心脏病！今几个房子要定不下来，我死给你看！”

科长不慌不忙：“大妈，心脏病不怕，我这儿有药。”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两个药瓶：“这是硝酸甘油，这是救心丸。”

老太太愣了，赶情科长也是带病工作。人心肉长的，老太太感动得涕泪横流，蓝荫海也热泪盈眶。百姓不易，房管干部也难，政府也在千方百计，大家劲往一块使……突然，思维迸发火花，这不就是切入点吗 《旮旯胡同》主题凸现，演出后深受各方好评，蓝荫海用自己的艰辛，唱出一首时代的同心曲。

1998年，《风雨同仁堂》剧组共赴同仁堂制药厂，向广大干部职工征求意见。座谈会上，编剧之一的蓝荫海与同仁堂上上下下亲如家人般熟悉。乐家后人对蓝荫海无话不谈的亲密，他对同仁堂二百多年风雨的熟谙，无不令人惊讶。合作者张永和说：“蓝大哥为写同仁堂，两年多泡在药厂。”同仁堂的干部笑称：“蓝大哥是同仁堂的人，组织关系都在这！”

从1985年到1987年，蓝荫海在同仁堂上上下下交朋友，没有一个车间没去过，没有一道工序不熟悉。连位于通州的药酒厂、位于昌平的养鹿场，他都一去几天。如意长生酒怎么泡的，鹿茸怎么割的，他门儿清。同仁堂过去采购药，一直在河北祁州（今安国），连那儿他也跟着采购员奔波数趟。同仁堂的领导说：“蓝大哥成专家了！”

为真实再现同仁堂的辉煌与衰落，蓝荫海寻访同仁堂的后人，乐家的几十位后辈大多成了他的朋友。有些细节，无法考证。蓝荫海就上故宫，去北图，查阅史料。提起同仁堂，他总是兴致极高，如数家珍。

没有这些苦功夫，就没有《同仁堂传奇》、《风雨同仁堂》的成功与获奖。蓝荫海家中，一堆堆多年搜集的珍贵史料，是为明证。

三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蓝荫海厚积薄发，老当益壮。迎来了晚年的辉煌。

他创作了话剧《你争我夺》、《旮旯胡同》、《好人润五》；创作了《吉祥胡同甲五号》、《立体大杂院》、《如意胡同》、《同仁堂传说》等电视剧；写出了《同仁堂传说》等小说，与人合作创作《风雨同仁堂》京剧。

《旮旯胡同》演出140多场，为人艺创效益50万元，并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又夺得文化部文华大奖和文化剧作奖。《好人润五》演出逾百场，受到江泽民、李鹏、丁关根、李铁映等中央领导的称赞。《立体大杂院》荣获大众电视金鹰奖。2000年，蓝荫海被评为北京第二届十佳电视艺术家。

蓝荫海是个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催促着他接手别人不愿碰的题材。他的艺术风格与人艺的风格一脉相成：炙手可热的生活气息，平易亲切的生活实感，凡人小事的描写，古都文明的新风新貌。

观蓝荫海的剧作，会感到不是在看戏，而是看生活。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就发生我们身边、家庭邻里之间。下一代教育、商品大潮下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一些公安劳教问题，他在作品中屡次触及。这与他长期和街道居民组织关系密切，关注浪子回头的社会环境有关，这除了作者对失足青年的仁爱之心外，也是社会的需求和社会心理的反映。

从生活中提炼出的戏，真实反映了京城的市民生活，观众在似曾相识中感到亲切。从《吉祥胡同甲五号》中可以看到，每集的标题是“上任”、“夜话”、“绝情”、“探亲”、“春雨”、“自主”、“调解”、“敬老”、“退礼”、“乔迁”。

北京风情、京味作品，近年来成为一种追求，赢得了海内外的关注，北京人艺取得了卓越成绩。作为人艺的主创人员，蓝荫海也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的京味创作不仅体现在语言，更体现在他对独具风貌的京城居民生活真切体验和把握上。在《同仁堂传说》中，观众从荧屏上可以看到满台充盈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一幅清末大都市的社会画面呈现眼前，那逼真的街道、人群构成的旧京闹市，那“乐家老铺”的招牌，每日例行的张灯、收灯程式，以至人物造型、店规店貌……无不栩栩如生。

蓝荫海的艺术特点是，艺术地再现生活中人们熟视无睹的人和事。他的剧本自然、宁静，娓娓道来，从容自信，少有插科打诨，这些踏雪无痕的功夫，源于他对生活的熟悉，对京城居民定向的注意。长期的积累，训练的有素，终于使他在晚年达到创作高峰。

1996年离体的蓝荫海似乎比过去更忙了，他穿梭于京城的大街小巷，为创作寻找生活原型。这位“胡同作家”还有一系列京味作品有待完成。

军营艺术家 郑振环

作为军人，郑振环是将军。作为艺术家，他编剧的话剧《三个人的冰山》、《摸天》，特别是《天边有一簇圣火》被称为军事题材划时代的作品。作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自1997年上任以来，策划出品了大型纪录片《较量》、《东方巨响》、《挥师三江》，故事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冲出亚马逊》等一批优秀影片。

作为将军、艺术家的郑振环，给人的印象很随和、亲切、机智、幽默，没有半点名人的架子。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他的机智和幽默使接触到他的人感到他出色的才华。郑振环，1943年12月生人，祖籍是天津武清。他从小就爱好广泛，画画，演小戏，说快板，体育，样样都好，很小的时候就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作品，对学习充满兴趣。大哥当时在民主德国大

使馆工作，知道他喜欢文学，就把国外的小说买来翻译成中文给他看，外国文学对他影响很大。郑振环是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开始考上了哈军工，学理工的，由于在艺术才能上过人，被解放军艺术学院选中，经过几番周折，与军事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他又上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他虽然是军人，但没扛过枪打过仗。却在军事艺术领域有着颇高的造诣，在银幕上、教学讲台上、话剧舞台上施展着他的才华，是国家第一批享受政府津贴的艺术家之一。他搞话剧很有名，在上世纪80年代，他编剧的《三个人的冰山》、《摸天》，特别是他的《天边有一簇圣火》，是描写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的，被称为戍边将士的无私奉献的颂歌。郑振环将军曾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员、解放军艺术学院创研室研究员、《解放军文艺》杂志主编、总政话剧团团长、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现任中央电影电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长，是国家一级编剧，少将军衔。曾创作过《江淮风云》、《军营笑声》等多部话剧作品。从事影视创作以来，在三十余部影视片中担任过编剧和艺术指导。

许多人是看着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长大的，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柳堡的故事》、《林海雪原》、《闪闪的红星》等影片老百姓都喜欢看。郑振环将军，去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厂长很偶然，那是1997年，本来他应该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当院长，就因为晚报到了一天，就去了八一厂当了厂长（在这之前任总政话剧团团长）。当时八一厂处于不景气状态，他去后，组织拍摄的大型纪录片《较量》、《东方巨响》、《挥师三江》轰动了全国，得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大壮了中国人的志气。紧接着又拍了故事片《大进军——大战宁沪杭》，是解放战争三个系列片《大转折》、《大决战》最后一部。在风格上作了探索，注重了叙事性和纪实性，采取真人回忆的手法，有很多细节都是他亲自写的。这部电影突破了以往军事题材电影的格调和形式，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华表奖、金鸡奖，基本上中国电影方面的大奖该得都得了。前几年在全国热映的《冲出亚马逊》，是他策划的。本片取材于1999年8月至11月，我军空降兵特种兵大队两名年轻军官被派往南美洲委内瑞拉接受国际军事组织举办的“猎人学校”训练的亲身经历，经过艺术加工提炼，塑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军人豪迈地走向世界的崭新形象，是一部扬国威、壮军威的当代现实题材影片。虽然郑振环将军刚刚从八一电影制片厂退下来不当厂长了，但他对军事题材的电影抱有一生执著，对中国电影前景充满信心。谈到中国电影目前的困境时，他说中国电影要继承老祖宗留下的好的东西，但决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绳索，把自己束缚住了，不敢往前想，但大的规则不变，文学是人学，电影就是写人，包括纪录片也一样，也是写人的。

郑振环将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爱人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的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小儿子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现在两个儿子都在写剧本、当导演，挺有名气的，他说他和他儿子像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剧本，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到了要打架的地步，但他们都是为了艺术。

他崇尚自然，淡泊名利。他喜欢跟人唠嗑，最大的乐趣是写作。很多电影剧本都有他参与创作，但他从来不挂名，他说要多扶持年轻人。人可以隐姓埋名活着，给人留下形象，不要留下名字。

享誉三秦的书法家 石宪章

石宪章，原名石彦章，1930年6月生于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杨凤庄村一个普通的农家。祖父是位教书匠，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在祖父的熏陶下，石宪章从小爱好书法。他先是读私塾，后到天津上学。大街小巷里晚清翰林华世奎雄健浑厚、气势磅礴的招牌大字，深深地吸引着他。但由于家贫，买不起纸笔，他便经常蹲在牌匾下，以大地为纸，木棍当笔，专心临摹。经过努力，几年后，其书法变华氏圆润为宽博，遒劲而成雄健，后来，由于家境所迫，石宪章随叔父到上海，在熙光书局供职，读了不少书。

1950年，石宪章只身一人来到陕西，尽管他的本职工作是文秘，但他陶醉的却是墨海驰骋，碑林更是成了他工作之余潜心钻研书法的圣地。一个偶然的机，石宪章与陕西省文史馆馆长张寒衫相识。张寒衫学识渊博，为人谦和，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感染着石宪章。那时候，石宪章的行为很有点异于“常人”：人家忙于玩乐，石宪章忙于读书、练字；人家忙于筑巢垒窝，石宪章忙于涉古猎今；或徜徉于名寺，或流连于古刹，凡有碑石之地，都有他的足迹。

成家后，他住在西安市南广济街一间土木结构的小阁楼里。阁楼低矮潮湿，登楼一步三摇，入室俯首躬行，低微的薪水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连一张大的书案都置办不起。写小张字，他或把那个老式柜做桌面，或把那张吃饭用的八仙桌腾出来；写大张字，他就把阁楼的地板做案，或蹲或跪或趴于地上，写个不停。直到后来调入钟楼饭店，才有了一张像样的办公桌。

苍天不负有心人。几十年的辛勤耕耘，刻苦钻研，石宪章终成“正果”。他先是驰名于单位，之后驰名于地段，再后驰名于西安、陕西、西北、中华大地，并不断应邀到香港、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办展览，声名大振，而他的榜书题字，更是遍布海内外。

在张寒衫先生指导下，他广泛涉猎文史，深研书论。既得唐楷之法度，又窥秦汉之风范，所题榜书或汪洋恣肆、或雄浑雅健，有“长安榜书家”盛誉。其行书舒卷天放，大气磅礴，偶作篆隶，盘结屈纵，苍郁古茂，已臻“人书俱老”之境。又因生性豪爽，为人坦荡，身存燕赵遗风，深得长安书法界人士尊仰。有诗人观石先生作书后，欣然赞曰：“擎来雁塔作笔锥，墨入曲江五色飞。长安真似千摞纸，留与石翁醉后挥？”石先生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大展获奖，被美国、日本、新加坡及港、台等地收藏。应邀为黄帝陵、司马祠、大雁塔、屈原碑林、黄河碑林题写碑石。榜书牌匾遍及省内外。作品还被中央文史馆、毛主席纪念堂、周总理纪念馆、人民大会堂、中国军事博物馆及中南海收藏并集辑出版。石宪章先生历年来多次参加国际书学理论研讨会并发表学术论文。曾被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授予“德艺双馨”艺术家荣誉称号。1993年曾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书展和在陕西美术馆举办汇报展，反响热烈。1999年被新华社推选为“世纪之交陕西文化艺术界十大新闻人物”。作品被收入《当代中国书法作品集》，传略收入《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当代书画篆刻家辞典》、《中国人物年鉴》等多种辞书。

石宪章于2004年7月16日逝世，生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书画研究会副会长、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陕西书画艺术家

协会副主席、香港东方文化艺术书画部委员；政协西安市委常委、西安市书法家协会艺术顾问、西安市文联荣誉委员。曾两次赴中央电视台进行现场表演，并接受采访，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20余年前，他以酣畅浑厚的榜书而骤得大名，“石式”牌匾火热一时，悬于古城大街小巷，成为一种文化风景，著名学者霍松林称其字“刚健见骨气，雄浑蕴情意”。由陕西省政协和省书协等主办的“石宪章、石瑞芳父女书法艺术展”，199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时，也成为当时热点话题。2002年，应邀赴台湾举行书画联展。同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书画展“特奥金质奖章”。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肖云儒说石宪章的书法“如秦陵兵马俑之复活，铁马金戈无声舞动，肃穆中显出逼人的威严，有一种霸悍之气，一种帝王景象，有牌楼的绚丽，华表的跋扈，宫殿的辉煌和龙凤的尊严，也有兴之所至的随意挥洒，随意中又有刻意的结构，挥洒中是那无处不在的自信”。陕西省书协副主席茹桂认为石宪章的字“活现出了一个铁铮铮的秦人风范”，认为“石宪章是一位把临池视为炼狱而让生命在毫端充分燃烧的书家，他的勤奋是惊人的”。在艺术创作及欣赏日趋多元化的今天，石宪章的书法并不为一些人所喜爱，但谁也无法否定他在三秦大地上曾创下过的流传之广的奇迹。

对同道及爱好者，他有求必应、挥毫不辍，其仁慈宽厚自有一种长者之风。曾师从石宪章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演员徐松林说当年上书法函授班时，石老师给他批改的作业他还保留着，一直舍不得扔，那认真评析的点点墨痕，常常使他感受着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认真负责。

但凡有公益活动，石宪章从来随叫随到，绝不推诿，不讲任何条件地欣然前往，他一生低调，淡泊名利，常常让自己的作品无条件地“飞入寻常百姓家”。石宪章热心公益的种种义举，使他在书坛内外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尊敬。

集音乐理论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蓝玉崧

知道蓝玉崧，源于2008年11月21日去北京采访国家一级编剧、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蓝荫海先生。蓝玉崧是蓝荫海的叔叔。他说：“我只是个写剧本的，要写还是写他吧，他老人家终生无嗣，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和钟爱的书法事业。”

蓝玉崧先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及教学数十载，以音乐理论家闻名，数年前忽然以书法家面目出现在读者跟前，而且很快蜚声国内外书坛。《文艺研究》把他选为全国杰出的四位书法家之一。他的作品参加过多次全国书法展，还到日本、新加坡展出；个人书法展也相继在南京、香港举办过两次。并出版了《蓝玉崧书宋词小楷》。

蓝玉崧（1925—1997）祖籍天津武清小押虎寨村。著名中国音乐史学家及民族音乐理论家。生前为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原音乐学系主任、北京大学艺术顾问。被选为中国音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及音乐分会会长、中国音协理事。又是著名的民族

乐器教育家，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名誉理事、二胡研究会顾问、古琴研究会顾问等。为二胡界元老之一，其及门弟子王国潼、闵惠芬、黄安源、姜建华等。同时，又是当代书坛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其书法作品在国内外的书法界均甚获好评。

一位音乐家何以在书法艺术上有这样高的造诣呢？

蓝玉崧出身书香门第，四岁开始练字，十三岁投师学艺。他广泛研习碑学、帖学、金石，对《圣教序》、《书谱》、云峰山刻石、晋唐写经、汉简等用力最勤。少年时代，他还曾拜黄孝纾为师攻宋词，从寿石治金石，向黄宾虹学国画，见重于当时文化界的一些耆宿名流。喜爱文史书画的蓝玉崧早年没有以此立身扬名。国运维艰，他以一个热血青年投身时代洪流之中。上大学时是学生领袖、学联主席和学校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后来被组织派到东北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做地下工作。建国以后，他先后在鲁艺和中央音乐学院从事民族音乐教学和研究，在中国音乐史和二胡领域独树一帜，极有影响。

行家们都知道，一幅字不但可以表现出书法家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还可以从中透出他的人格、气质和审美情趣。蓝玉崧的丰富经历和多方面的文化活动，对他的书法艺术无疑起了推动作用，唯其如此，才更加容易博取众家之长，加以消化，形成全然属于蓝玉崧的"这一个"。他在书法上有几十年的丰厚积累和卓犖的才华，只是在近二三十年间由于政治原因使他不得不"韬光隐晦"，近年他在书坛的"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的。

书法界对蓝玉崧的书法艺术评价很高。黄苗子说，蓝玉崧的草书，乍看似从怀素和赵佶出来，但完全摆脱了这些"家数"，有了自己的面目，并且还很鲜明，说他的书法气势磅礴，有韵律感和生命力。"如果把古人的动感比作公孙大娘的洒脱，那么蓝玉崧的书法则正是现代芭蕾舞。"启功则说蓝玉崧有"真见识，大本领"。

想想看，热热闹闹的书苑，有几人够得上有了自己面目的呢？！

近年他写的草篆和汉隶，"功力既深，且变化有神。"

蓝玉崧生性豁达、豪放，甚至孤高傲岸。唯自信者独来独往。这一点，同历代的草圣不是有几分相似么？！他的狂草堪称"中国一绝"。铁锥划沙，远观如疏风朗月，线条流丽，细看似剑影飞腾。神闲气定，但精光湛湛，看着看着就叫你心驰神摇。

"真善美是艺术的真谛，我只想真实地表现自己。"说得对！谁想读懂蓝玉崧，尽可以从他的书法艺术中去了解他。

我国早期的生物化学家和营养学家 陈同度

陈同度教授 1904 年 11 月 15 日生于武清区杨村，是我国早期的生物化学家之一，是我国首先研究氧化还原理论和技术的老科学家。

陈同度 1926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之后，任北京清华大学化学系助教。旋即改就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科助教。1930 年去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随当时的氧化还原理论权威 W.M.Clark 教授学习，1933 年获得博士学位。是年回国，仍返协和医学院工作，晋升为讲师。1937 年升副教授，直至 1942 年协和医学院因日军侵华关闭时止。1942 年至 1943 年，就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旋因北京大学内迁昆明，他以家事累未同往，遂告失业。从 1943 年到 1946 年的战争结束时止的三年中，陈教授的生活即进入崎岖夹道中，先后被迫在天津化学厂、药厂等单位工作。

1946 年北京大学迁回北京，陈教授回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任生物化学教授兼生化科主任。1953 年秋改任天津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同时兼任天津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1957 年春回北京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教研室任教授，至 1969 年去世为止，他一生兢兢业业为生物化学教学研究工作了 42 年。

陈同度教授在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科研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在教学方面，他有高度的热情 and 责任感。他强调师资培养，他十分重视生物化学理论课的教材建设和实验室的建设，他主持编写了北京大学生物系用的生物化学教材，还同郑集教授合编了一本全国通用的《普通生物化学》教本，为我国生化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陈同度教授善于写书，亦善于讲课。他讲授理论课时，概念清晰、论点明确、逻辑推论严密，教学效果极好。

在研究方面，陈同度教授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与同事先后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发表的研究论文有 36 篇。他的早期研究工作主要是参加吴宪教授领导的蛋白质变性和荤素膳营养价值的比较两方面。在吴宪等发表的蛋白质变性论文中，陈同度参加的有六篇，在荤素膳食研究论文中，陈同度参加的有十三篇。在 1933 年到 1936 年的三年中陈同度教授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他本人主持的氧化还原方面的研究，连同他在美国与 W.M.Clark 教授等共同发表的论文在内，共有七篇。

陈同度教授天资聪颖，性情耿直，工作勤奋，治学谨严。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自己的祖国，解放前夕，有人劝他离开中国，他毅然回答说“我不走，我准备迎接共产党”。解放后，他响应党的各项号召，全心全意为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服务。他对我国生物化学的科研和教学，原有一番打算，但因时局动乱，使他不能如愿以偿，深堪痛惜。“文革”中，陈教授遭到迫害，卒于 1969 年 8 月 28 日。

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专家，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先驱 陈同燮

陈同燮是一位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的辛勤园丁，也是我国较早致力于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专家。

陈同燮 1898 年生于天津市武清区杨村。1919 年毕业于南开中学，旋即进入刚刚成立的南开大学。1923 年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被张伯苓校长聘为南开中学教师。1930 年春，他用七年中学教师的积蓄，自费留学，入美国密西根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史，翌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夏回国，应聘为东北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发生，陈先生愤而回到关内。1932 年春，去厦门大学任教。1932 年 8 月至 1935 年 7 月，任北京大学副教授，讲授西洋史。此后，又先后在广州学海书院、广州勤勤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授。在这期间，陈同燮教授以他的辛勤劳动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人才，著名学者齐思和、杨向奎、邓广铭、何兹全、孙思白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陈同燮教授在欧洲先后生活了十五年，精通四五种外语，这为其研究世界史奠定了基础。曾为谢德风翻译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审校，据其学生说，陈教授对谢氏译稿的校改简直是大开花，可见其认真细致的治学态度。出版著作有《希腊罗马简史》，是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史的重要著作。

1951 年，年过半百的陈同燮教授来青岛山东大学执教，任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先后讲授过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和世界近代史。陈同燮教授在教学和教研中努力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学风严谨、扎实。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楚。为了教学需要，陈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编写了一部二十万字的《希腊罗马史》教材。这部书立意新颖，论证严密，资料充实，文字简明，被当时的高教部推荐为全国高校交流教材。这部著作在陈先生故去后，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五十年代，陈同燮教授除完成教学任务外，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上。他经常用自己对新旧社会的感受，启发青年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还时常以崇敬的心情回忆他在南开的老同学周恩来同志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教育青年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在业务上，他热心授业，循循善诱，反复强调研究历史不能说一句缺乏史实的话。为了加强世界史专业的建设，他强调要抓教师的外语进修，而且身体力行，不顾年迈，每周拿出很多时间定期辅导教师的外语学习。

六十年代以后，陈先生致力于培养研究生和世界史学科建设。他曾计划在有生之年写出一部详尽的希腊罗马史专著，翻译一批史料。但除完成了谢德风教授译的《罗马史》（约 80 万字）的校订工作外，其余的计划随着“十年浩劫”的开始，而被迫中断了。

陈同燮教授生活异常简朴，常年粗食布衣。为人正派，待人热情、诚恳，团结同志。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见风使舵，说违心话。

陈同燮教授是一位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并且用毕生精力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的老一辈历史学家。1970 年卒于山东曲阜。值得一提的是，其弟陈同度是著名的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

中国当代著名民族学家、人类学家 张海洋

张海洋 1955 年 5 月出生于天津武清下朱庄五间房的一个小学教师家里，幼时家庭并不富裕，“三年困难”时期更成了农民。小时候一心想读书的他，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未能如愿，那段时间里，张海洋做过大队里的饲养员，成日和牲口打交道，却一直坚持在业余时间苦学。功夫不负有心人，全国恢复高考后，张海洋顺利考上了吉林大学。

由于中学课程都是自学，理科基础薄弱，而英语专业不用考数学，于是他选择了吉大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在吉林大学的几年里，张海洋逐渐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就算和民族学搭上了界。本科毕业后，张海洋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正式跨入民族学这一古老的学科领域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虽然历经文革浩劫，但无疑仍是国内社科领域的学术重镇之一。1982 年他入学时，张海洋意识到了自身基础的薄弱，于是听从了林耀华和金天明两位教授的指导，广泛涉猎相关领域的学术著作。扎实的外语功底为他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念研究生的第四学期，张海洋随林、金两位先生到四川凉山和广西龙胜两地实习，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关注经济文化类型方面的研究，并以此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获得了两位导师的通过。1985 年 3 月，张海洋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地理基础》的初稿，两位导师基本认可，林先生将题目改成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张海洋也曾想逐个类型地从生态基础、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一层一层往上系统地研究，并写出一部充实、完整的中国人文地理。后来由于工作忙碌，一直未能完成。

研究生毕业时，便留校过上了忙碌的教书生涯。1985 年以来相继开设体质人类学、专业英语、民族学通论、人类学概论、学科名著讲读、调查方法、政治人类学、东西方文化比较等课程，成为中央民族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1988 年考上在职博士生，蹉跎了 8 年，直到 1996 年 6 月，终以二十多万字的学位论文《中国的多元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参加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接着远赴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年的富布赖特学者，在国际讲坛上传递中国人类学的声音，从此声名远播海外。

《中国的多元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堪称集大成之作，它综合了古今中国人的体质类型、中国的考古文化区系、经济文化类型、历史上多民族的共生互动及近现代中国与西方互动等四方面的材料，从中国各地、各民族多样的文化小传统中概括出了一个共性的历史文化大传统，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认同的需求，说明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内涵，提出一个系统的、既不异内又不排外的“中国人”概念，充实了费孝通先生 1989 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后来，该论文经修改后整理成《中国的文化多样与中国人的认同》一书出版，并成为国内文化生态学领域的权威著作。

作为国内人类学领域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之一，张海洋以其深厚的功底、严谨的态度和独特的研究视角，在国内外赢得了广泛赞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做学问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张海洋教授正是这样一种怀着激情和耐心、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在民族大学图书馆里，有一间张海洋的办公室，他时常就在那里过夜，无论寒暑冬夏，不管蚊子叮还是蟑螂咬，一床破席子，往办公桌下一铺就是他的床。二十多年来，偏远的麻风病村、艾滋病村、贩毒村，他和他的学生们长久以来就是在跟这样的人群接触，从不畏难，也

从无抱怨。他始终铭记着恩师林耀华先生的教诲，承继着学术的薪火，也支撑着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大厦。翻开他的著作，通篇传递着人文的理念和身为学者对社会的忧思。他醉心于体质人类学、东西方文化比较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诸领域，呼吁确立人类学的一级学科地位，并大胆地提出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即从社会发展史到文化生态学的新思路，在学术界内无异于引发了一场“地震”，令人耳目一新。

身为一名公众学者，不仅要有足够广博的学术视野，更要有宽广的胸襟，承担起相应的一份社会责任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张海洋无愧于学者这一称号。如今的海洋老师身兼数职，他既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会员、教育部社会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学术年鉴》编委，承担着多项国家级学术研究课题，同时还在多所高校任兼职教授，全球环境 GEF 项目评估专家，在四川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担任董事。他深入穷乡僻壤，扎扎实实地做田野调查，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并积极地为弱势群体奔走，在各种场合大力倡导多元文化与和谐社会，这无疑令那些抛弃了学术精神、为既得利益代言的“拜金”学者们感到汗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老师的张海洋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他身上，既有菩萨之悲，又有斗士之勇，更有博儒之美。形以方成，势以圆动。现今的社会缺少的是独立的人格和一具真正的精神标尺，高校里更应该有这样的学者、师者和长者，来为社会播种福音。这些都在张海洋身上得到了体现，又经过他的教诲而传授给了学生，并洒播得更广。如一学生所言：“我不敢确定他能不能算上一位大师，但他绝对是一个具备了独立风骨、学术良知和大师风范的学者，一个时常背着双肩书包在校园里穿梭、让学生没有任何距离感的老师，一个年逾 50 而还会嬉皮笑脸向晚辈飞吻、还会和学生短信谈天论地、还每周定期为学生解答所有该问和不该问的问题的长者。”师者至此，海洋足矣。

夕阳下，海洋老师眼望远方，颌首沉思。从他坚毅的表情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富有人文关怀的智者的光辉。这种光辉，让他渐行渐远，也渐离渐近。

开国特级爆破英雄 李广正

李广正，1924 年 10 月出生于武清黄花店，1945 年加入东北野战军七纵十九师五十五团（原辽吉纵队独立一师一团一连，1947 年改称西满纵队，1948 年 11 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四军一三零师。1952 年编入第五十四军建制）参加了著名的四战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广州战役，抗美援朝及中印反击战等战役战斗。

1947 年 6 月四平攻坚战中（三战四平）他带领八班（后又加强二班）一夜时间连续对敌七十一军二六三团据守的法院大楼（俗称大红楼），实施了十二次爆破用炸药三千余斤，最后一次用药八百多斤，将三百米长的大红楼炸塌一大半，一连仅以伤亡四十八人的微小代

价取得了歼敌一千余人的巨大胜利。一连因此荣获“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该面锦旗现陈列在四平战役纪念馆）李广正荣立特等功，并获“毛泽东奖章”和“特级爆破英雄”称号。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李广正任二连排长，在锦州攻坚战中再次表现了大智大勇的战斗作风，连队突入城区后，副连长负伤，指导员火线任命李广正代理副连长，他带领全连机智勇敢向敌人纵深猛插，连续突破敌人防御阵地多处，出色的完成上级赋予的穿插分割任务。二连仅以伤亡八人的代价，取得了歼俘敌二千余名、缴获战防炮二十余门的辉煌战绩。战后再一次荣获大功两次，获“英雄奖章”一枚（辽沈战役纪念馆英雄榜是这样评价：李广正，七纵副连长，河北武清县人，曾创造连续爆破十二次的爆破战术新纪录，是一位勇敢的战斗员、优秀的指挥员和工作模范，曾立一特功、四大功、二小功）。

1949年1月，四十四军一三零师参加平津战役中，在天津市城东郊广东义地地区部署，李广正带领二连担任全师警戒任务，一天，敌军一个营突然向我军疯狂反扑，李广正指挥全连一边沉着应战一边向上级报告，团首长严令坚守阵地。他们一连打退敌人八次密集冲击，鉴于战斗的激烈和残酷，团首长来电话指示：“如果实在不行可撤退到后一防线”。而此时敌人第九次冲击已经开始，李广正对团首长说：“有我就有阵地”随即率领战友们顽强的迎击敌人。在英勇的战士们面前敌人最终放弃了反扑，乖乖地缩了回去，李广正又一次荣立大功一次，再一次荣获“英雄奖章”一枚。现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的英雄榜上李广正是唯一的天津籍人。李广正共参加战役战斗四十余次，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七次，共荣获“毛泽东奖章”一枚，“英雄奖章”两枚，“艰苦奋斗”奖章一枚，“勇敢奖章”一枚。

1949年4月，李广正光荣地出席了新中国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1949年5月4日又出席了中华全国青年代表大会，1950年9月再一次代表四十四军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及宴请！

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80年5月离职休养。离任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师副师长。1996年9月去世。

地导专家 周玉生

周玉生，祖籍天津武清，生于1938年7月30日，1963年毕业于西安西工大，同年11月入伍，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幸于1994年11月24日16时在西安病逝，享年56岁。

生前历任国防科工委二十基地三部二科助理员、空军第二实验训练基地技术部靶试设备室主任、三站主任工程师、二站总工程师、驻七八六厂军事代表室高级工程师等职。1988年被授予空军技术大校军衔。先后曾荣立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三次；1984年至1994年先后十次被兰空及空军表彰为“优秀知识分子”、“优秀科研人员”、“优秀专业技术干部”、

“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先进个人”、“精神文明先进个人”。199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58年他怀着对祖国无限忠诚和对国防科技知识的渴求被保送到西安西北工业大学，1963年7月以全优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巴丹吉林沙漠深处人称“不毛之地、死亡之海”的地空导弹试验基地，从事地空导弹武器检验、定型和科研试验工作。

入伍三十年来，他发扬基地第一代创业者“忘其家、忘其身、忘其亲”、“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无私奉献精神，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地空导弹事业。他以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夜以继日的、废寝忘食的刻苦攻关，解决了许多地空导弹试验任务中出现的复杂技术难题，取得了九项科研成果，其中四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1980年他作为空军进口雷达设备组组长，三次赴国外谈判，解决了设备进口中多项技术鉴定难题，为国家挽回近百万元的经济损失。1993年3至4月为引进新装备随团出国考察，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他在大漠深处奋斗了三十年；与妻子儿女分居了三十年；为地空导弹事业贡献了三十年。由于他常年的忘我工作和过度劳累、积劳成疾，以至身患多种疾病，但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在试验任务的第一线。

1993年12月他调入七八六厂军代室后，仍然继续攻关，执著追求，勇于探索，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敬业精神。他的感人事迹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空军报》、《工人日报》、《求是》杂志和中央电视台等市多家新闻单位都进行了宣传报道。

在周玉生逝世的悼词中这样写到：周玉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热爱军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呕心沥血、忠心报国、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他废寝忘食、任劳任怨、忘我工作；他生活俭朴、和蔼可亲、无私无怨、鞠躬尽瘁，为我军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他的一生是忘我而奉献的一生；是清贫而富有的一生，他无愧于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军队。他的不幸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地空导弹事业的一大损失。

著名藏传佛教学者、梵文学者、佛学家 张克强

张克强，号建木，1917年5月6日生于天津武清，一生长期在北京读书工作。他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深造，受教于陈垣、沈兼士、余嘉锡诸耆

宿，植根极厚，在文史哲各科，造诣极深。在魏建功先生领导下由他主要负责编纂的《新华字典》，无论在选字、正音、释文、证义各方面，均属上乘。至今已印刷上亿册，嘉惠国人，可谓大矣。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我们武清人张克强的贡献。

张克强居士潜心佛学，精研梵文、藏文，蜚声国内外，1956年应邀到印度，参加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年的学术活动，发表《大乘起信论研究》，在国际佛学交流中作出了贡献。与法尊法师一道将藏文《格西曲札藏文字典》译为汉文，是建国后第一部沟通藏汉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为国人学习藏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是他在法尊法师指导下，做出的又一贡献。后应聘在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古藏文研究班授课，还翻译了一些关于印度佛教历史的著作，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至今被公认为雅洁、信实、流畅的藏文汉译本上品。为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撰写宗喀巴、胆巴、阿底夏等藏传佛教大师的条目。另著有《布敦教法史经录义例》、《玄奘法师的翻译事业》。40年代初即应赵朴初居士之召到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任研究部及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兼职教授，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北京西藏佛教研究会理事。时人称颂他：“学贯文史哲，语通藏梵英”。

张克强居士为人诚恳，淡于名利，勤奋工作，不计其他。他以会为家，悉心钻研，为英文本《佛教大百科全书》(即《中国佛教》)、《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现代佛学》、《法音》撰写论文及条目数十篇，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系、汉语文系兼职授课，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子。他学识渊博，乐于助人，以自己丰富的治学经验传授青年。藏文史学名著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一书，就是他反复讲授多次以后译为汉文的，成为佛学界传颂的模范译本。

张克强居士自奉俭朴、待人和善、言行一致、坚毅不拔，是佛学界、宗教学界和民族语文学界深受爱戴的长者，在长达六年的卧病之中他仍念念不忘要为祖国四化做贡献。

张克强居士于1989年12月2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撰写了挽联：“为道精进，治学谨严，弘法叹才难，而今又弱一个；临事笃诚，待人忠恕，利生悲愿重，世间切望重来。”是对他一生不断追求学问的高度概括和褒扬。

著名侨界实业家、爱国侨领 李海天

李海天，祖籍天津市武清，出生于1923年6月6日。

李海天幼读诗书，勤勉好学，深受其尊翁影响。少时养成乐善好施，慈悲为怀之美德，慷慨解囊，自持豪爽之习性，待人以诚，处世以公，德泽广被，远近悦服，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他旅居日本五十余年，荣获日本中央大学法学士、明治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于侨界担任甚多重要职务，深受侨界崇敬与爱戴。因此，被蒋经国先生遴选为监察院监察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后来又被任命为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复遴聘为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总统

府国策顾问等要职。其后担任世华银行常务董事及副董事长多年，并担任纽约侨声广播电台董事长，同时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李海天经营海天航业、龙门商事、横滨国际假日大饭店等企业集团，于日本工商业界占有重要地位，对旅日侨界及日本社会颇有贡献。

李海天热心国际文化交流及中日关系发展，在横滨成立中华国剧同乐社，并发起国际梅樱狮子会，被推为会长。另于东京成立蒋经国中日文化交流基金会，担任主席，同时兼任中日关系研究会日本分会会长、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日本地区分会会长等职，对留日学生奖助、国际事业交流、中华文化复兴、中日关系发展，均不遗余力，勤奋以赴。

2006年6月，李海天率领台湾侨联总会访问团抵访中国大陆，受到时任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的会见，并且参加了中国侨联与台湾侨联总会共同举办的“和平与发展”论坛。此后，李海天老先生更加想“家”，几乎每年都要回大陆看看，病前还回大陆与亲属一起为父母迁墓安置在北京八宝山。

李海天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老先生一生坚持“中国一定要统一”的立场，坚决反对台独，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老先生多次信函来往，被汪道涵称为“神交”之友。李海天曾经在东京主办反“台独”大会，振臂痛斥陈水扁的分裂行径，遭到台湾“独派”的猛烈抨击，但他丝毫不为所动。马英九执政以后，作为全球华侨马萧后援会总会长的李海天老先生表示，民进党执政8年来，执意搞“去中国化”，排斥传统侨社。现在，熬过了“去中国化”的8年，侨胞脱离黑暗，重返光明。他经常对看望他的人说：“还要努力，我还盼着统一的那一天。”

海天先生的爱国精神，素为台湾各界及海外华侨社会所肯定，曾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颁赠华夏一等奖章、台湾光华二等、光华一等奖章等殊荣，另有奖状、奖牌、匾额、银盾、荣誉章等多种。正因海天先生对中华民族及国际社会有杰出的贡献，美国圣若望大学曾颁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兹表扬。海天先生一些可兹崇敬的往事，以为后世留存典范，并可纪念于永久。

中国情报科学家、著名管理科学家 杨沛霆

杨沛霆，1931年3月4日生于天津市武清大碱厂勾兆屯。195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1983年起先后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培训中心副主任、主任、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供职27年，主要从事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分析研究工作，1958年编写的《大爆破述评》是我国科技情报界的首批研究报告。上世纪60年代初，发表了《日本情报工作分析》、《情报理论若干问题》、《情报工作发展趋势预测》、《建立检索系

统的几个问题》等情报理论研究专著并参加编著了中国第一部情报工作教材《情报工作讲义》，在中国情报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主持情报理论和分类法研究工作期间，发表了《论情报的综合性与专业性》、《情报工作发展过程分析》、《关于使用统一分类法的商榷》、《关于健全我国情报体系的问题》、《情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一系列论文，对中国情报学科的发展和情报工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曾获得 3 项科技情报成果奖，并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在管理科学方面出版了《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的继承与发展》、《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科学技术概论》、《人事学》等十余部专著。

杨沛霆现任《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该杂志已成为我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刊物，在经济界、企业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杨沛霆教授历任《情报学报》主编，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协干部学院副院长等职。兼任过中国科技情报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管理学会等多个社会团体的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现代管理讲师团、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副团长，中国市长协会，“瞭望”杂志社，河南、广西等省市顾问。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杨沛霆教授曾先后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个人奖；中科院科技情报学研究成果奖；国务院国家级突出贡献管理专家奖；管理科学著作“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

天安门国徽的制作者、雕塑艺术家 郭效儒

他是中国国徽的制作者，但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至于这位老先生的身家姓氏，则似乎成为了一个谜。

在电视节目《建国 55 周年专题》中介绍国徽诞生的过程时，曾提到了已故国家一级工艺美术大师郭效儒老先生。这位郭效儒老先生的祖籍就是武清，曾用名郭通城，1921 年 6 月生人。尤其令人崇敬的是：他的许多事一直都默默无闻。几乎没有人还能够想到这个人就是当年国徽的制作者。

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毛泽东号”机车的车徽浮雕、香山碧云寺的孙中山胸像、南开大学的周总理青铜浮雕像……这些都是北京工美集团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效儒的作品。但是，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级人物，人们往往只记住他们的作品，而很快就会忘记这些作品的作者。据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在着手雕塑一尊郭效儒的塑像。而年轻一代的学生们早已不知道郭效儒是何许人也了。

那是 1951 年的秋天，雕塑家高庄用最短的时间塑成了国徽泥样。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的模具却怎么也打不开了，于是多次到郭老的“美术供应社”找他。建国初期，满北京城也没有几个真正学过雕塑的。但郭效儒是正经的科班出身，北平国立艺专（中央工艺美院前身）雕塑科出身，又读了 3 年研究生，之后留校任教。1948 年，郭效儒就以为辅仁大学公教美术会雕塑的“中国六朝时代耶稣圣像”而闻名艺术界。这是中西观念、风格在雕塑上的首次结合。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前，教会迁往意大利还特地带上了这件作品。因为郭老是雕塑科出身，所以他的办法就比较实用。他将高庄制作的石膏全部立体部分的凸起角度改为 75 度角，这样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而郭老改过的这稿也最终成为共和国国徽的定稿。至今，这枚国徽的小样儿仍然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

一天，郭效儒的一位邻居找上门来，原来，国际友人路易·艾黎 80 诞辰快到了。艾黎先生的一个养子非常想送给他一份礼物，想来想去，觉得给老人家塑个像最好。于是想到了郭效儒，就托这位邻居帮着给牵个线。郭效儒一听，这是一份孝心。很痛快地就应下来，只是叮嘱“多拿几张艾黎先生的照片”。

郭效儒选择了薄浮雕的艺术形式。薄浮雕像可以说是郭效儒的绝活，一个浮雕的厚度只有 5 毫米，但是浮雕上的图案却纤毫毕现。这种作品的创作过程必须像微雕一样，达到老僧入定的境界。郭效儒的女儿郭正懿现在还记得，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才取出玻璃板，看着案头路易·艾黎的照片，一点一点地将塑泥塑到玻璃板上。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父亲拿出一个薄浮雕石膏像，问她雕得好吗？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位面带微笑、慈祥的外国老人，眉目间凝聚着一种慈爱的神情。他就是路易·艾黎，但又不仅仅是。

路易·艾黎 80 诞辰的庆祝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郭效儒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当路易·艾黎浮雕像被揭开的时候，这位国际友人端详了许久。转过身来和郭效儒亲切握手，说：“你是我中国的知音。”后来，路易·艾黎回国的时候，特地将这幅浮雕运送回新西兰。现在，郭效儒的《路易·艾黎像》被新西兰博物馆收藏。

后来，郭效儒又创作了周总理青铜浮雕像、张仲景像、郑成功像、陈嘉庚像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纪念币等一系列传世佳作。直到 2003 年 6 月 27 日去世，仍有许多作品停留在草图阶段。郭效儒在一份简历中这样总结自己：“我由一名纯艺术家转向工艺美术工作者，走了一条与一般美术家不同的道路。几十年来，我总是根据国家的需要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基本上放弃了个人的创作。之所以如此，基于我在青年时代的两个追求：一是致力于把欧美雕塑艺术与我国传统雕塑艺术相结合，试图形成我国现代雕塑艺术风格；一是致力于把纯艺术与现代工艺技术有机结合，力图把我国工艺美术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工艺技术能力的实用美术工艺，以期为祖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现代蜡染之父、纤维专家 刘子龙

他是一位传承者，延续了中国两千年的民间蜡染艺术；他是一位开拓者，打开了现代蜡染艺术新的大门。他就是被誉为“现代蜡染之父”的刘子龙。

刘子龙，1941年9月28日生于天津武清甄马庄。1961年自办“子龙画社”。1965年从事纺织印染图案设计。1981年入中央工艺美院进修。1985年任唐山市彩色蜡染研究所所长、高级工艺美术师、河北省彩色蜡染中心总工艺师，同年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4年任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九三学社中科院第七支社社员。现任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旅游工艺品专业委员会会长。

1981年，刘子龙40岁，他对蜡染一无所知，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蜡染门外汉；

1983年，刘子龙42岁，他已被列为河北省“重点国家攻关科研项目”——彩色蜡染工艺项目的课题带头人；

1984年，刘子龙43岁，他带着79幅彩色蜡染画，以个人名义进驻中国美术馆主厅，成为我国在该厅举办个人画展的第一位现代青年画家；

1985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为其拍摄影片《刘子龙蜡染画》，译成七国语言，发往157个中国驻外使馆进行文化交流……

四十不惑方入行，四十三岁已在业内声名显赫。传奇何以生？刘子龙说，因为二十分钟！

刘子龙出生在一个赤贫如洗的家庭，因为家贫，他只上过几个月的艺术学校美术班。15岁时他已开始在一间蔬菜公司做临时辅助工；17岁到一家水泥厂；19岁失业开设“子龙画社”；23岁，国家个体户政策收缩，他再一次失业；次年，刘子龙在某针织厂开始他第一份正式职业——出口图案设计，一干十几载。1981年，时年40岁的刘子龙作为针织厂的重点培养对象，进入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进修。年逾不惑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他平凡的生命就此拐入另一个奇特的轨道，传奇开始了。

1982年，美国一流纤维艺术家、威斯康星州的大学教授罗·斯高先生来华讲学“纤维艺术”，刘子龙凭着勤奋好学的劲头在袁运甫教授的推荐下以编外学生身份挤进了这个仅有16个名额的特别班。讲学结束时，教授为每个学生安排了20分钟的结业定项单独谈话，点对点分析每个学生特点，帮助大家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就是这短短20分钟的谈话，让刘子龙的艺术探索道路发生了重大转折。

罗·斯高教授对他的蜡笔画——《暖色的阳光》大为赞叹，并深入分析，认为刘子龙最大的优势在于色彩运用上的独特和对色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建议他结合自己所长，去挖掘中国民间最传统、最古老、最原始的纤维艺术，在发挥纺织品的特长中挖掘自己艺术创作的潜力。

罗教授的建议让刘子龙久久不能平静，他反复回想、仔细斟酌，久酝胸中的一些想法一点点清晰起来了，他想到了蜡染，这流传千古的染织艺术不正是中国最传统、最古老、最原

始的纤维艺术吗？一个大胆的决定产生了——刘子龙毅然从西方绘画创作转向挖掘民间艺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蜡染的探索。

刘子龙的蜡染传奇开始了！

传统蜡染出于靛蓝染料的限制，一般是单色的，只作用于棉布，且容易褪色。刘子龙拥有多年的西方绘画经验，他的长处在于对色调的运用，但对蜡染却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在查阅一些资料后，突然异想天开：何不先在纸上做个试验？

纸上做蜡染？！但凡有点蜡染从业经验的，当时可能都要呵斥他荒诞不经、不懂规矩了！可刘子龙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还真就这么干了！当刘子龙拿出自己第一批蜡染画作品，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绘画系主任的袁运甫先生忍不住拍案叫绝，连呼：“你怎么画出来的？！”这位惜才如金的艺术家当即拍板：延长刘子龙的进修期。

袁运甫给刘子龙配了一间工作室，并让他结合自己对色彩把握的特长，攻克彩色蜡染画新课题。

一幅幅彩色蜡染画就这样以独立艺术品的形式从工作室诞生了！刘子龙打破常规，大胆地运用自己熟悉的绘画技巧，把他的思想、情感、个性完美地融入蜡染作品，既保存了传统蜡染纹理清晰、简朴明快的民族风味，又加入了独特的洒脱深厚的现代感和现代的绘画理念，作品极具现代感。同时他不断研究各种纤维材质的表现效果，进行科学试验，改进工艺器具和涂染方法，经过一年多反复试验，他终于在蜡染的材质运用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棉扩展到麻、毛、丝、化纤等多种织物。

1987年，刘子龙研制成功皮革蜡染绘画，同年申请专利。皮革上蜡染，匪夷所思吧！

1994年，刘子龙的彩色蜡染工艺法也获取了专利。

执著，是任何一个想要成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纵观刘子龙走过的道路，从他坚持自学绘画到从头摸索蜡染艺术，执著二字伴随他始终。生活的窘迫从没让他产生放下手中画笔的念头，在从头探索蜡染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不曾将他压倒。他就像一个执著的斗士，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始终紧握手中的画笔不动摇。这种精神曾带给无数坚持自己理想的有志青年莫大的鼓舞。

刘子龙拥有多项彩色蜡染专利，他一直抱着一个理想：让人们把我的蜡染画穿在身上。他的彩色蜡染工艺在行内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他领头的刘子龙艺术工作室做为一项极有国际市场前景的工艺项目，本身蕴藏很高的创新技术含量，适逢文化春风遍吹大地，它应该能生枝长叶、开花结果了吧？

体育界知名学者 杨钟秀

杨钟秀先生 1910 年 10 月生于天津武清，1932 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教育学院体育专修科，直至去世在教育战线工作了六十年。

解放前，杨先生历任山东大学体育助教，四川大学体育讲师，东北大学体育副教授、教授，解放后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体育系主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任吉林省体委副主任，吉林体育学院副院长，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任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名誉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7 年离休，1991 年 7 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50 年杨先生作为中国赴苏联体育考察团成员，对苏联体育工作进行了实地考察。回国后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体育系、科的教学工作计划，调整完善了课程设置，改革了教育内容，修订了各科教学理论实践的比重，建立了教学组织，培养了教师队伍，使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体育系步入了正轨，为我国体育系科的建设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杨先生一贯坚持学校体育是中小学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始终强调学校体育对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他始终认为：体育是研究人的，应该把发展身体，增强体质放在第一位，以造就体格匀称、肌肉坚实、动作协调的人。基于这种思想，杨先生强调对体育系科学进行理论知识传授的重要性，强调“三基”的示范性，并积极倡导科学研究，不断增设新学科，使当时的东北大学体育系较早较全地开设了几乎所有的体育基础理论课程，并使当时的诸如运动生理、运动生化、运动解剖、运动生物力学及体育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以及有关学科的师资队伍建设，都居于全国体育院系的领先地位。

在担任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期间，他积极主张体育教育改革，坚决反对旧思想、旧作风。在学科设置上，坚持体育理论课与术科教学并重的原则，课程设置计划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的肯定。1978 年以后，他在体育系又重新制定教学计划，增设了人体测量、遗传学、统计学、生物化学等课程，为此引起教育部高度重视。执教 60 年，他把毕生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祖国的体育教育事业。

杨钟秀先生工作认真，治学严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建国初期师范体育系建设和教材编写做出了重大贡献，填补了我国体育系教材建设的空白。1982 年，在杨钟秀教授及他所带领的学术梯队共同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体育理论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使体育系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所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体育院系之一，奠定了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发展壮大的基石。

杨先生不仅是一名出色的体育行政领导者，而且是老一辈著名的学校体育专家、学者。现今活跃在学校体育界的我国著名的王占春研究员和孙长林教授、林笑峰教授等都曾先后师从于杨先生。杨先生才思敏捷，知识渊博，他曾担任大学体育课及体育教学法、体育史、体育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而且于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先后培养了两批体育理论硕士学位研究生。

由于杨先生出色的工作和贡献，近年来，使他担任了较多的社会职务。1981年，他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编委。还担任过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会员，国家教委高等师范院校体育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会名誉理事，九三学社社员等职。

六十余年来，杨先生不辞辛苦，兢兢业业，辛勤的耕耘在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园地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对此，党和人民将会铭记不忘。

我国著名连环画画家 墨浪

著名美术家墨浪，字赞虞，原名王肃达，1910年6月16日生于北京，1963年9月逝世，祖籍天津武清，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专修科，曾任辅仁大学美术系研究员、辅仁中学教员，曾向徐燕荪学习中国画人物画。新中国成立后即投入年画、连环画创作，1951年参加人美社任创作员、编辑，他在《水浒》画库中创作的《石碣村》、《大破连环马》、《三败高俅》都是上乘之作。《石碣村》在1963年全国首届连环画评奖中获三等奖，是这套画库中优秀作品之一，当年曾专门印成24开本，供美术爱好者作为范本。他传世之作还有《青陵台》（1957年人美社）。晚期更显出艺术功力之炉火纯青，《满江红》连环画。以遒劲刚健的笔法表达了岳飞的浩然正气，带病创作将近完成时突发心脏病去世，留下了未完成的一部传世之作。

墨浪为人清正廉洁，绘画功底深厚，画风古朴细腻。曾画过《冯木匠做黑板》、《石碣村》、《大破连环马》、《愚公移山》等多部古装作品。并与他人合作二十多部连环画。《牛郎织女》是墨浪先生的鼎力之作。正当先生倾其心血，悉心作画之际，却不幸因故逝去。这部作品也就未能完成全稿，而成为先生的遗作。

《牛郎织女》连环画，原作全部130多幅图画，现仅存107幅，其中有一部分是尚未完成的铅笔草稿，墨浪先生的画犹如工笔绘画，线条精致细腻，人物形象俊美，服饰物品逼真，意境栩栩如生。要使这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得以完整出版，重见天日，确实并非易事，这就需要由一位有深厚绘画功底，风格又接近墨浪先生作品的画家，才能胜任此项续绘工作。通过北京连环画家谭元杰教授、连环画收藏家王家龙先生的热心推荐，由中国美术出版总社连环画出版社邀请广东著名连环画家姚柏先生续绘墨浪先生遗作《牛郎织女》，终让《牛郎织女》四十年后得以“鹊桥相会”，成为连环画坛值得称颂的一段传奇佳话。

台湾国学大师、著名企业管理专家 张家麟

他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国学大师，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修为，使他解读的《易经》深入浅出，切中时弊，成为企业领导者、政府官员修炼领导智慧、提升人生境界的必修课。他是一位著名的企业管理专家，不仅能从中国古典哲学角度分析企业成败原因，用现代西方管理理论指导实践，而且是一位能从战略面到执行面均能胜任的管理专家，他就是张家麟。

张家麟，祖籍天津武清王庆坨，1956年12月出生于台湾。他涉足军事、政治、教育、企业、科技、哲学及传媒等多个领域，既有深厚学术理论作基础，又有丰富国际企业实践经验，曾任台湾中国报总编辑、副社长，泰国向日葵集团（曼谷）助理总裁，IBM北京市场总监。现任中国农业大学MBA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EMBA专任教授，清华大学项目管理（PMP）培训中心专任教授，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石化集团党校专任教授，国家电网公司党校专任教授。

张家麟于1992年开始接触大陆经贸事务，对大陆自改革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着深入的了解，并对中国的人文社会，有着深刻的学习与体验。2000年定居北京后，从事两岸贸易与学术事项。自2003年起，成为自由讲师与顾问，并深入中国大西部，从事传播新技术（卫星与网络）对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重视国家动力学的实践工作。曾为一汽集团等十余家企业进行有效的顾问咨询工作，并为国内百余家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各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开课培训及企业内训工作。他的每个课程都是本着“以客为尊，务实解读”的态度，进行专精设计，为企业“量身定制”，曾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联通、中国医药集团、999集团、西安杨森、步长集团、东瑞制药公司进行了内部培训，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平均每年给企业做内训都在150天以上。其中，《周易文化与战略》、《企业执行力》被北大等多个总裁班定为主讲课题。由他讲授的课程深入浅出，幽默风趣，既有大家风范，又能关注细节，许多人评价张教授是他们听过众多课程中不可多得的企业教练，是大陆为数不多集多年跨国企业实践经验与深厚管理理论于一身的企业资深顾问。

张家麟怀着一腔赤子之情，从台湾回到大陆，把广博的学识投入到祖国和平统一和民族大业之中。中央电视台曾在《海峡两岸》节目中对他进行了专题报道。当谈到家乡发展变化时，张教授浓浓的乡情溢于言表，并坦言尽自己的力量，为家乡的发展，献上一颗海外赤子的拳拳之心。

一代武术宗师 王培生

1981年在沈阳体育馆内，中国武术界人士与日本少林拳访华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技术交流会。会上，王培生以其精湛的太极拳艺博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日本少林拳手们钦佩之余，邀请王培生前往日本讲学。

王培生，1919年3月24日生于武清梅厂，在军阀割据，战火不熄的时代，三岁就随父母来到北京，定居东四海演乐胡同。

王培生自幼喜爱运动，尤其嗜好武术，且爱看武戏。对戏中武打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并常因此摔得鼻青脸肿。

在王培生的邻人中，有一位沧州吴桥马戏团的把式。此人身怀绝技，善翻斤斗，她见王培生喜好此道，就指点其翻斤斗之要领，初时只在他腰上一挑，又嘱他直腰抬眼，由此王培生领悟到凡事皆有要领，而要领即事之诀窍，循此一往，无有不利。这个简单的概念，竟为其以后在鉴别、选择拳种，领悟拳理的道路上有所侧重地向前发展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以后王培生又随父母搬到东四甘雨胡同，又练起摔跤，一日，王培生正在门口耍红缨枪，一枪向外擀去，恰好这时门口走进一位老者，见枪尖径奔面门，略一挥手，使其脱手而飞……

这位老人就是八卦掌名师马贵，字世清，人称“螃蟹马”，马贵当时已有七十多岁，但精神焕发，步履矫健，这天恰好外出探亲而遇此事，后经马贵亲戚的推荐，王培生遂拜马贵为师，从学八卦。

十三岁时，王培生又向张玉连习教门弹腿，年底又拜杨禹廷为师学太极拳。他三门一起学，天未亮即起，练过硬功夫。在中华路先演十路查拳，十路弹腿，后练八卦掌，太极拳，直至太庙开门又转入里面再练。

那时北平太庙成立了“太极拳研究会”，并设有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艺。杨禹廷在此任教，王培生随杨老师边学边教，历时数载。

王培生十八岁时，杨禹廷看他勤学苦练，日夜不辍，功夫日渐精进，足可独立施教，遂将北平第三民众教育馆武术教练的职务让给王培生担任。不久，王培生又开始教授家馆。

王培生生性侠义，好打不平，亦常遇较技者，一生中轶事较多。一天，王培生去天津探亲，路过一武场，见一壮汉，臂刺青龙，演练形意。王培生看到妙处，不禁脱声叫好。

岂料那壮汉已大步追出来一定要与王比试一下。王无奈只得应允。说时迟那时快，壮汉一个虎扑扑来，王随用一个太极“下势”，使其重心前倾，随后又用‘上步七星’将其打倒。当时，王培生才十七岁。年龄虽小，太极拳却已运用到纯熟自如的地步。

王培生虽然技艺大成，但仍好学不倦，为钻研万家之所长，悟拳术之至理，十九岁时又带艺拜师，从形意拳师赵润廷习拳。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街头到处见持枪佩刀的日本兵。一日，王培生前往“太庙后

河拳社”拜访王芑斋先生，恰遇五六个日本兵，尾随其后，来至拳社。

王芑斋不在，其徒洪连顺正在演练虎头双钩，见王身后日军簇拥，以为是王带他们前来挑衅，不禁面色铁青，虎目圆睁，日本兵受此敌视，心怀忿怨，又以为王是这里的头头，迁怒于他，当王培生告辞时就与其并步而行，寻机报复。

走出不远，突然一个日本兵抽出刺刀朝王腹部扎来，王不慌不忙，看准时机，用太极的抱虎归山，一手抓住对方握刀的手，另一手向其腰部捋去，这个日本兵当即仰面跌出。

接着又扑上来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径直向王的前胸扎来，王即用“进步栽锤”，使其前栽倒地。第三个日本兵持刀从背后袭来，刀尖直奔王的后心，王异常敏捷，一个转身，旋用八卦掌中的周仓抗刀，将其仰面摔出，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连续打倒三个日军，动作干净利落，旁观者无不高声喝彩。剩下的几个日本兵见王功夫了得，不敢再动，悻悻而去。

王培生此举在日本占领区内，陡然增长了中国人的威风，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王培生时年二十，武艺胆量俱各惊人！与“太庙后河拳社”的误会，事后亦得到澄清。

1946年，韩幕侠先生由津来京，王培生又从学于彼处，蒙先生指点形意、八卦，武艺更臻妙处，此外，王又从梁俊波先生学通臂，从吴秀峰学八极，广采博纳，孜孜以求，从此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器皆演纯熟，而其中尤以刀枪剑棍最为精通。

王培生常说：“多知则懂，一通百通，技艺虽不同，而其理则一。”王培生苦心孤诣，穷尽一生之精力，正是要从诸兵百艺中悟出一条武学的至理。

1947年，王培生应邀与“神枪”李书文之弟子张立堂、“鼻子李”李瑞东之弟子高瑞周、韩幕侠之女婿马逸林等几位武术家在北京汇通祠成立了“汇通武术社”，为研究武学，发扬国术作出了贡献。

解放以后，王培生在北京各大院校，如北京工业学院，师范学院，矿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等，为师生们教授太极拳。1953年参加了华北地区民族形式体育大会担任评判工作。1954年又参加了在北京成立的“群众武术社”。

王培生除在西单体育场教拳外，还在院校、医院、疗养院进行教拳。几十年来，正式拜王为师的达一百多人，从学者数以千计。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党政干部、老红军战士以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此外，王培生还应各省市体委的邀请，前往讲学。并经常会见世界各国来华访问的武术代表团。

王培生晚年，武功已臻上乘，拳理亦至彻悟。他把太极、八卦、五行用科学的思维融于一炉，用科学的方法付诸实践，并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揭示了他们的内在联系、生化之道和运行规律，由小见大，一通百融。

王培生虽然居室简陋，却门庭若市，或谈论武学，切磋技艺，或拜于门下，精诚学艺，甚至有朋客远自千里而来，为求一晤，得其片言片语，奉若至宝。太极拳学之理不仅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大成，而且也是古代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它包括了医学、力学、心理学等领域，其内容之丰富，道理之深奥，非潜心钻研，实际操作难以谙其妙旨。

王培生的主要著作有《太极拳》《太极剑》《太极刀》《太极粘杆》《吴式太极拳三十七势》，并且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向国内外发行，为武术的推广作出了贡献。

王培生先生一生致力于继承弘扬中华武术，执著地研究武术攻防技艺，钻研太极拳推手理论，武术著述丰富，武术技艺精湛。王培生先生以其尚武崇德的高尚情操，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创新精神，赢得了众多海内外武术爱好者的钦佩和敬仰。2004年9月3日走完了他85岁的武术人生，为中华武坛留下了丰富的武学遗产。

电影导演艺术家 高天红

提起高天红，也许年轻一代不会有什么印象，但如果提起他导演的影片，三十岁以上的人应该很感兴趣。苏里导演《奇袭白虎团》时，高天红是执行导演，但后来并未署名；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彦夫导演拍《创业》时，他又是执行导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导演拍摄的《新中国第一大案》在全国引起轰动，而在公映之前，中央领导还亲自审查了该片，其中许多细节至今尚未披露过。

高天红，原名高永安，1934年生于天津武清大良侯家庄，195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2年毕业后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历任场记，副导演，导演。

“文革”期间，上级要求把八个样板戏拍成电影，长影厂分到两部任务，《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高天红被分在《奇袭白虎团》一组，为苏里和王炎做副导演，那时候叫联合拍摄，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连名字也没上银幕。

拍摄过程中，上级反复调片子到北京审查，还提出了许多技术上的意见，比如逆光拍摄、要出绿什么的。高天红老师解释说，逆光拍摄可以使画面显得凝重，有力度，更容易衬托正面人物。但逆光拍摄弄不好会发黑，尤其是树木、花草的绿色，由于与黑色很近，常常出不来，要出绿，就需要很高的技术。

为什么让高天红做执行导演呢？因为那些演员都直接与上边有联系，不好支配，而高天红“头上没辫子，身后没尾巴”，不会出大的问题。影片拍摄完成后，剧组到北京搞了一次总结，这时，连紧张带累，高天红的腋下鼓起了个大疙瘩。总结的时候，是八个戏都拿到人民大会堂放映，一部一部地讨论。那时候，周总理已经身染重病。一次，记得是后半夜3点多，高天红上厕所时遇到了周总理，见总理很瘦，便关心地问总理身体怎么样了。周总理说：“没事，不要紧的。”但能看得出，总理的神情是很疲惫的。

《创业》这部电影那大概是 1973 年开始创作的，长影厂派出一个四人创作小组，于彦夫任导演，张天民任编剧，高天红和华克任副导演。他们就开到大庆油田搜集王进喜等人的资料，后来又去了胜利油田和玉门，搞出一个提纲后，由张天民执笔写剧本。

片子拍了八个月，冷，艰苦。导演于彦夫扭伤了腰，心脏也不好，常常躺在草地上，支部书记就让高天红做了执行导演工作。片子公映后，影响很大，举国振奋，其中秦咏诚作曲的歌《满怀深情望北京》流传至今。

后来影片遭到了扼杀，剧组人员坚持给毛主席写信，说明此片的意义。不久，毛主席的批示下来了：“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1975 年 7 月 25 日。”这就是有名的“7·25 批示”。批示一下来，全剧组人员欢欣鼓舞，作为执行导演的高天红更是激动不已。

新时期以来，高天红导演还拍摄了《雁鸣湖畔》、《玉碎宫倾》、《神奇的土地》、《神丐》、《风尘女侠吕四娘》、《神龙剑侠吕四娘》、《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多部影片，还亲手创作改编了多部反映历史和现代题材的影视剧，这期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很多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其中，《玉碎宫倾》还获得了厄瓜多尔第七届国际儿童电影节荣誉奖。而在拍摄表现打击腐败干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片子《新中国第一大案》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经亲自看片审查，他又经历了更为惊心动魄的场面。这部影片荣获第十五届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电影《关东民谣》获吉林省第八届长白山文艺奖提名奖，并荣获第九届“全国农业电影神农奖”影视剧类银奖；故事片《神奇的土地》获优秀故事片奖，他所在的摄制组获故事片特别奖。

1994 年高天红被授予中国当代艺术家称号，并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家名录》；1999 年获世纪艺术家称号；2008 年，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授予他“共和国艺术家”称号。他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导演家协会、中国电影文学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会员，中国电影第十六届金鸡奖评选委员会委员。

退休后的高天红仍然热爱自己从事的影视事业，一有同事前来取经，他都毫不保留地奉献出来。业余时间他还写写论文、散文、评论等，在报刊上发表，对“红学”、书法、金石也有涉足。耄耋之年的高老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虽然我离开家乡多年，但故乡的那种亲情，使我始终难忘，我要在有生之年为家乡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

一代书法大师 孙有恭

提起孙有恭，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他是谁，但提起北京的密云水库，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密云水库”的库名恰是孙有恭书写的。当年，孙有恭称得上是京津地区，乃至全国的书法大家，尤其在天津享有很高声誉，清末学者，曾主讲莲池书院，以至于在第三届中国

（天津）书法艺术节上，入选二十世纪津门百名书法家名录。

孙有恭（1894—1977），字敬轩，是原东蒲洼街北章庙村人。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尤其擅长颜体。十几岁时，在天津经营文房四宝的宝文斋学做买卖，聪明伶俐的孙有恭经常和一些文人墨客打交道，耳濡目染之余便开始练习书法。虽然时间不长宝文斋的买卖就日渐萧条，但孙有恭临池不辍，每天晚上在油灯下专心练字。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开了一个经营文房四宝的门店——振轩书局，寓意振兴自己书法事业的志向。他十分崇尚书法大家华世奎的书法风格，经常买华璧老（华世奎的尊称）的字，在二楼临摹。华世奎曾官居清廷正三品，是赏加二品顶戴的大臣，可谓官高爵显，清帝退位后，以省亲为名在津隐居。一次，他在店前摆摊卖字，书法大家华世奎正好路过，看到孙有恭的书法很有功力，连声称赞。当场有人认出华世奎。孙有恭急忙上前叩拜华老，并约定择日上门求教。几天后，孙有恭登门拜见了这位书法大师。华老对孙有恭格外重视，在多年的交往中，将书法中的“进”、“退”之理口传心授给他，使其书法技艺突飞猛进，为他独具一格的书法艺术奠定了基石。

孙有恭 20 多岁时，其书法技艺已名闻天津，被公认为书法界的“奇才”。以至于后来华世奎特别赠送给孙有恭一枚“璧臣华世奎”的印章，并嘱托说：今后为别人写字可署华老名讳。

孙有恭善于从继承中求得变化，既追求古帖的真意，又能抒发个人性情，在严谨中求变化，于平稳中显精神，体现了他的睿智与灵性。他的书风以厚重见长，但不失隽逸；以静穆为主，但不失灵动；以宽博取胜，但不失缜密。其颜体小到蝇头小楷，大到擘窠榜书，均极精妙。在华老的影响下，他讲究用行书的笔法做正书，以严谨的楷书笔法入行书，做到出入潇洒，使转分明，遒劲古朴，浑然一体。他讲求间架结构，方圆兼施，内紧外拓，蕴含筋骨，秀润飘逸，雍容壮伟。面对简化汉字的具体写法，他以积极严肃的态度对待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从间架结构到运笔规律，做过不少理论性的探索，其治学精神，给书法爱好者树立了楷模。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受华世奎的教导和影响，加上他自身经历的磨练，孙有恭修养很好，人品极佳，待人诚恳，有求必应，对同道多赞许，对求教者多鼓励。

可惜的是，孙有恭生未逢时。解放前，从天津回到老家，种了几十亩地，那时地里十年九涝，根本收不了多少粮食，但解放后，他被划为地主成份，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而此时，正是孙有恭学识与书法水平的全盛时期，只因为家中贫困和诸多条件限制，没能进行大规模书法艺术创作。但他把生活的辛酸往事、不懈的求索通过对书法独特的理解融入到他一点一滴所凝结的艺术境界之中，释放自己的品格、睿智、情感、思想、心境……十年“文革”期间，红卫兵把他仅存的一部分书法收藏品也抄走烧毁了。此后，孙有恭不幸患病导致思维迟钝，失去了他所热爱着的书法事业，于 1977 年 9 月 14 日离开人世。

孙有恭从自学书法至临终近 60 年不曾辍笔，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被选为当时县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政治生涯增加了他的修养和品格，培植了他书法艺术的深层内涵，他的书法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每年春节，很多人慕名而来求他写字。他写字一不要钱，二不着急，一个一个地认真书写，从不怠慢。

孙有恭现存的书法作品为数不多，尤其是在社会上较为罕见。有一套手抄本《红楼梦》

中的金陵十二钗图背后的题诗是孙有恭亲自书写的，现手抄本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天津市区他过去曾经书写过大约 40 多个牌匾，其中有的是代表华世奎写的，如：东北角的“马聚源鞋帽店”、劝业场对过的“华竹百货商店”、滨江道上的“仁昌百货商店”等。他曾书写过“天津百货大楼”几个大字，虽然没被启用，但现在已作为藏品被珍藏起来。天津文物公司也收藏有孙有恭的书法作品。在武清，他书写的牌匾也曾不少，比较有名的如“四一四毛主席纪念馆”。1958 年国家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全国许多书法家在京开会，国务院向众书法家征字，孙有恭写的“密云水库”四个大字备受专家关注，最终被周恩来总理选中，这成为孙有恭书法成就最杰出的代表作。

著名民间武术家、长春市八极拳名师 宋碧山

宋碧山先生是武清区黄庄人，生于1917年正月十一，名贵云，字碧山，幼年随父亲闯关东到长春，在洋服店当学徒、做工。

宋碧山自幼崇尚武侠，被武侠仗义豪情所感染，尤其是武清传奇武侠“鼻子李”的故事，对他影响很大。

宋碧山18岁与师兄李广荣一起，在长春随山东海阳县拳师孙沛立练习尹氏八卦、罗汉拳半年。孙沛立回籍，宋碧山无师自练。

宋碧山20岁时（中华民国26年，伪满康德4年，1937年。），经少林名家严昆山引荐到三马路武馆拜周馨武先生为师，宋碧山与师兄董连碧一起在德胜楼饭店请客递帖拜师，得周先生亲自传授十趟弹腿。

八极拳圣手“神枪”李书文的高第弟子“神枪”霍殿阁（溥仪的武师，教授溥仪武艺。）先生当时在三马路武馆传授八极拳，霍殿阁直接教李树南、陈金财、尹庆和三位核心骨干学员，后面的学员由他们带练。在周馨武先生的督促下，宋碧山在师兄陈金财、李树南带领下练习撑捶、迎面掌等八极拳内容。霍庆云当时也来三马路，与来访切磋的武术名家比试，这样三马路的武馆誉满长春。

宋碧山在洋服店工作，每天晚上工作到八一九点钟，下班跑着到三马路武馆，抓紧时间练武，非常刻苦，练到深夜，时常住在武馆。同时宋碧山诚实忠厚人品好，逐渐得到老师和师兄兄弟们的喜欢。

1939 年霍殿阁把李树南、陈金财、尹庆和三人挑选到家中武场（北头）深造。一个月以后，在师兄陈金财、李树南、尹庆和的推荐下，宋碧山、董连碧也来到霍殿阁家深造。李树南、陈金财、尹庆和、宋碧山、董连碧在宾宴楼饭店请客举行仪式，正式递帖拜师入霍殿阁门下。

陈金财、李树南、尹庆和、宋碧山等到霍殿阁家中武场后，不忘周馨武先生的推荐恩情，为了报答周馨武先生，他们在霍殿阁家中武场练习四至五天，在师兄陈金财的带领下再到三马路武馆练一至二天，协助周馨武先生教学，八极的更多内容进一步传到三马路武馆。

刘霖春在四马路开个拳房，拜霍殿阁为师，宋碧山又介绍师兄李广荣到四马路学习，同时王玉胡和宫内府的司机朱某等人也在此学习，霍殿阁到时，陈金财、尹庆和、宋碧山等也随师去练习。

1939年到1942年，宋碧山跟随霍殿阁习武，得到霍先生的亲自传授和点拨，学得八极小架、金刚八式、八极拳、八极对接、六大开、八极应手拳、劈挂掌、易筋经第一、二、三、四趟、高老道108太极拳、六合枪、夜战刀第一趟、纯阳剑以及搂桩靠打、崩弓、掌板、吊球、扇球、挎球、吸球、铁沙掌等功法。

1942年霍殿阁去世后，宋又回到三马路武馆练习。由于宋碧山直接随霍殿阁学三年，功底潇洒漂亮，劲道独特无拙力、无犟劲。很多师弟请他调架子、教枪圈、教溜刀势等。

时局动荡，宋碧山家境窘迫，得师兄弟龚天德、杨斌大力帮助。长春被围困，出卡子后，宋一家生活陷入窘境，逃难到公主岭，得师兄曲一心慷慨相助。后为避战乱，举家赴黑龙江，宋碧山以做服装为生。

新中国成立，宋碧山于1950年重返长春。并于上世纪50年代初参加长春武术研究会任会员。60年代，与霍庆云、陈金财、康绍远、周明德、高里和等一起担任长春武术裁判工作。60年代中期武术研究会成立研究组和表演组，霍庆云、陈金财任研究组教练，宋碧山和姜瑞担任表演组教练。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至今，宋碧山曾先后在家中武场、北安路小学、人民广场、儿童公园、南湖公园、松原市等地大力传播八极拳，桃李满天下，其弟子徒孙在各级比赛中成绩优异。几十年来，宋碧山在教授和传播八极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碧山先生博采众长，先后学习了国家套路二十四式、四十八式、八十八式太极拳及太极推手，并义务为爱好者辅导，为提高群众的健康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宋碧山先生曾担任南关区武协八极拳研究会会长。现在担任长春市南关区八极拳研究会顾问。

1994年亲自赴沧州小集，参加霍殿阁、霍庆云的树碑立传仪式。

2000年10月，应辽宁省武协主席、八极拳研究会会长王国强（尹庆和先生的弟子）的邀请，担任沈阳八极拳大赛仲裁顾问。并以85岁高龄，应邀表演八极小架，得到行家赞叹。

90岁高龄时的宋碧山先生，仍不遗余力的传播八极拳。在儿童公园亲自指导徒子徒孙滑大杆子、进顶抱肘、朝阳手等，示范讲解六合大枪的拥挫、带环、缠战等精要和六大开三盘连进的窍要。

宋碧山是霍殿阁的递帖亲传弟子，故他习武时行拳走架非常的潇洒自然、舒展大方，一招一式交代的准确到位，自然灵巧无拙力，在他身上可以看到霍殿阁习武的影子，有相当高

的武学文化价值，值得后辈的珍惜、效仿、继承。

宋碧山先生尊师重道，对师爷李书文、师父霍殿阁等前辈非常敬仰、崇拜；对周馨武的人品、武学知识非常的钦佩；对老师兄霍庆云、陈金财也是执礼甚恭；与其他师兄弟互爱互助感情融洽。宋碧山先生德艺双馨，对后辈真诚教导，诲人不倦，是一位慈祥谦和的师长。他教导弟子徒孙，习武先修德，诚信为本，崇尚礼义廉耻，他极其重视传统道德，堪称师表。

2006年8月6日，宋碧山先生抱病率众徒子徒孙参加师兄霍庆云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并在大会致辞。

2006年2月11日，长春市武术协会主办了宋碧山先生的90岁寿诞庆典，对其在传播八极拳和全民健身活动做出的贡献，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独具哲眼的书法家 李世文

他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专业，他曾担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虽然是官员，但他却是一位在书法理论和创作中以及在美学领域都有很深造诣的大家。他就是李世文，现在是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教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书协、沈阳艺海拍卖代理中心顾问，河北省第九届政协常委。

李世文，1943年11月生于武清大王古庄乡利尚屯村，1967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专业，历任丰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承德地委宣传部长、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兼副主席等职。

他在任承德地委宣传部长期间，组织拍摄了《关外青山》、《紫塞明珠》、《青松岭的人们》等电视片，组织编著《山区经济学概论》，主编《个体和私营经济经营者必读》。个人发表过时政、哲学、经济学、散文、影视评论等百余篇，2004年与人合著的65万字《书学美学詹言》，引起书法界的关注，获河北省政府第十届社科优秀成果奖，还有政治经济学专著和编写五卷本《资政大典》中的《历代政治家诗赋名篇》。其书法作品入展中国（天津）第二届书法艺术节和全国首届老年书法展，以及多次省级以上展览，并被国家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西安碑林博物馆、国家体育场（鸟巢）收藏。还曾参加日本、韩国、泰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书法艺术交流活动。

李世文先生以行草书见长，风格静雅飘逸。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传统的钟情。略参于右任笔意，又增加了几许沉雄老辣。所书唐代刘禹锡《陋室铭》和李白《月下独酌》横幅，可窥其源流。所书中堂《枫桥夜泊》和四条屏《醉翁亭记》，气韵生动，浑然一体，是难得的佳作。由此可以品出世文先生挥毫时从容不迫的心境。正如蔡邕《笔论》所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

世文先生原本不是书家，然其潜心临池，积十数年所得成此气象，实在是来之不易。他

的字一如其人：不板不滞，平生所学、所感、所悟、所得溢于字里行间。

作品要创新，须得传统精髓。功力不深，认知粗浅，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便会误入左道旁门。正如卫铄《笔阵图》所指：“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赡，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纵观古今有大成就者，哪一位没有深厚的传统根基？哪一位没有渊博的知识积累？哪一位没有经年的执著追求？

世文先生的书法不仅是勤学苦练而成，而且学识修养是他书法的培养基，也是他成功的支点。

古今中外的文学和书法、绘画、音乐艺术创作，描绘形象、传递情性、追求诗意和撼动心灵既相通互动，又殊途同归。尽管这一切肇于自然和源于生活，但艺术是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展示。无论是学术的还是艺术的作品，都是作者心智的果实。

世文先生的人生阅历，学识修养与书法创作厚积薄发，互动相生，各有所得，正是其独到之处。由此，观世文先生的书法，当重宏观，莫拘具象。假以时日，勇猛精进的他，自会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李世文先生虽然是官员，但和其交谈，感受更多的则是一个学者的谦和。其思维敏捷，谈及书学美学抑或是更宽范围的书法美学时，旁征博引，令人受益。谈书法创作、谈人生哲理，更有一番独到见解。此种视界，唯学者所独有。

李世文先生在其入选“全国第五届书学研讨会”的论文《书法与辩证法》中高度概括：“辩证法与书法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从动态的书写过程中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静态的书法作品上看是灵魂与形体的关系；在主体与客体融会贯通的学书历程方面考量，是指导方法与实践体现的关系。”时人多以为，书法传统中所提到的“精”、“气”、“神”、“韵”表述的是一种模糊的整体观，在审美上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是较难把握的，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语表达的意象，虽然有其形质为基础，但多凭个人的感觉来评判。而李世文先生却能把这些用辩证的思维进行简练的具象概括：“古代书法名家反复指出的精、气、神、韵、性情是什么？是顿挫之、郁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扬之、藏而处之、垂而缩之、往而复之、逆而顺之、袭而掩之、空而坠之、架儿抢之、蜚而伸之、收而纵之等辩证用笔出现的笔势、笔意、笔态；是雄浑、飘逸、跌宕、险绝、牵连等笔画偏旁辩证组合而形成的字法、章法的千姿百态。”

很显然，这种对书法艺术内涵的精炼概括，是得益于他对哲学及美学观念的深刻体味。

在谈到习练书法的境界时，他说，书法本身存在技、艺、道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书通大道”，即达到了融会贯通的时候，可以体现出生命的韵律，可以蕴涵世间万象，可以涵盖天地古今。从微观角度看，在书法创作中对立统一这一哲学基本规律无处不在，如运笔方向的顺逆、行笔速度的疾涩、用笔空间的提按；形成线条的长短、粗细、斜正；结体的疏密、参差、向背；用墨的浓淡、燥润、干湿；布局的对称、平稳、错落等等，不一而足。习书过程中的“顿悟”是日积月累的豁然开朗，是量变质变规律的体现。而线条的“一波三折”，学书过程中的平正—险绝—平正则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写照。总之，书作的内涵、味道全由哲学的元素构成，没有哲学的思维即创作不出书法佳作。

在谈到对自己还有哪些期待时，李世文先生说：“孔子曰：游于艺。欧阳询说，学书为乐。我赞成上述观点。我喜好书法，能有机会、有条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很幸运的。在习书过程中我心情舒畅，肢体得到了锻炼，既促进了相关知识的学习，又能以书交友，实在是一种享受。因此我练习书法不在意结果，更注重美好的过程。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比结果所给与我的多得多。这个过程会伴随我一生。李世文先生的谈话处处蕴含着哲理。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刘长瑞

刘长瑞 1919 年出生于天津武清县后巷村，幼时家境贫寒，在村私塾就读 3 年，随即辍学在家。17 岁时，刘长瑞赴天津学习瓦工技艺，学徒 4 年期满后，闯关东来到黑龙江，在佳木斯、鹤岗、双鸭山等地辗转谋生，卖工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掌握熟练瓦工技艺的刘长瑞定居佳木斯，1952 年 6 月成为市第一建筑公司工人。仅仅一年，因为劳动出色，成绩突出，思想进步，刘长瑞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4 年，由波兰援建的友谊糖厂破土动工，刘长瑞所在的一建公司负责施工。在紧张的施工中，刘长瑞发挥特长，埋头苦干，以高标准的质量完成砌筑任务，连续突破生产纪录，深受有关部门及波兰专家的好评。年内，他 4 次受奖，被提升为瓦工组长。

在平凡而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刘长瑞常年坚持不懈地勤奋工作，兢兢业业，率先垂范，是名副其实的“工作狂”，曾创连续 7 年出满勤纪录，连年超额完成任务。每当遇到生产任务紧张时，他就带领工人加班加点，不分日夜连续奋战，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成为全市建筑工程战线的一面旗帜。为提高砌筑技术水平，他带领全组人员刻苦钻研瓦工技艺，坚持推广“苏长有双手挤浆和三段砌砖法”等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工作条件，创造了细砂罩面抹灰法，先后制作大瓢铺灰器、挖冻土机等 20 余种先进生产工具，改变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实现半机械化施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刘长瑞小组连年荣膺公司先进生产小组及省、市红旗小组称号，其本人多次被评为各级先进生产者及劳模标兵。

1959 年，刘长瑞成为佳木斯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此后，刘长瑞作为佳木斯市先进人物代表 9 次进京，6 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3 年，刘长瑞任佳木斯市建筑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1976 年任佳木斯市总工会副主席。1989 年去世。

象棋名宿 谢小然

谢小然，1913年出生于天津武清上马台小于庄。1929年进北平求学，就读于私立民间大学专门都预科，一年后拿到文凭。续学法律本科，因病及经济窘迫，未完成学业，走向社会，以象棋残局在东安市场设播，会遍京城高手，无人能胜，成为当时北方名噪一时的象棋大师，曾与南方象棋大师杨官麟先后对局三次，一胜一负一和，平分秋色，遂有南杨北谢之誉。

谢小然与张德魁、那健庭、侯玉山等同为北京象棋高手，解放后开办“天然轩”棋社，后在先农坛体校教象棋，弟子有刘文哲、傅光明、方士庆、陆兴、王国栋、尹乃文等人，亦对王嘉良、臧如意、谢思明、喻之青等进行过指导。下棋之外，谢小然对棋规多有研究，多次担任全国比赛裁判、裁判长，同时培养出众多裁判员。1980年开始担任北京棋院副院长，并为北京市政协四、五、六届委员，出版过《象棋精编》等书。

谢小然从五十多岁起，因为血压高，由象棋转向围棋，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连围棋大师聂卫平都是他的队员，而且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入队的老队员。据他说是在赴外地比赛的火车中，聂卫平让他两子，他赢了，成为棋坛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79年，在西城区象棋队的一次内部比赛上，两位队员发生争执，继而许多队员参与其中，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一位队员把在一旁下棋的尹乃文叫过来，说：“你是谢小然的学生，你给评评谁该变。”乃文上前看了看，说：“红方两打对一打，红方应变，不变判负。”黑方听了洋洋得意，红方虽不服气，但乃文是队中最权威的裁判，一锤定音，平息了争执。

谢小然很关心棋队的活动，每次活动之后，都问一问。这次也不例外，乃文就把红黑双方的争执讲给他听。听着听着，谢老的脸色就变了，说：“你这么判对吗？红方两打对一打，应该不变作和！你的判决是错误的！你不要认为不是正式比赛就可以轻率地发表意见，这是不负责任的，做裁判不应该头脑发热，自以为是！”一顿数落之后，谢老态度有所缓和，说，“你抽个时间，去给红方赔礼道歉，承认那个判决是错误的，错在哪儿了，要给人家讲清楚，求得人家的原谅。”乃文连忙答应。谢老又说：“这不算完，你要把最后的结果跟我说一下。以后遇到这种事要冷静，想周全了再发表意见！”

乃文完全按照谢老的要求办了。后来听了“汇报”之后，谢老很满意，说：“这就对了。”

为迎接1975年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北京要组织一支象棋代表队，为此进行了一次选拔赛。

选拔赛在先农坛体育场进行，裁判工作由谢小然主持，裁判有董齐亮、徐家亮、刘国斌、杨长生、黄蔼林、迟金祥、赵敬寿、李国玉、尹乃文等。关于裁判工作，谢小然常说的一句话是：裁判员是为运动员服务的，要把比赛顺利进行放在第一位。乃文说，谢老对比赛用钟很重视，每次赛前都仔细检查，时、分、秒针必须在一条线上才行。选拔赛期间，每天比赛结束后，都要总结。这天，谢老主持总结会，说，今天没出什么事，大家表现都不错，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之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说没有。这时候，谢小然突然点了尹乃文

的名字，问：“你今天表现怎么样？”乃文怵谢老，见问，战战兢兢地站起来，说：“我认为工作凑合，没出什么事。”

水利水电施工专家 商树清

商树清，1927年12月26日生于天津市武清南蔡村马庄村。1951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同年分配到水利部工作。1954年调入黄河水利规划委员会，1956年调入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先后在三门峡工程局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副主任工程师。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任水电部第十一工程局党委委员，1977年任十一局总工程师，1979年任十一局副局长。1982年，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1983年任十一局局长，1985年兼党委书记。1986年当选为三门峡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商树清是一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组织才能的水利水电施工专家，他先后参加或领导过荆江分洪工程、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筹建工程、渠村分洪闸工程和洛河故县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他毕生从事水利水电施工，为发展水电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8月，商树清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水利部当技术员。1952年春天，商树清参加了荆江分洪工程，前后长达三个月，直至工程全部完工。起初，商树清被分配到土石开挖部门，但他很想从事结构方面的工作，于是向领导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领导将他调到混凝土大队专门负责模型板的工作，这使他的专业特长得到发挥。工程完工时，商树清被评为乙等功臣

此后，商树清被调到水利部设计局，从事办公大楼设计工作，担任结构组的组长。他努力工作，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己的结构设计水平。1953年底，被燃料工业部评为二等奖。1954年，黄河研究组改为黄河规划委员会。年终，商树清因工作成绩突出又被燃料工业部评为二等奖。

1956年，商树清来到三门峡，参加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商树清当时任设计分局技术员，金属结构组副组长。最初一个阶段，负责部分施工附属工程设计。由于在截留栏石栅上的成功设计，确保了三门峡截流的顺利进行。

商树清在实际工作中认真细致，谦虚谨慎，踏实肯干，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1958年2月，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63年，商树清由助理工程师升为工程师，1965年5月由工程师升为生产技术处副主任工程师。此时，商树清已由一个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水电技术骨干，成为生产技术处的主管技术的负责人。

1970年，商树清参加了小浪底水库的初步设计工作，并任河南省小浪底水库工程筹建处生产组组长。1972年担任筹建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年，与其他人员提出小浪底水库

的扩大初步设计报告。

经过多次大型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的考验，商树清已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水电工程施工专家。1978年，故县水库的恢复施工将其推上局党委常委、总工程师岗位。

由于商树清性格细致谨慎，对工作认真负责，没有丝毫马虎，未雨绸缪，才制服了意外的洪水，为保住黄河大坝立了大功。

1981年成立了“三门峡工程领导小组”，专门解决底孔磨蚀问题。商树清多次参加有关研讨会，组织专家学者实地勘察，为探索黄河泥沙规律，解决底板磨蚀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1984年天津勘测设计院试验特种深水围堰，由十一局进行施工试验，取得成功，为底孔改建创造先决条件。1985年，此项成果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商树清的工作得到上级部门的认可和广大群众的拥护。1979年，他被提为十一局副局长；1981年，他任第一副局长，仍兼局总工程师；1982年，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出席了党的十二大，同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83年5月任十一局代理局长，8月任局长。1985年2月，任局长兼党委书记。

1986年12月，商树清任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担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他对于建立健全市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和工作制度，对于人大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对于三门峡市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经济建设等，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为三门峡市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88年10月，商树清患病住院，1988年12月30日20时逝世。

纵横自有凌云笔 ——记在京武清籍画家 丁世儒

早在朋友处得知，我的老家有一位在《北京日报》颇具影响的编辑、主任记者，叫丁世儒。后来，通过了解，他不仅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摄影家，而且还是一位在首都书画界卓有成绩的山水画家。

许多见过丁世儒其人其画者均有同感：这位曾经是《北京日报》星期刊·《名人生活》专版的编辑，人洒脱、画潇洒，这是丁世儒给人的第一感觉。

丁世儒，1943年生人，祖籍天津武清。1957年小学毕业考入杨村一中，在杨村一中求学的他，就已经在绘画方面崭露头角，他的钢笔画、漫画经常在天津地区《渤海日报》上发表。1960年初中毕业前夕，他和杨斌同学一起成为北京电影学院和河北省话剧院选中目标，

为了不放弃心爱的绘画事业，放飞自己当画家的梦想，自己还是割爱了当演员的机会。后来，17岁的丁世儒在武清杨村一中成了河北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两校考官们的角逐目标——面目清秀、才气充溢的丁世儒画技突出，学绩优秀，且已有在《渤海日报》等大报频发作品两年有余的历史。结果河北美院“败北”，他进了中央美院附中，踏上了美术训练的正规之路。

如同一只辛勤的蜜蜂，他不停穿梭于百花园中，酿取四面八方的营养。他酷爱作画，更喜读书，技艺和知识与日俱增。1962年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口号声中，风华正茂的丁世儒同正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的10名热血青年一起，毅然放下钟爱的画笔，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7年的军旅生涯中，他用手中的画笔记录着意味深长的历史，一幅幅速写、钢笔画、木刻、连环画、剪纸不断在军内外报刊上发表，总计二百余幅。1965年，他被选送全军新闻摄影培训班学习，深厚的艺术绘画基础，使他在摄影方面得心应手，他的摄影作品开始在军内外报刊上大量发表。1968年，他又被派往越南战场担任随军新闻摄影干事，在历时一年的时间里，拍摄新闻照片近千幅，积累了大量的历史珍贵资料。

1979年丁世儒转业到《北京日报》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第二年，他被中国摄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在多年摄影方面取得的成绩，使他被编入“五四”以来中国知名摄影家《中国摄影家辞典》一书中。

丁世儒的山水画，师承国画大师董寿平先生，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呢。

那是1979年的一天，丁世儒在荣宝斋欣赏名家画作，董寿平先生的一幅《黄山烟云》吸引了他。当时他并不了解董先生，不过画如其人，他从中品味出作者一定是位修养颇深，知识渊博的人。一采访，果然不错，这位长者不但满腹经纶，而且和蔼可亲。打这以后，只要有空，丁世儒便去看董先生作画，细心观察布局、运笔、设色，回到家里便展纸挥毫，把看来的技巧融汇吸收。几年过去了，董寿平先生只知道他是记者，而不知道他在习画。偶然的时机，董先生在一个画展上看到了丁世儒的作品，老人十分高兴，当得知是从自己这儿学去的时，颌首欣欣然：“没想到，世儒的文章好、摄影好，画的国画也好”。更称赞他是个有心人。俩人从此结下了忘年之交。

那些年，丁世儒白天采访、写稿，夜晚拖着疲惫的身子进入斗室作画。他作画与众不同，首先是阅读中外名著、古今佳作。他认为，只有博览群书，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作品才能格调高雅；只有达到“物化吾身”，才能心随笔运，取像不惑，达到造化天真的境界。其二，当自己胸怀锦绣，情凝笔端之时，他打开录音机，让世界著名的轻音乐弥漫室内，方铺开宣纸，挥毫泼墨，让高雅之意境、高古之意趣、浪漫之情调，尽情融入白云、高山、流水之间……，唯有如此，名家对他的水墨山水画评价为：“运笔刚劲、气势雄奇、山谷隐显、松梢出没，气韵生动、笔墨俊秀，颇有耐人寻味的境界，唯如此，1985年和1990年，他的个人画展在北京举行后，受到日本、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际友人的青睐，多幅作品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一些作品收在画集中。国画作品《松下问童子》被台湾国父纪念馆收藏。

翻开《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作品集》，首幅国画即是他的《听泉图》，欣赏他境界深远的山山水水，翻阅他作品集中的件件作品，只见一位文静的儒者翩然而至。

钟情于绘画的丁世儒，业余时间并未放弃过画笔。他师从董寿平先生后，其山水作品运笔刚劲有力、墨色温润饱满，端详他的作品“云之态以万千，无一同也；以至云之色相、云之性情，无一同也”，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艺术享受。他的山水作品不断刊载于报刊上，部分优秀作品被编入《北京画家名鉴》、《中国著名书画家作品集》、《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作品集》等画集中。1985年，他在京参加了《五人国画展》；1991年，他举办了《丁世儒画展》，他在山水画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1年他成为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熟悉丁世儒的人都称他为“三栖记者”，这话一点不假。他主编的《名人生活》专刊，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采访过许多社会名人，不少政界、文艺界人士题字赞扬他。他还结集出版了《华夏英才》一书。他是集摄影、美术、文字于一身的记者。“纵横自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这或许也是丁世儒的为人之道吧。

如今已经退休的丁世儒，仍然精力旺盛，他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他喜欢自己驾车，经常外出写生，每日临池不辍，经常画到深夜十二点钟。世儒先生极为珍惜时间，他给自己起的斋号叫“系日斋”，意思是用绳子系住太阳，他就有充足的时间作画了。他如“夸父诞宏志，乃与日争走”。

世儒先生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大运河书画院院士、北京市老年记者协会书画院副秘书长。退休前曾任北京日报集团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我们期待着世儒先生取得更大的成功。

著名影视演员 高兰村

46集长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是中央电视台继《太平天国》之后倾力推出的又一部鸿篇巨作。来自南京军区话剧团的著名演员高兰村继在《太平天国》里成功塑造了“天王洪秀全”之后，这次又在《康熙王朝》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清初名臣“那兰·明珠”，惟妙惟肖、入骨三分的表演再次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目光。

兰村其人

高兰村，1米80的个，相貌硬朗，双眼皮大眼睛，眉宇间有阴鸷气质，英武的鼻子，洪亮的嗓音，魁梧的身材，典型的传统模式中话剧舞台上的硬派英俊小生，着一身戎装，更显潇洒帅气。高兰村生于1955年10月1日，祖籍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曾是西安话剧院演员，主演过多部大型话剧。

提起高兰村，广大观众其实并不陌生。早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他与郭达、杨蕾合作的小品《产房门前》便赢得满堂喝彩，他扮演的那位口是心非的计划生育干部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高兰村说他名字的来历颇为有趣。高兰村说：“我出生在兰州，生日恰好是 10 月 1 日，当时老娘说叫‘国庆’的太多了，咱们住在兰州铁路新村，就叫‘兰村’吧！后来听我这名字总容易联想起《追捕》里的矢村警长，人们也经常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后来，一家人来到西安，对表演充满喜爱的高兰村在高中毕业后直接进了当地的剧团训练班，从此干起了表演的行当，一干就是 29 年。这段经历让高兰村有颇多感慨，他说：“那些年的工作环境是很封闭的，我非常怀念 1983 年到 1985 年这段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的生活，是上戏的老师让我看到一个全新开放的表演世界，收获很大。也就是在我毕业那年，我的老师把我引荐给陈家林导演。我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努尔哈赤》，这也是陈导的第一部电视剧，在剧中我演的是努尔哈赤的内弟金台石。”

与陈导结缘使高兰村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表演才华得以施展，与陈导之间也逐渐建立起默契。在《唐明皇》（饰杨国忠）、《远东阴谋》（饰河本大佐）等大戏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在中央台的大戏《三国演义》中，他又成功地扮演了司马昭。在长达 20 多年的合作中，高兰村对表演的投入和敬业精神给陈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太平天国》埋下了伏笔。

兰村的从军梦

高兰村从小就十分想当兵，夜里经常梦见自己身着军装手握钢枪守卫边防的威武英姿。他常说：“作为一个男人，如果没当过兵，那将是一生的遗憾！”在二十多年的艺术道路上，这一梦想始终涌动在他内心深处，从未放弃。他把他的激情、他的才华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一部部沉甸甸的作品中，从 18 集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中的金台石到 20 集电视剧《格萨尔王》里的格萨尔，从 80 集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昭到 20 集电视剧《远东阴谋》中的河本大佐……，他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或古代或近代、或正面或反面的军人形象。

1998 年，在《太平天国》剧组，他结识了南京军区话剧团演员队副队长赵景文，一下又激起了他心头伫留已久的冲动。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铺垫，兰村以他特有的直率，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心中的愿望。赵景文大喜过望，将这意外的收获当即向团里作了汇报。求才若渴的前线话剧团当即决定特招高兰村入伍。2000 年 11 月，高兰村如愿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现役军人。

无愧于心

高兰村的敬业精神和表演才华在戏剧、影视界是有口皆碑的。当年在拍《三国演义》时，尽管兰村饰演的司马昭只有 5 集戏，他却在剧组“耗了”整整 8 个月！中央电视台在筹拍《太平天国》时，著名导演陈家林和制片人靳雨生舍弃众多的明星大腕，毅然选择了高兰村饰演洪秀全，对他的重视与信任可见一斑。兰村不负众望，厚积薄发，把这样一个难度极高的人物塑造的血肉丰满，生动传神。所以，当陈家林再次接手《康熙王朝》时，毫不犹豫地就把“纳兰·明珠”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给了高兰村。尽管是排在第三号，但康熙的童年、

少年和成年是由三个人扮演，孝庄皇后也只有前半段戏，而明珠宰相则是由始至终贯穿全剧，从戏的分量上说，无疑是最重的！该剧试演时，不仅得到同行、专家的认可，更是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圈内许多熟悉高兰村的人说，兰村该火了，熬了这么多年，轮也该轮到他了。

其实，对火不火的问题，兰村从没想太多，20多年来，他只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执著前行，一切顺其自然，无愧于心。

从事影视演出以来，高兰村先后主演过《唐明皇》、《三国演义》、《太平天国》、《康熙王朝》、《中国轨道》、《大敦煌》、《大明奇才》、《远东阴谋》等几十部影视作品。

在接受采访时，高兰村正在成都外景地拍戏，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高兰村割舍不掉雍阳的根脉，仍在忘我地工作着。他说：“虽憾未出生在武清，但乡情、亲情永远在我心中流动，我是武清人，我要为武清人争光。”

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专家 杨作龙

"宠辱不惊"是一种大气，杨作龙就是这样一位大气的文化人。他把大气融入生命，把文化融入工作、学术、生活的点点滴滴，把流传千年的师范精神灌注于每个河洛学子的心中。有人说他不苟言笑，但如果与他深入接触后才知道那是一种儒雅、一种真正的学者风范。他用人格和常识向人们传授为人、为学、为师的道理，用智慧和大气为河洛文化的发展努力着。这一切都源于他热爱生活、热爱河洛文化……

杨作龙是历史研究专家，1945年生于天津武清王唐庄村。1998年，他被任命为洛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2000年，学校更名为洛阳师范学院。上任后，他首先思考的问题就是学院如何构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体系。他想到了传承千年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河洛文化。杨作龙所倡导的师范精神正是发源于洛阳，是河洛文化传承下来的一部分。谈及洛阳的教育典故时，他对人们侃侃而谈、旁征博引：东汉时期的洛阳太学，鼎盛时拥有太学生三万人。作为洛阳太学教授生员的博士是钦定官学的“为人师范”者。东汉政府规定，举荐博士的标准是“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经明行修”。这些思考，让杨作龙坚定了突出文化特色的办学方向。

2002年9月，“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在洛阳师范学院成立了。2005年，“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成为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实现了几代河洛文化人的梦想，这其中也蕴涵着杨作龙的心血。随后，杨作龙又精心开办了“河洛大讲堂”，邀请中外文化名家来学院讲学，“河洛大讲堂”很快成为了洛阳师范学院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线。这些都迅速地提升了洛阳师范学院的知名度，并很好地促进了学院师德和校园文化的建设，为学院创造了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

谈起洛阳师范学院的发展，杨作龙又一次提起了师范精神。“洛阳有这么丰厚的文化积淀，怎么把它用到培养人才上，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坚持师范精神。战国时期洛阳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白圭，他在生意上有套理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同样，这些年一些高校对师范教育逐渐淡化，朝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而我们学院恰恰是要强调师范精神，这是我们学院的特色，也是我们学院的根本。”杨作龙认为师范精神不仅仅是培养学生的一种意识，更是培养一种文化、一种做人的理念。

繁忙的日常工作，挤走了杨作龙所热爱的学术研究时间，使他的“学术研究有点落下了”。但翻看他的学术成果表时，人们感受到了杨作龙院长的谦虚，并惊讶于他是如何挤出时间完成这些项目、著作和论文的：主编、撰写《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原文化景观》《相似诱导教学模式研究》等著作；发表《我们播种河洛之爱》《河洛文化导扬》《探索河洛文化的物象之源》等有影响的论文几十篇；他主持的世界银行贷款课题“相似诱导教学模式”在1998年结项，并在教学中得到广泛推广，引起省内外诸多教学单位的关注和参与，获河南省2001年教学成果一等奖……

杨作龙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史学地研究与探索，做学问很踏实、很严谨。他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河洛文化的研究方面更是成效显著，已形成独立体系，被国内许多专家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为尽快用于教学，这些学术研究都是杨作龙挤时间完成的。他在《河洛文化导扬》中写道：“《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继是继承，是传承；成是蔚成，是发展，是更高的层次。古人讲，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格物致知，意诚心正，然后齐家治国。从文化角度而言，齐家是指地方文化。就是说，对文化的传承要从地方文化开始。要使本地文化和外地文化优化相融，以衍生新的文化，河洛文化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今天我们对河洛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仍然要与之同归一途。”从中可以看出杨作龙对河洛文化研究的热爱。

在人们的想象中，杨作龙应该是威严的一个人。其实，与他交谈过的人，都说他为人谦和，是个很平实的人。他从来不讲空话，一般也不给人讲大道理。与他交谈可以享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的教育和启发。不管你是一位教师还是一位学生，他都会非常诚恳地与你交流。

作为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专家，杨作龙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享受生活仿佛是一种奢望。其实，杨作龙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平时喜欢书法，在书法艺术上颇有造诣，并引导了很多人学习书法以提升文化艺术欣赏品位。

中国国际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原董存瑞纪念馆馆长 谢云生

2005年4月22日，在省会石家庄召开的河北省发展红色旅游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会议上，隆化县董存瑞烈士陵园管理处被评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进集体。该陵园解说员谢云生同志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他的爱岗敬业精神及先进事迹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谢云生本人被评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先进个人。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长在接见谢云生时，听说他是守护董存瑞烈士陵园长达30年的天津知青时，连声赞道：“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呀！你还是天津知青！”

省委书记和省长称赞的谢云生，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天津知青谢云生。

一、慕名英雄，守护陵园

谢云生，1945年出生，祖籍武清上马台小于庄村。1969年初从天津市来到董存瑞烈士的家乡—隆化县插队，成为一名知青。因慕名董存瑞的英雄壮举，于1976年被调到存瑞烈士陵园工作。30年来，他既当工人，当过电工、木工、油漆工、石刻工；又当干部，担任过资料员、宣讲员、摄影师、会计，美术师等多种工作，多次被承德市、隆化县两级政府授予先进工作者，2005年4月荣获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

在守护烈士陵园的长期工作中，谢云生由于工作需要，长期从事绘画、美工工作，因此，也成就了他的绘画、书法艺术，目前是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政协书画协会会员。

二、陵园的建设者，优秀的讲解员

谢云生在长达30年的陵园建设中，先后四次因工负伤，落下很多病根。尤其一到阴天，身体上的各种病痛令他难以忍受，但他从没有因而耽误工作。

隆化县董存瑞烈士陵园初建于1954年，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开始初建时规模、形制都较为简单。为了提高陵园的展示水平，谢云生开始自学木工、油漆工、雕刻工，自备各种工具，亲自动手对陵园进行维护、扩建。每年“5·25”前，园内都要对各项纪念建筑进行维修、粉刷，为了给单位节省开支，他总是蹬上8米多高的亭柱亲自刷漆、镌刻，有几次头部被屋顶置物砸伤出血。董存瑞牺牲遗址处有一块重约5吨的巨石，为了突出这个标志，需要在上面刻字。本来单位可以雇人雕刻，但为了节省开支，他自告奋勇，在冬季的凛冽寒风中，在室外进行雕刻，仅用一周的时间，就把表面凹凸不平的标志石刻好了。多年来，谢云生每年加班都在两个月以上，从未收过单位的加班费。三十年来他累计加班近60个月，等于做了三十五年的工作，为单位节省资金10万余元。

1998年，是董存瑞烈士牺牲五十周年。为了缅怀先烈，充实展览内容，陵园管理处领导决定，把历年来中央和各个地方的各级领导为董存瑞烈士书写的50多幅题词，篆刻在石碑上，决定下来时，快到4月中旬了。为了能在“5·25”纪念日到来之前完成布展工作，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谢云生吃、住在办公室，每天加班加点，终于在“5·25”之前将全部题词篆刻完毕，使珍贵的墨宝栩栩如生地展示在纪念馆内，而谢云生为此却大病一场。

董存瑞烈士陵园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我国今后重点发展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来园参观人数逐年增多，每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参观游客近 20 万人次。在一年又一年的接待工作中，他始终用董存瑞精神激励自己，声情并茂的讲解，热情周到的接待。

200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这年，来园参观拜谒的人络绎不绝，这年，阴雨连绵。谢云生受过伤的创口剧烈疼痛，但他从不声张，硬是忍着难以忍受的病痛，和园内其他讲解员们冒着绵绵细雨，在烈士纪念碑前每天一站就是 10 多个小时，进行精心讲解。三天时间先后接待了 40 多个单位、近万名参观者。

7 月 1 日那天晚上八点，唐山矿业公司新党员要在烈士纪念碑前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当时谢云生已经讲解一整天了，别人已经下班回家了。为了确保入党宣誓顺利进行，让新党员通过学习存瑞精神得到党性锻炼，谢老师主动承担了接待讲解工作，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下班。

经过多年建设和陵园职工的努力，2004 年董存瑞烈士陵园被列入我国今后重点发展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听到这个消息，已近退休年龄的谢云生兴奋不已。恰逢此时，谢云生 82 岁的老母亲从天津打来电话说：“云生，你该回天津陪陪妈妈了，你在外面太辛苦了。”在天津开公司的女儿也说：“爸爸，到我的公司来吧，每月给你几千元。”其实，谢老师何尝不想早点回天津，多陪一陪母亲，多陪陪家人，但是一想到 30 年来在存瑞陵园工作的幸福和快乐，他总觉得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60 个春秋，谢云生的青春和大半人生是在存瑞烈士陵园度过的，他离不开自己深爱着的事业，更离不开这块让人感动的热土。面对白发苍苍母亲的恳求，面对女儿期盼的目光，他舍弃了自己小家庭团圆的机会，说：“我要留在存瑞陵园，甘做护花泥土，用我的整个生命永远弘扬存瑞精神。”

三、造诣高深的书画艺术 清白自尊的人格精神

谢云生在书法、绘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作品在省、市书法比赛上多次获奖。目前，存瑞烈士陵园的碑刻、书画、书法及讲解词等都是出自谢云生之手。

谢云生早年曾拜天津著名书画家张骞为师，自学山水、人物，在耕耘书画 50 多年的艺术生涯里，由博及约，锲而不舍，遍临北魏碑刻、汉隶碑版、以传统为师，进而达到“大用外腴、真体内充”的书风。

根据他的艺术成就，谢云生被吸收为河北省书法家协会、天津市政协书画家协会、河北省硬笔书法协会、北京东方书画院、吴道子艺术馆等单位的会员、理事，还是中国书画艺术创作中心的顾问，其作品被《东方之子翰墨春秋人物》、《中国老年书画作品集》、《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精品大典》收录，并在省、市、国家各次评展中获奖。在澳洲、加拿大、美国等地他的书画作品受到极高礼遇，多幅作品还被国际友人收藏。2001~2002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第十届反刻和书道展》中，谢云生的书画作品入选。

数学家 宋国栋

宋国栋，祖籍天津武清下伍旗高辛庄，1937年9月生于吉林省双辽县，1951年未读完小学就参加了工作，在双辽县油酒厂、县工业科、农具厂等单位先后担任收发员、出纳员、车间记录员、调度员等职务。工作中勤奋好学，自学了初、高中主要课程，逐步成长为工厂的技术骨干，1956年6月加入共青团，同年为响应“向科学进军”号召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哈尔滨师范学院数学系专科调干学习。

195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齐齐哈尔化工学校。同年任无机物工艺专业教研组组长，1959年12月任齐齐哈尔化工学院基础课教研室主任。1960年秋至1962年春回哈尔滨师范学院运筹学研究生班进修。“文革”期间1969年下乡到甘南县东阳公社中学任教三年多。1972年回齐齐哈尔轻化工业学校参加校化工厂筹建工作，先后任材料计划员、设备科协理、动力车间主任，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2月任齐齐哈尔轻工学院数学教研室副主任，1979年评为讲师。1979年2月调任科研生产处科研科代科长。1981年12月任副处长。1984年2月调任基础部主任，1986年9月晋升为数学副教授。1986年12月任齐齐哈尔轻工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1993年2月晋升为教授，1994年7月任学院党委书记。

长期以来，他坚持行政与教学科研双肩挑，一直在教学第一线上课。先后为中专生、大学生、教师提高班和研究生讲授了高等数学、工程数学、运筹学、实验设计与数学模型、数理方程、技术经济学、图论方法、宏观调控的优化方法，计算方法和计算机程序设计方法学等课程。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注意改革教育方法，1981年4月参加黑龙江省高校教学经验交流，并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1978年以来，在图论应用领域的几个方面和著名难题“斯坦纳最小树问题”潜心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所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平面折线的最小斯坦纳树的研究》，经黑龙江教委组织专家鉴定认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某些问题达到了国际水平”。出版了专著《管理科学中的图数论方法》，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其中在美国《离散计算几何》等杂志发表的名为《四点集上斯坦纳最小树》、《有总量限制的资源最优分配问题》等五篇文章被《美国数学评论》评介。《欧氏平面斯坦纳最小树分解定理》一文还由美国海卓尼克出版公司收入专集《离散数学与计算机科学新进展》第五卷“斯坦纳最小树专集”中。《随斜波的最短网络》等10篇论文，先后在美“世界科学出版社”专集上出版，或在美国运筹学会与全美管理协会联合会等1985年以来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1981年以来有近20篇论文被省、市级学会或科委评为优秀论文。

1981年、1986年两次获齐齐哈尔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6年获黑龙江省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被评为齐齐哈尔市优秀专家，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出版的《世界传记大辞典》第21版和《成功者》一书第14版上已全部登载了他的传记。

现在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运筹学会理事；中国图论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数学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运筹学学会副理事长；黑龙江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及经济系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齐齐哈尔市数学学会副理事长；齐齐哈尔市哲学学会理事长。

科普作家 焦玉麟

焦玉麟，男，1942年1月生，天津武清郎庄子人。副编审。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任航空知识杂志社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系中国及北京科普作家协会、中国航空学会、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和中国科普期刊研究会会员，航空知识编委会编委。从事科技刊物编辑多年，共编辑科普作品1350多篇，约达500多万字，发表于《航空知识》与《航空模型》两种杂志。其中《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和《无人侦察机的现状和发展动向》两文，于1993、1997年先后获中国科普作协的全国优秀作品评比编辑一等奖；《航天中的失重问题》、《无人驾驶飞机的崛起》、《苏联无人航天队的新兵》和《中国的返回式卫星》四篇，于1980、1987、1991和1996年分别获得中国科协、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科普作协的全国优秀作品评比编辑三等奖。参与主持编辑的《航空知识》和《航空模型》杂志八次荣获中国科协、中宣部、航天部、新闻出版署等颁发的全国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和三等奖，一次获国家期刊奖。主要作品有《人造地球卫星》、《谈谈运载火箭》、《微电子学与精确制导武器》、《当代武器大全》、《航天史话》、《少年航空学》等260余篇（部），共约200万字。其中《无人侦察机的现状和发展动向》一文，1997年获中国科普作协的全国优秀作品评比创作一等奖；《苏联无人航天队的新兵》与《中国的返回式卫星》两文，1991、1996年分获中国科协、新闻出版署和中国科普作协颁发的全国优秀作品评比创作三等奖；1968—1973年参加了北京航空学院的无人驾驶飞机的研制工作，成果曾获奖。

体育教育家 郝承瑞

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由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题词，海天出版社出版《体育人名辞典》，虽是亚运盛会的一朵小花絮，却也是我国体育界的一件大喜事。这部辞典共收入我国300名体育教授的传略及他们为我国体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其中，就有著名体育教育家、西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教授郝承瑞。

郝教授1934年出生于天津武清下朱庄村，1955年毕业于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专修科，毕业后到大西北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甘肃工业学校、甘肃工业大学任教，1962年调入西北师范大学体育系，从教四十八年，于2003年退休。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不知洒下了多少辛勤的汗水，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以对体育事业的深切挚爱和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勤勤恳恳地工作，兢兢业业地育人，以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为体育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甘肃省六十年代以来的第一位体育教授。

1956年郝承瑞曾代表甘肃省参加全国体操锦标赛，以后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和裁判工

作。曾多次担任省、市级体操、武术、摔跤、举重等项目比赛的裁判长、仲裁主任，以及全国性的举重、柔道、摔跤等项目比赛的仲裁，1985年被国家体委授予“全国优秀裁判员”称号，1996年被国家体委授予举重“国家级荣誉裁判员”称号，1997年被国家体委授予武术“国家级荣誉裁判员”称号。还先后担任过兰州市体总委员，甘肃省体总委员，甘肃省摔跤、柔道、击剑协会主席，甘肃省学校体协副主席，甘肃省武术协会副主席，甘肃省举重、拳击协会主席，中国教育协会体育研究会理事，甘肃省高校职称评定委员会体育学科组组长等职。1988年被国家教委聘为全国普通高等院（校）体育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1993年被国家教委聘为全国高等院（校）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1983年以后担任过第八届兰州市政协委员，第五、六届甘肃省政协委员，第七、八届甘肃省政协常委，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2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在1993年民进甘肃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进甘肃省委副主委，同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九届中央委员，1997年在民进甘肃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进甘肃省委主委，同年被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届中央委员。

郝承瑞先后被聘为《柔道与摔跤》杂志社特邀记者、甘肃保安学校顾问，现仍担任兰州通备武学发展研究会总顾问和甘肃省拳击、跆拳道协会顾问等职。

郝教授不但教书育人，而且积极组织参与体育竞赛活动，在武术、举重、摔跤、体操等项目上有所造诣，是甘肃省重竞技协会主席、武术协会副主席，为推动甘肃省重竞技项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为了尽快提高体育项目竞技水平，介绍和引进国外先进的体育技术和经验，郝教授编译了《武术》、《空手道运动》、《柔道入门》（与李其彪先生合译），发行十万册。其个人传略被收录在《中华武术实用百科》、《中国武术人名辞典》、《体育人名辞典》等辞书，填补了我国柔道教材的空白。先后在全国十几家杂志社发表了学术文章。

郝教授不但是位体育教育家，而且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民进甘肃省委主委的他，为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尽着自己的微薄之力。

四十八个春秋，四十八载艰辛。如今簇拥郝教授的已是满园桃李。

著名文物鉴赏家 云希正

云希正，1936年4月出生于天津市武清区西陈庄。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天津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常务理事、《收藏家》编委、《天津博物馆文物精华》特约编辑顾问。曾任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馆长。曾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云希正 1960 年就读于天津新华业大历史系，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曾在北京大学中央第三届考古训练班进修，参加过陕西省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和黄河水库考古队对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唐墓的发掘及庙地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回到天津后，云希正又主持了张贵庄战国古墓的发掘工作。在任职期间曾为国家收集和鉴别出一批极有价值的古玉珍品以及其他各类馆藏文物。从考古部门转到文物鉴定机构和博物馆后，云希正曾以出土文物为标尺，较系统地探讨传世玉器的鉴定和断代问题。

在实际工作和教学中颇有建树，曾在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讲授中国玉器发展史，并应邀出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物馆系、东方艺术系硕士、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还担任各地文物出境责任鉴定员（玉器类）考核教师，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各省市博物馆一级文物鉴定确认工作。为提高基层人员素质，1977 年云希正还在武清及其他各地为基层文物培训班讲课。1997 年，他应邀出席了在香港举办的中国明清书画精品展。

2007 年开始，云希正受聘担任天津文博系统“名师教室”导师。

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使云希正见证了天津文博事业从初建到繁荣的全过程，同时，也使他收获颇丰。他先后参与了清宫散佚在天津文物的清理、展览、上缴工作，澄清了这批文物（12 件清宫书画）为东北博物馆所为的讹传，并参与了建国初期天津市三次文物捐献的接收工作，成为文物捐献的亲历者、见证者。

云希正工作严谨，对鉴定确认工作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常说，搞文物研究，知识不但要博，还要精，博和精要结合，这样才有利于鉴定，尤其在掌握国家规定允许出口文物的界限上，责任显得更加重大。

在担任天津市艺术博物馆馆长、主持全馆业务工作期间，他亲自策划、选定内容，先后出版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玉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瓷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紫砂》、《敦煌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七大本）等书，还与牟永抗合编《中国玉器全集·原始社会卷》，获第八届国家图书奖；与张永昌合编《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与杨伯达合编《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图例》；发表“爱国收藏家的贡献——天津博物馆珍品入藏记”、“文物鉴赏大家徐世昌”、“周叔弼和他收藏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研究文章多篇。1991 年 3 月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

毕生从事民俗研究的民国才女 郭立诚

郭立诚女士，祖籍天津市武清，1915 年生于北京市，有兄二、弟一、妹一。父郭琴石先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进士，清末民初时任官于工部、农工商部等机关。后见国事日非，乃弃官从教，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等大专院校。抗战时曾杜门不出，屡次坚拒日人及汉奸加入伪政府之诱惑，民国三十四年（1945）底卒，终能目睹抗战胜利。

郭立诚幼秉家学，性沉静，喜读书，而关心国事。就读北平市第一女中期间，适逢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学子四散流亡，她对同班东北流亡同学多所照顾，并曾参加九一八国耻之示威游行活动，虽遭当局消防水管冲淋，亦未尝退缩。民国二十二年（1933）高中毕业，进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历史系就读，师事陈垣先生。在学期间对民俗学产生兴趣，常于新年庙会时赴东岳庙等寺观从事民俗调查，奠定民俗学研究基础，并决定以此为毕生志向。

民国二十六年（1937）夏大学毕业，未及一月而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旋遭日军占领。郭立诚以敌军、汉奸横行，不愿进入职场，深居简出，陪伴老父，并搜集《红楼梦》等传统小说中之民俗史料，倏乎八年。

抗战胜利而父逝，丧葬即毕，郭立诚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之聘，赴台北授课，是为进入教育界之始。时台湾光复未久，师范学生多家贫不谙国语，她热心教导，不时资助贫生，极得学生爱戴。殆民国三十六年（1947）二二八事变起，台北动乱，“打阿山”之呼声此起彼落，郭立诚幸得学生掩护，于台北郊外乡间暂避而未遭其祸，诚所谓“助人者人恒助之”也。是年夏返北平，任《道报》记者。

未几，国共内战中国民政府战局逆转，北平局势渐危。郭立诚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初与世交叶嘉谷先生离平，连袂南行至南京结婚，婚后任职于教育部国立编译馆。未几一载，蒋介石引退，国立编译馆播迁，她奉命资潜，遂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在怀孕中再往台湾。

抵台之初，叶先生任职澎湖马公中学教务主任，郭立诚随往澎湖，备极辛苦，同年长子叶言都出生于马公。此后近十年间，夫妻任教于台南、花莲、台东各地师范学校与高中，期间长女叶言郁以民国四十年（1951）生于花莲。她虽处于台湾省偏远地区，然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经其主授国文之东部学生，后颇有以文章或国学著称者，如花莲出身之诗人杨牧、台东出身之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子良等皆是。

民国四十七年（1958）应师大附中应聘，举家迁台北。从此执教师大附中凡十五年，六次出任班级导师。郭立诚之为人师，以培养学生自尊自重为主，决不轻易记过处罚。师大附中校风自由，五育并重，她的教育理念得以充分发挥，作育英才无数，迄今仍为校友津津乐道，誉为校史中著名良师之一。

教学之余，致力毕生职志之民俗学研究，未敢或忘。郭立诚居台既久，常将台湾现存闽、客风俗习惯与大陆北方者比对，自此于中国民俗更加融会贯通，民俗学术著作遂持续问世。举其要者，如《行神研究》探究中国各行各业之守护神；《中国生育礼俗考》研讨中国古今怀孕、生产与育儿礼俗，并以台南之临水夫人信仰为证；《中国妇女生活史话》记述古代妇女日常生活状况；《中国艺文与民俗》撷取古典文学作品中之民俗资讯，对搜集民俗资料与民俗研究法皆有独到之见；《大拜拜的背后》则追溯台湾大拜拜之历史根源，论及古代庆典狂欢之放松社会紧张状态作用与日本统治台湾时代之背景等。

民国六十二年（1973）自师大附中退休，时已因故与叶先生离异，子女亦皆大学毕业，遂决定全心投入研究与保存中国民俗工作，转任汉声杂志顾问，并于师范大学国语文中心授课，教导外国留学生认识中国历史文化。汉声杂志以介绍与传承中华文化为旨趣，郭立诚常

为杂志提供报导主题，建议编辑采访方向，解答各种疑问，贡献良多。对新进同仁，尤不吝多方指导训练，故社内亲炙郭立诚门墙数年，得窥民俗学堂奥者亦复不少。

去乡既久，郭立诚故国之思愈殷。时两岸尚未通航，思乡之余，屡与同乡唐鲁孙、夏元瑜、白铁铮等诸先生将故都北京佚闻旧事发为文章，刊出于各大报副刊。郭立诚此类文稿累积既多，乃出版为《故都忆往》、《还魂纸》、《人花铜钱鬼花纸钱》等书，为研究北京旧日民俗之重要资料。当时每逢农历春节，报纸副刊制作新年特刊，电台、电视台录制新年特别节目，辄邀约郭立诚撰稿受访，畅谈旧日年俗掌故，大受欢迎，历多年不衰。

郭立诚晚年仍钻研民俗不辍，认为儿童教育亦为民俗之一部分，致力搜集各种旧日童子启蒙用课本，编订为《小四书》、《小儿语》等书，并编著儿童文学作品集《正月正》、《儿童诗选》等，甚有助于此方面之研究。文名既盛，各界来请撰文者甚众，郭立诚于有益世道人心与介绍风俗习惯之请求，皆努力为文。曾应国家文艺基金管理委员会之邀，撰写《得失之间》一书收入该会《人文思想丛书》系列；又应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会之邀，为其丛书《中国文明的精神》之第八单元《人民生活与习俗》主稿，撰写论中国饮食、岁时节庆及婚丧喜庆、传统娱乐活动等文章数篇。

两岸探亲开放后，郭立诚终能返乡探视，然故都不再，亲友星散，人事亦非，感慨良多。民国八十一年（1992），郭立诚罹患肾炎与帕金森氏症等疾，自此缠绵病榻数年，于民国八十五年（1996）十月十三日逝于台北，享年八十有二。病中犹将各种已整理完成之学术存稿校订，于逝世前半年出版为《郭立诚的学术著作》一书，书名朴实无华，而内容广及民俗与艺术、医学、人文之关系各方面，论证深刻，是为郭立诚毕生研究民俗之绝笔。

郭立诚一生不慕荣利，致力教育与民俗研究，桃李满天下而学术声誉自隆，文名益盛，以此曾获中山学术奖助金，获颁中国语文奖章。行年七十尝自谓“尚有余勇挤公交，闲时唯耽一杯茶”，可谓郭立诚人生观之写照。

杰出诗人和教育家 郭家声

郭家声，字琴石，号琴宝，室名忍冬书屋，祖籍天津武清，清同治八年正月廿五日（公元1869年3月7日）生于北京市，卒于民国34年（公元1945年）12月1日，享年76岁。

郭家声出身于读书世家，自幼聪颖好学，十二三岁时即在十七龄童子试中一举夺魁。又经过“十年寒窗”，他18岁中秀才，24岁（1893年）中举人，34岁（1903年）中进士（清光绪廿九年癸卯科第二甲），曾在晚清商部（后改农工商部）短暂任职（任商部章京），后兼任京师宗室觉罗八旗第八高等小学堂任首任堂长。辛亥革命以后，他又在北洋政府的农工商部任职。任职期间，曾向有关当局提出《拟设北京文化陈列馆理由建议书》，其中提到“精神建设关系整个民族之存亡，国家之幸运”，建议“于北京设立文化建设陈列馆”。

在教育方面，曾创办先志小学，专门招收和培养贫寒子弟，他还在国立蒙藏学校和北京三中等校任教；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他应英敛之先生之邀到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教授中国古典文学，辅仁大学成立后即转入辅大，教授《汉魏六朝文》等课程。著名学者启功在多篇回忆文章中提到郭家声先生是他的恩师。据《启功杂忆》（鲍文清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一书介绍：在辅仁大学读书、教学时，“启功还结识了像于省吾、容庚、唐兰、郭家声等一些老先生，他们用功之勤、学问之博、治学之严谨、人品之高尚，都是启功学习的榜样。他善于向长者求教问学，不断从他们的身上汲取和继承优良的学风和教风”。

郭家声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特别是古典诗词创作方面造诣很深，他的《忍冬书屋诗集》在清末民初诗坛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堪称诗史。陈垣校长还为他的两本诗集题签了封面。

郭家声先生十分热爱生活，同时又是一个为人谦和、严于律己的人。他是科举出身，却不热衷于官位；他是诗人，却不名士风流；他一生生活简朴，手不释卷，每天都要写日记，四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躬理家政，教育儿女。

郭家声先生有多方面的爱好，他喜好书法，酷爱京剧，喜欢逛庙会，串琉璃厂，更喜欢交友和收藏各种古玩、字画、碑帖等。他收集和保存的名人遗墨和碑帖拓片，直到今天仍存有百余张，其中有一部分是极具文史价值的珍品，这些珍品和他的诗作、日记，都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2007 年秋北京东方艺都拍卖公司拍出的黄山双松图立轴，2008 年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出的昭武侯图桑阿画像，卷中均有他的题跋。

2010 年 4 月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癸卯进士、诗人郭家声先生纪念专辑》一书。这本纪念专辑分三部分：“诗作篇”、“日记篇”、“拓藏篇”，每个部分都精选和摘编了诗人的部分作品，安排了简介文章和照片，以方便读者阅读了解诗人作品，学习他的可贵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郭家声的长子郭贻诚是著名的磁物理学家，曾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长女郭立诚是毕生从事民俗研究的民国才女。

民国时期的著名武术家 阎德华

阎德华，天津武清人，自幼“喜拳勇，爱武技，因投周师之门，练习八卦掌，乃得嫡系之真传”。阎德华先生的业师周玉祥，亦名周祥，武清瓦房村人，当地人称其绰号“周三黑”。周玉祥师承程廷华，他的弟子中以天津武清高义盛(1866-1951)先生为代表，后世声名最为显赫。

阎德华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武术家，著有《少林破壁》一书，《少林破壁》又名《实用散招三百六十手》，港台多以《八卦掌使用法》、《八卦掌图说》等名目再版。2000年，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有该书的影印本。

阎德华之所以撰写《少林破壁》一书，是因为“遵从前人苦心精诣，遗留之术，诚恐久而淹没，故且步后尘，以达后学者不失真传而已矣。”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为了把前人的武术遗产继承下来，不使其因时间的推移而失传。该书按照“不以门户派别而分，以公开鉴赏为本”的选材标准，以三十四种少林拳法的使用技巧为核心，配以双人对练技法图解加以说明，包括撞掌、掖掌、双换掌、搜肚掌、白猿搬枝、巧倒银瓶、左右坡腿、太公钓鱼等少林拳术。该书以其内容系统、说明清晰、树义精当、文字浅显、解释详明、图文并茂、简单实用之特点，博得了武术爱好者的喜爱，这在民国期间出版的武术专著中实为难能可贵。

作为一位武术家，阎德华不仅为我们保留了八卦掌的一些基本拳法，而且结合自己练功的体会，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武术思想。他认为武术作为“操练身体之道，技虽小而道理无穷”。因此，“凡习拳术者须当练精化气，以气化神，以运使内气为功，以川流不息为旨用，求后天补先天之法。”“诸般拳术皆以内气为主，以外劲为功，练功之要义在于日必操习，永无间断，而气质充盈。”“久练之，则得天地之灵机，自然之活泼，诚于中而形于外，伸缩敏捷，刚柔相济，进退合法，缓急得宜，术中奥妙则自然得之矣。”

“面壁十年图破壁”，想必是作者为该书命名的由来与良苦用心。做为早期出版的八卦掌著作，该书的出版可谓与众不同。这与当时乃至现代名家出书，开篇大谈门派源流、轶事掌故，东拼西凑玄学易理等诸多方面形成了鲜明对比，全书开篇一并简略带过。

《武魂》月刊数年前曾先后刊登有“八卦掌实用招法”、“八卦掌这三招好用吗？”等多篇论述，文章线索及内容均取材于该书。

民国著名画家 许心如

许心如（1906—2003年），号则知、知则、知希。江苏常州人，客籍天津武清，早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父亲许兴元是著名书法家，母亲是《四库全书》编纂人纪晓岚之后。自幼天资聪颖、记忆过人，少时熟读四书五经、爱好绘画，曾师侍武清项润田，北京丁济谦、姚华，是林琴南先生的及门弟子。民国十六年（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为北京大学教授。

许先生擅长诗书画印，尤精于中西绘画。初期，他以传统六法为基准。后来放弃了师门规律，一改唯形式而为重内容，要有所为而作画，要求作品有主题思想，寓美好、暗示、劝勉、警惕、讽刺、颂扬、类比、厌恶等种种意念于其中。同时神形兼备，光色真实，用自然界的现象比拟人生，唤起阅者同情，促发爱憎情感。先生自谦说：可惜心高手低，不够理想。其晚期作品大都是

有所为而为之的,即用绘画艺术形式表达出用文字表达不出的含蓄意境,先生认为绘画是没有国界、民族界限的通用语言,因此更应注重空间关系和光色和谐,力求使画面形象接近实质,而不再为师承、习尚所束缚。可以看出,先生的绘画作品笔墨简练、功力深厚、落笔成形,每件作品都有内涵意境,仔细揣摩能发人深思。

许心如先生的作品笔墨简练、功力深厚、落笔成形,既有传统又有创新,融中西绘画为一体,要求有光色,有质感,有蕴藏,有主题思想。早在北伐时期,即在北京琉璃厂清秘阁、荣宝斋、松古斋等处畅销书画,那时叫挂笔单,而且价格是最高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抗战胜利后又延续了4年。仅书法而论,那时与大书法家丁佛言(山东黄县人,曾任北洋总理府秘书长)比着卖钱,14个字就卖到25块现大洋,为什么呢?东西好。绘画作品也倍受推崇。许老先生认为:绘画是画给有文化的人看的,没有文化就无从谈起了。唐诗、宋词好不好呀?如果连字都不识,怎么能欣赏到它的美,又怎么能从中受益呢?许老先生说“一切事物都在变,不变不能前进”因此,一张宣纸全部着色,熔油画与中国画为一炉,并极重光照,许多超前意识和思想隐含其中。同时认为,绘画应该具有改良社会、改良人生;告诫社会,告诫人生;爱重社会,爱重人生的功能。

在清末民初北京的历史上,有一位风云人物叫丁济谦,时任华比银行行长,兼延清堂经理。延清堂,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古玩店,并享有特权专门经营官窑瓷器,买卖做得非常大。丁济谦与许家是世交,心如的父亲去世的早,因此在青少年时得到了丁济谦的大力资助,比如拜意大利雕塑大师冯子楠学艺,就是以一对乾隆五彩瓷瓶(时价3000现大洋)作为见面礼。在北大读书期间,许心如一直住在西交民巷华比银行,而且一住就是五年。许老先生直到晚年,还经常提到前辈丁济谦,并于2000年到西交民巷故地重游。1949以后,许心如先生因身体不适退隐林下。他一生克己重礼、刚直不阿、勤奋耕耘,创作了大量书法、绘画等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心如先生是先学雕塑后学绘画的。他涉猎多学科领域,知识渊博,对植物、动物、矿物、文学及美术等皆有研究和造诣,是享誉京华的著名学者和艺术家。每次举办画展,皆盛况空前,作品常常被抢购一空。当时,蒋介石亦钟爱许先生的画作,曾索求过多幅作品。1949年,平津战役打响,北京被围,蒋介石派员动员许先生南迁台湾,直到最后“紧急关头”还到许先生家中,要求他携夫人赶快离开。但此时许先生已决意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初期,先生在一份文件中留下了一行这样的字迹:“愿献身研究艺术的专门院、校、系,对中国绘画风格加以改革,以破除旧日封建艺术及传统见解。”先生的心愿可见一斑。不幸的是由于身体多病,不得已退隐林下。许老先生是一位勤于思考的人。他常说自己是受苦人,不会享受清闲与安逸,做学问时是个学者,不做学问时就是个匠人。他使用的家具、画案、油画架等都是自己设计和制作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秘书长谢德萍先生曾有幸拜见过许先生,亲眼目睹了许先生精湛的书法、高超的绘画、无与伦比的雕塑……非常吃惊,他说:“许老一看就知道是大学者,他比我们一般人聪明好几倍,下的工夫也是我们一般人的好几倍……”

当代琢玉艺术家 夏长馨

夏长馨（1912~1989），别名：兰奇，天津武清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市特级工艺美术大师。继承父业，擅长工艺美术。1919年开始自学玉器器皿造型艺术，13岁在北京前门“玉成祥”玉器店学徒，喜绘画，并师从惠崔、荣甫、李耀学艺，20岁左右技艺大有提高。1937年，行业萧条，他因生活所迫拉过人力车，卖过切糕和青菜，拴过笼屉。行业复苏后又给“玉成祥”做加工，直到解放初期。1953年参加玉器生产合作社，负责生产治理和产品设计。1956年被评为“玉器老艺人”、1957年被聘为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1958年出席北京市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1979年被轻工部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家”的称号，1988年改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86年被北京市命名为“特级工艺美术大师”。

夏长馨一生创作出不少精品杰作，他设计的器皿图案，无论深雕浅刻，或是平面花纹，都喜用龙的形象。他的作品造型雄伟，气魄宏大，变化多样。他设计的螭虎，草龙，怪兽，纹样锦地等特点鲜明，常令人耳目一新。他常临摹各种器皿，专攻器皿装饰图案设计。经过长期的钻研，磨练，他成为玉器花纹装饰方面的高手。自北京市第三届人大代表会议起，历次当选市人大代表。他还被聘为中国美协会员。

夏长馨擅长平素产品的花纹设计，尤长于龙、凤、草、花卉图案，开光画面，怪兽造型和人物景致等作品有《东方巨龙白玉花熏》、《白玉花篮》、《碧玉灯》等。有作品为国家收藏。对各种玉器图案，兽头，深浅浮雕设计得当，为玉器平素产品的水平提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艺人喜选定龙的题材，无论器皿的顶盖，周身，两耳，底座，平面花，深浅浮雕，常常以龙为题材。造型宏伟，气魄大，变化多。他的螭虎、夔龙、草龙、怪兽、兽头、花头，纹样各有特点：他的螭虎身短，四肢有力，飞翅火焰，云头作饰，突出了螭虎的劲头、动态。夔凤有腿有身，丰富了造型。他的景物、人物、怪兽开光，非常注意情节和布局，使作品赋予各种寓意。

他认为：作品求丰满，求变化，求传神，应当简繁适宜，纹样在产品的位置决定了它的简繁。繁简要从效果出发，不能从自己兴趣出发，因为平面活有它的局限性，不了解它的变化规律，很难设计出好产品。

主要作品有：“白玉东方巨龙熏”、“碧玉垒”、“碧玉灯”、“金银错玉酒具”、“嵌宝石白玉盘”、“青玉麻地瓶”、“白玉四管炉”、“翡翠方炉”、“白玉人物薄胎瓶”、“白玉提梁卣”、“翡翠方炉”、“青玉番作高腿熏”、“碧玉地球熏”、“白玉观音瓶”、“青金背壶瓶”、“孔雀石花熏”、“青金蟾纹壶”、“青金壶式瓶”、“松石圆肚瓶”、“青金鲤鱼瓶”、“白玉仿旧鸡樽”等。

值得一提的是，由夏长馨制作的现代作品白玉东方巨龙花薰成为国家级珍宝，它共分为两个部分，盖钮为一条昂首盘龙；花薰盖部镂雕百花纹样，四个开光内分别雕有祖冲之、张衡、僧一行、李时珍之像。用料讲究大气、富丽典雅，为现代玉雕作品中的精品。该器物曾长期陈设在人民大会堂的毛主席休息厅内，后被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收藏。

机械工程专家 杨文元

杨文元，1943年4月出生于天津市武清上马台乡杨家河村。1967年7月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辽宁省机械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先后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沈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多次获得辽宁省机械厅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北省新产品奖、河北省冶金科技进步一等奖等。1997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1995年~2003年任辽宁省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2001年1月~2009年10月任沈阳市人民政府参事。

1991年4月~2004年7月任九三学社皇姑基层委员会主任委员；皇姑区政协第十届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常委，第十三届、第十四届顾问。沈阳市九三学社成立六十周年参政议政十佳人物。

大学毕业后，杨文元来到了辽宁。当过兵，经受了部队的洗礼。当过工人，经受了工业生产第一线的磨练。门类齐全，基础雄厚的东北工业培育了他。装备制造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它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安全，又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后，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对装备制造工业提出紧迫的要求。杨文元背负时代的使命投身到装备制造事业中。长期工作在科研设计生产第一线，参加和主持多项机床和工艺装备的设计和制造，满足机械工厂需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企业联合研制成功低温干燥全自动挂面生产线和方便面生产线，把我国的挂面生产质量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1980年，我国金属带材生产处于十分落后的状况，针对有色金属加工、钢铁等产业迫切需求，杨文元带领科研人员，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再创新和集成创新，进行带材精整机组的研制。经过7年的艰苦努力，用于铜、铝、钢等不同材料的精整机组陆续研制成功，并形成系列产品，满足企业的不同需要。这些设备有的居国内领先、属国内首创，一些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价格仅为引进设备的五分之一。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满足对金属带材、箔材的旺盛需求，对投资建厂或进行技术改造的国内金属带材生产和加工企业，采用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备创造了条件。有些设备还出口到亚洲一些国家，欧美在中国的合资或独资企业也采用了这些设备。这些设备的研制成功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社会效益，也为装备制造技术创新积累了经验。

他还与一些大专院校合作，参与了国家863工程。进行金属复合材料、工程陶瓷等新材料、新工艺的研究，结合科研实际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根据市场需求，完成的科学研究和设备研制为发展生产型服务业进行了较成功的探索。

在任区政协常委期间，每年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提案，如：“关于面向国内外招商引资，加速长江街改造的建议”、“大力整顿马路市场，加速退路进厅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发展教育工作的几点建议”、“采取有效措施，让市民吃上‘放心肉’的建议”、“关于加强市场建设与管理的建议”、“推进社区建设，进一步完善社区运行机制的建议”、“改善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建议”、“关于注重投资效果，优化项目结构的建议”、“关于建立健全‘扶贫超市’体系，健全经常性的扶贫捐赠网络的建议”、“关于加强健康教育的建议”等。

在市政府参事工作中，围绕国家发展的战略部署，根据市长关注的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积极开展社会调查，结合多年工作经验和体会进行理论研究，完成了一些论文和报告，主要有：“提高沈阳市 IT 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深化沈阳市市场经济程度的研究”、“增强沈阳市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思考”、“建立健全行业协会组织，促进沈阳市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必须把装备制造业作为沈阳市第一大支柱产业”等。这些建议和意见都得到市长和市政府的重视，为解决沈阳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的问题，制定沈阳市发展规划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在任九三学社皇姑基层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组织社员认真学习贯彻党和九三学社的文件精神，积极参加省市区的各种参政议政活动，组织专题考察调研，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形式多样活动，成果突出。基层组织连续多年获得九三省委、市委“两优一先”先进集体。九三市委参政议政先进单位、区政协提案先进单位和九三省委“四个一”活动先进集体称号。

第一个私人出资开办的烈士纪念馆

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个牺牲 51 年才得到烈士名誉的武清籍文艺战士，他的战友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

重庆市话剧团退休干部陶鹏，在自己的茶园里建起了一个烈士纪念馆。每天，到这里来喝茶聊天的市民都会在烈士遗像前驻足凭吊，都会饶有兴味地浏览烈士的生平事迹和英雄壮举。

这是全国第一个私人出资开办的烈士纪念馆。陶鹏为此拿出了自己 5 万元的积蓄。他和这位烈士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私人出资做这件事？

为不见经传的烈士在自家建纪念馆

2004 年 10 月 5 日，重庆市话剧团退休干部陶鹏向重庆市文化局递交了一份特殊的报告。他申请个人出资，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烈士——吴玉振开办纪念馆。

吴玉振是天津武清人，1949 年毕业于华北大学音乐科，分配到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1952 年，调中央民族歌舞团任长笛演员。1953 年 11 月，吴玉振同志响应国家民委号召，随文工团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协助当地民主建政，并收集少数民族音乐歌舞素材。在途经四川省（原为西康省）理塘县时，吴玉振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在明知土匪群集，情势万分危险的情况下，主动提出和另一个解放军战士打前站，深入虎穴，摸清情况，不幸被土匪抓获。土匪对吴玉振进行了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解放军是来破坏民族团结的。吴玉振宁死不屈，严正阐明共产党的立场，奉劝他们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争取人民政府的宽

大处理。最后，吴玉振惨遭刖刑，牺牲时年仅 24 岁。

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吴玉振同志牺牲后，案件迟迟没有侦破，跟随吴玉振一起下西康的同志又被打成右派，直到 2001 年，民政部才追认吴玉振为革命烈士。他的英雄事迹也因此并不为人所知晓，甚至他家乡的人民也不记得有这样一位英雄儿子，他唯一的亲人——他那含辛茹苦的母亲在得知儿子失踪的消息后，悲痛得哭瞎了眼睛，不久便离开人世。

市文化局收到陶鹏申请个人出资办烈士纪念室的报告后颇感意外，凡烈士纪念馆都是由政府出资修建，民间个人出资开办烈士纪念室还闻所未闻！陶鹏的行为深深打动了文化局的领导。市文化局副局长厉华同志在他的报告上动情地批示：“陶鹏同志的义举，正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动人乐章！同意个人出资金、出场地开办烈士纪念室”。

陶鹏跟家人商量，决定将自己用作茶园的三间门面房辟为纪念室。请人做好纪念室的名匾后，陶鹏马不停蹄，以 76 岁高龄上北京、下云南、渡赤水、过巴塘，沿着吴玉振烈士当年的足迹，广泛收集他的生平事迹材料和照片，精心整理、装裱，制作成展出用的各类镜框和塑胶展品。

2004 年 11 月 24 日，在吴玉振烈士牺牲 51 周年的日子里，纪念室正式开门迎展。陶鹏站在门口，亲自向市民宣讲烈士的英雄事迹。

每天到纪念室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陶鹏自费开办烈士纪念室的义举受到市民们的交口称赞。但很多人仍然疑惑不解：陶鹏为什么要为吴玉振建一个纪念室？他和吴玉振烈士到底是什么关系？

50 年为战友讨一个公平待遇

在“吴玉振烈士纪念室”第一室墙壁正中，陶鹏用大红字贴了两行醒目的标语：“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这句话对陶鹏而言有着特殊的含义，他毫不避讳地对每一个参观纪念室的人说：“吴玉振是代替我牺牲的，没有吴玉振烈士，就没有我陶鹏今天的幸福生活！我要让我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吴玉振烈士的名字。”原来，陶鹏跟吴玉振是战友，当年跟吴玉振一起下西康的正是他。

1953 年 9 月，陶鹏和吴玉振一起从中央民族歌舞团抽调到西南工作队，负责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宣传民族政策、协助当地民主建政、收集少数民族音乐歌舞素材。11 月，工作队经长途跋涉到达昆明。在昆明稍事休息后，上级指示要组建一支西康小分队，深入到西康省（现划归四川省）的巴塘、理塘地区进行宣传。陶鹏任西康队行军组组长、吴玉振任副组长。考虑到巴塘、理塘地区形势复杂，土匪较多，丽江军分区专门派出一个解放军班护送小分队。

小分队到达巴塘后，突然接到中央命令，要小分队迅速结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慰问、采风工作，务必于 4 月 15 日前赶回北京参加赴朝慰问演出。

陶鹏和吴玉振商量：为了节省路途时间，小分队到达理塘后，不再骑笨重的牦牛行军，直接骑马赶到成都，再从成都返回来北京。可是马匹非常稀少，必须先派一个人到理塘县打前站，通知县委准备好马匹，以便小分队赶到后迅速赶往成都。

稍懂藏语、又是行军组组长的陶鹏，自然是打前站的最佳人选。他决定带一个解放军战士，选两匹快马立即飞驰理塘。

正当陶鹏收拾行装准备启程时，吴玉振同志郑重提出，由他带着解放军战士去打前站，因为陶鹏是行军组组长，有丰富的指挥经验，小分队离不开他。吴玉振知道，从巴塘到理塘要经过许多土匪窝点，尤其是毛丫坝地区尚在藏族反动土匪的控制中，此去凶多吉少。经再三争执，从大局考虑，陶鹏同意了吴玉振的意见。临别时，陶鹏握住战友的手，殷殷叮嘱，洒泪而别。

10天后，陶鹏带着小分队赶到了理塘县委。却没有见到吴玉振和解放军战士的身影。理塘县委的李书记说，他们根本没有见到打前站的同志！

陶鹏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知道吴玉振同志已经凶多吉少了。李书记急忙通知公安局组成侦察组，陶鹏随侦察组一起到沿途仔细搜查。终于在毛丫坝温水塘发现了一堆浸着血渍的沙土和解放军战士的一件雨衣。

陶鹏放声大哭，他知道吴玉振和解放军战士已经遇害了。为了不耽误赴朝演出，陶鹏含泪离开了理塘县，他叮嘱公安局一定要尽快破案。

可是此案一直没有得到侦破。1957年，陶鹏被打成右派，离开北京，下放到重庆劳动。每日每夜，陶鹏都在思念着他的生死战友，都希望得到吴玉振牺牲的确切消息。可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他自身难保，又怎么打听吴玉振的消息呢？

1979年，陶鹏摘掉右派帽子，获得自由，他立即赴京打听吴玉振的消息，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领导早换了几茬儿，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吴玉振这个人。再加上共和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事只好搁了下来。

1997年，陶鹏到北京出差。见到了原西南工作队的老队长杨光同志，问起吴玉振的事，杨光回忆说，这个案子到1958年才得以侦破，据抓获的土匪交代，他们截获吴玉振和解放军战士后，把他们吊在土匪头子贡布当珍的地下室里毒打，逼他承认解放军是来破坏民族团结的。吴玉振同志宁死不屈，被土匪一刀刀活活剐死，然后又送到寺庙焚烧，手段极其残忍。

陶鹏问：“吴玉振为什么没有被评为烈士？”杨光说：“1957年后，跟随吴玉振的同志大多被打成右派，根本没有人出来说话。我现在已离开中央民族歌舞团，也无能为力了。”

吴玉振同志牺牲得太惨烈了，却连烈士的称号也没有！陶鹏怎么也无法平静。回到重庆后，他立即整理吴玉振的有关资料，写成了洋洋3000字的报告。之后，他三次上北京，联合当年曾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副团长的费孝通副委员长、中央民族歌舞团著名歌唱家胡松华、张苛等20多位老同志，联名上书国家民委和民政部，要求尽快追认吴玉振同志为革命烈士。

1999年秋，民政部派出工作人员，会同陶鹏和有关人士到四川理塘县调查取证。2000年底，民政部追认吴玉振同志为革命烈士，2001年3月，中央民族歌舞团召开吴玉振烈士追悼大会，号召全院干部职工向吴玉振同志学习。

一个被湮没了近50年的烈士英魂，又重新走进人们的心里。

英烈的精神不死

参加完追悼大会后，陶鹏去了一趟吴玉振的家乡——武清县。令他惊异的是，吴玉振的家里再没了其他亲人，他的老母亲在得知儿子失踪两年后便去世了。

陶鹏又和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领导赶到四川省理塘县，在那里隆重举行了吴玉振烈士追悼大会及衣冠安放仪式。仪式后，陶鹏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必须为烈士做点什么。他提出，由他个人出资，在理塘县开办一所吴玉振艺术小学。这一想法立即遭到歌舞团老同志的反对，说理塘海拔 3000 多米，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根本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条件，更不用说管理一所学校了。

陶鹏怏怏地回到家里。他捧着费孝通副委员长的题词、天宝副省长的题词和胡松华等歌唱家的题词，内心的情感像潮水般翻滚：“吴玉振如果不代替自己去打前站，那遭受剜刑的将是自己；如果自己牺牲了，又何来今天儿孙满堂的幸福晚年？”

想到这里，陶鹏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把儿女叫到跟前，郑重提出要在自己家里建一个烈士纪念馆，让儿女们像记住自己的亲人一样，永远记住吴玉振叔叔的名字。他当着儿女的面，挥毫写下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十八个大字，用以时时自警。

儿女们完全同意父亲的做法，二女儿主动将自己位于重庆渝北区龙溪镇的三间门面房拿出来开办纪念馆，那里常有老同志喝茶聊天，便于宣传烈士的事迹。

每到烈士牺牲的这一天，陶鹏都要携全家到纪念馆瞻仰、祭拜。

从 2005 年 1 月起，陶鹏主动联系附近的中小学校，不收一分钱，免费让他们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他亲自讲解。重庆渝北区龙溪镇老年协会决定，每半年定期在这里举行一次讨论会，缅怀为共和国牺牲的革命先烈，畅谈今天的幸福生活。

目前，不少学校、工厂和企业主动与陶鹏联系，要求把纪念馆当作他们对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地。陶鹏同志自费开办烈士纪念馆的事件已成为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独特风景。

民营企业家 鲁晓松

鲁晓松，天津鼎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位不惑之年的民营企业家，他在城市发展得挺好，如今突然跑到内蒙古大草原养起肉牛来，而且搞得规模还很大，仅在锡林郭勒盟，到今年他的内蒙古大元牛业有限公司就要包下全盟 100 万头著名的西门塔尔牛。现在人们投资的目光

无不盯在都市房地产、餐饮等几大热门产业上,这鲁晓松怎会跑到遥远的草原,把自己身家性命一股脑儿投在草原上?他在草原、在牛身上看到了什么?当我电话采访他的时候,听他讲人生的梦想,讲对草原和牛业的抱负……

鲁晓松自小长在武清陈嘴,父亲是警察,母亲任武清当地小学校长,中专毕业后他工作在天津机车车辆厂保卫科。

那是 1991 年,正是“倒爷”活跃的年代。21 岁的鲁晓松不满足国企按部就班的工作节奏和低微的薪水,下海倒腾服装,他成了有名的“倒爷”。后来,承包了某太空棉服装厂,由于质量不合格,装箱程序也不对,人家拒收,一分钱不给,还要索赔布料钱和违约的费用。再后来,他在黑河搞过边贸,天天和中俄的“倒爷”们斗智斗勇。结果,他平了债务,还起死回生地赚上一大把。

“下海”后鲁晓松干过许多种生意,1996 年,鲁晓松改行当包工头,带一支队伍,承包起高速公路的工程,鲁晓松一下子赔得倾家荡产,他把自家的住房都卖了,还是还不清欠下的债。

鲁晓松抖擞精神,平生第三次重新干起白手起家的营生。有过前面的教训,他变得非常谨慎,不再像以前那样蛮打蛮干。他拼命三郎似的玩命干,干出了好名声,也干出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后来,鲁晓松重新杀回筑建高速公路的行业,而且走出了天津,长沙至益阳的高速公路,娄底的高速公路,都有他承包的工程,鲁晓松再次赚得盆盈钵满。

鲁晓松经济大翻身。翻身之后,衣食不愁了,他对赚钱的认识突然有了质的转变。

“下海”近 10 年,鲁晓松过去赚钱的目的是为过上好日子。如今,他突然发现,这样做没错,但却没意思,人的一生,没钱活不好,但活着难道就是为了钱?他开始为自己的人生提出一个大问题。他反复思考一段时间,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赚到的是钱,浪费的却是生命。他认识到,人生最重要的,应是赚钱的同时,还得成就一番立得住功名的大事业。于是,他突然就不干工程、不当包工头了,开始拿他积累起来的财富干投资商,干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产业。

到底以何为业?鲁晓松不清楚。他后来投资过水处理、房地产等好多项目,钱倒是赚了,但他还是觉得没劲,那些项目干的人太多,除了赚钱,没什么创造性。他想找一个非常富有创意的、别人从未搞过的、而且是于国于民都很有益的大项目,然后铆足劲头干下去,把它做大做强。为此,他跑到大学里去找项目,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还有其他城市的一些名牌大学,教研室、科研室他推门就进,问人家有何新型科研成果?是否需要投资的合作者?可惜,他找不到。

2004 年,在一个招商会上,鲁晓松偶然认识了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委书记斯琴必力格,俩人谈得非常投机。之后不久,鲁晓松拨通了斯琴必力格的电话,他说:“你不能全国各地到处招商了,你这样招来的都是二流企业,而且,除了农牧业和资源外,你招工业的项目,肯定干不过沿海城市,从政策、交通上,你根本不是沿海城市的对手。作为朋友,我替你想怎么发展:牛羊肉是你锡盟的拳头产品,不光中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但你锡盟却没有一个像样的牛羊肉品牌,只有伊利、蒙牛……”对方一听非常兴奋,立刻说:“说得对,你有什么好主意?明天咱就面谈。”

第二天,俩人在北京保利大厦碰头,4 个小时,就听鲁晓松谈对肉牛产业化的设想。鲁晓松

说他愿意投资牛业,从繁育和育肥开始,一直到市场,做牛业的产业链,气魄很大。斯琴书记说太好了,那饲养肉牛的牧民们就能富裕起来了。斯琴书记回到内蒙古后,很快决定拿出 56 万亩的毛登牧场与鲁晓松合办牛业。蒙语“毛登”是有森林、草地和河流的意思,那是一片很好的牧场,但它是国有土地,进不了私企,此事搁浅。

2007 年 4 月的一天,天津农大郭宏教授去内蒙古多伦考察一个项目,邀鲁晓松同行。到了多伦,鲁晓松一看那里环境那么优美,草场那么肥沃,那是滦河的源头地区,长草数百种,那儿的牛都是喝着滦河的“纯净水”,吃着天然的百草长大的,没污染,远比内地那些食用秸秆、麦草的牛营养丰富。而且那牛还多是引种于瑞士的西门塔尔牛,是世界著名的肉牛。他当即决定:就把多伦辟为他创办牛业的起点。半月之内,鲁晓松三访多伦,和当地政府签订了合同——建一座存栏 3000 头、年出栏率高达万头的育肥牛基地和一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屠宰场。

从此,鲁晓松一门心思扑在他的牛业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投资创办了一系列的企业,如以经销牛肉为主的天津鼎恒大元食品有限公司、以养牛为主的内蒙古大元牛业多伦育肥牛基地、建立成加工企业内蒙古大元牛业有限公司、兼并了同样也是 3000 头存栏量的科尔沁宝龙山育肥牛基地、收购了内蒙古通辽地区两家屠宰加工企业,最后成立了以牛业为龙头的天津鼎恒集团有限公司,他当董事长。

鲁晓松再次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系在了一件事上,他是否考虑过失败?他说他已度过了那种易于冲动的历史阶段,失败的事情他每次投资时都会考虑,但他并不害怕失败。投资牛业,干好干坏?他认为都将对社会有利,他把钱投在草原上,至少先让牧民们获取到巨大的利润。再说,他坚信产自锡盟草原的西门塔尔牛,会以它细嫩鲜美、营养丰富而且毫无污染的肉质,征服天津、北京、全国乃至东南亚甚至全球市场。这回他坚信他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所以他说这回他的投资不再是投机,而是一次极其认真的投资,他要永远地干下去。不是总没找到一个理想的项目吗?他说这回他找到了。

鲁晓松口气好大,他的牛业瞄准的竟是全国乃至世界的市场。“你养得起那么多的牛吗?”有人问。

鲁晓松说:“没问题,到时候,锡盟郭勒大草原上,会有一百万头西门塔尔牛等着我。再算上哲里木盟科尔沁大草原上的牛群,那就更多啦!”

至于市场,鲁晓松介绍说,他们竟然能把一头牛精细地分割出近百种产品,而且真空包装,远非牛肉市场上半扇牛肉铁钩一挂随切随拉的样子。鲁晓松所说的市场,除了大众化的超市外,显然还有高端的西餐厅、宾馆和酒店。

问题是,风头正劲的鲁晓松,突然“上山下乡”跑到草原上当起统领百万肉牛的“牛司令”,人们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据说有人不理解,说这鲁晓松怎么越干越出溜儿,混到牛棚里去了?对此鲁晓松解释说:这个事业没人干过,至少是没给干好、干大。我来,我就喜欢干这种别人没干过、或是没干好、极具挑战意义的活儿。再说这牛肉非同小可,据说西方有人研究过,中国人的体质为什么比不过西方发达国家人的体质?从饮食结构看,其中两大原因,一是从小牛奶喝得少;二是牛肉吃得太少。为此我争取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把中国的牛业搞得像奶业那样发达,不仅要把大量优质的肉牛推向餐桌,还要把肉价通过规模化生产给降下来,以此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

多伦县县干部说,草原上的牧民们非常欢迎鲁晓松。草原与城市、肉牛与餐桌,历来缺乏一道通畅的“桥梁”。特别是这些年,为保护滦河水的发源地,锡盟政策性大幅削减羊群放牧的规模,因为羊群啃食草根,破坏草原,而大力提倡和鼓励饲养食用草叶的牛群,但牛多了,销路更成问题。如今,这“桥梁”有了,而且还是一条“快速路”,架桥铺路的人就是天津武清的这位鲁晓松。

博士生导师、文史专家 乔治忠

乔治忠,1949年7月出生天津市武清柴官村。1981年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4年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在职攻读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199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年任南开大学教授,曾在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1996年为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学术带头人。1993至1994年度与2004至2005年度,两次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交换研究员。1999至2000年度在日本立教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交换研究员。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教育部社科研究基地:北师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先后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清史》编纂项目等。

乔治忠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教学工作,有《众家编年体晋史》(校注,1989年)、《清朝官方史学研究》(1994年)、《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1996年)、《清文前编》(2000年)、《清史纪事本末》第四卷(2006年)、《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2008年)等著述,撰写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近年重要论文有《〈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清太宗朝汉文档案文献考析》、《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论中日两国传统史学之“正统论”观念的异同》、《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古代中国官方修史视角下的中外史学比较》等等,均具备学术创新与开拓性。曾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首届古典文献学奖、天津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近年主持国家《清史·布政使表》的编纂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等。讲授博士研究生课程“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与专题研究”、“历史考据学通论”及硕士研究生课程、本科生课程若干门。

当代著名中国穆斯林画家 阿里·雷公

阿里·雷公，原名雷孝书，回族，字恭天，号雍阳渔者，1954年10月生于北京，原籍天津武清。民进中央十一届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对外友协）中国伊朗友好协会理事，中国国际艺术家学会和中华书画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电视台书画中心艺委会委员、马来西亚中央艺术研究院顾问、青海河湟穆斯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中国回族学会、北京民进书画院，北京工笔重彩画会、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

阿里·雷公1972年到北京画院业余学画，得吴休、马泉，王文芳和彭培泉等共和国第一代功底坚实的艺术家的启蒙，1978年后又得任率英、潘絮兹、黄均、俞致贞和刘力上等老一辈的深厚传统艺术的熏陶，而最终成为工笔重彩画泰斗潘絮兹先生的入室弟子，并在艺术理论和修养上颇多得益潘老，在潘先生重思想、重方向、重方法论而刻意发现和培养其自身发展优势的教导方式下，终使阿里·雷公在走出北京，走出国门，在伊朗、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的出访展览游历之后，定位于中国传统，吸取中东艺术精华，开中国伊斯兰细密画之先河。其代表作《铜匠》、《波斯织女》和《乐园》等，以真善美的构思立意，严谨的构图，流畅有力的线条，华丽的装饰图案，生动的人物造型，富丽典雅的设色，以致精雕细刻数月描绘中，对云母等矿物材料的成功运用，更使画面熠熠生辉。这种对艺术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态度，是当今艺术界值得提倡和彰显的。

知晓阿里·雷公的艰苦成长过程，才能理解他所获得的艺术成就之不易。雷公出生在新中国初期，做铁路工人的父亲对他寄予希望，试图改变那世代清贫而没文化的历史，然“十年浩劫”，使这个家风雨飘零，流离失所，但雷公不坠青云之志，数年辍学后，仍以优异成绩读完中学，终因贫困而高中肄业。1972年始，当自行车修理工、电工、珐琅美工、工会干事、橱窗美工，直至成长为一名有中级职称的创刊《中国初中生报》的中国少年报美术编辑，十余年工作历程中，他干一行精一行，同时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四处求学，转易多师，为日后迈向艺术高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雷公的人物、山水、花鸟皆精，尤善画龙，工写兼能，通诗文书法。他多才多艺，能歌善舞，还创作多部连环画发表，更有大量插图题花在上个世纪末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中国电影报》、《中国环境报》和《中国少年报》等多家报刊杂志上。自1995年在德黑兰成功举办中伊文化史上第一个中国穆斯林画家的书画展后，受到伊朗观众的喜爱和中国大使馆的重视。

近年，除在北京等国内城市举办个人画展外，雷公还应邀在美国芝加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办展访问。他探索创作的《波斯织女》《铜匠》（第四届当代工笔画大展中国大奖，第八届中国艺博会《铜匠》再获奖），《张骞出使西域》和《和旋》等一批既有中国民族传统，又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中国细密画，被伊斯兰世界和国内外艺术权威与广大穆斯林公认为中国伊斯兰细密画派的创始人。

2004年应马来西亚之约，历时三个月成功创作丈余巨型《和平使者——郑和》细密画，在吉隆坡参加“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600年的国际展”中引起轰动，大获成功。阿里·雷公还是位学者型的艺术家，每每触景生情，常有诗歌美文信手拈来。他文风淳美，

抒情流畅，感情真挚，文笔细腻。近年来在海内外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诗作上百篇，1992年和中国青年报记者孙亚明的20万字合著《艺苑驰骋》出版发行。2004年和2008年《阿里雷公书画选集》和《阿里雷公书画邮册》先后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和中国集邮总公司出版。

2010年4月23日阿里·雷公首次登上河北大学新闻传媒和工商管理学院的讲坛，开始了他的绘画艺术学说的讲授。

雷公的许多作品被国内外纪念馆、博物馆、驻华使馆、商务机构、沙特和西班牙王室及文莱王室所收藏。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伊朗电视台、德黑兰电视台、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国际网络电视台、甘肃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机构，都录制和播放过阿里·雷公的专题片。简介和作品分别载在国学、雅昌、嘉德在线和中国画研究院等许多网上。其名录被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家人名大词典》、《中国当代美术家人名录》、《中国艺术家传集》、《中国回族名人词典》、《世界名人录》、《中国书画信息大全》等多部典籍。

在2001年元月13日举办的“雷公画龙展”上，著名画家潘絮兹赞叹说：“愿阿里·雷公永远走在中国伊斯兰画派的前列，再造殊荣、再创新功。不要老盯过去，只要不骛浮华，更下十倍苦功，才有望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的希望……”。

已故著名书法家刘炳森评价说：在当今画坛尊崇传统，身体力行为发扬中华民族新古典艺术形式的践行者中，著名回族画家阿里·雷公便是一历经磨砺靠自学成功的典型……

我们衷心祝愿阿里·雷公艺术之树长青，定能在艺术上恒志精勤，道宽业广。

与单田芳、袁阔成齐名的评书名家 刘阔漳

刘阔漳，1916年5月21日生人，评书演员。祖籍天津市武清大孟庄镇寺各庄。原名刘春贵。

刘阔漳早年拜金杰丽为师，金先生收徒虽排“阔”字辈，但又取“金生丽水”之意，所收之徒皆加以水，故刘先生艺名为刘阔漳在“七阔”弟子中行六。从艺于辽西，定居在锦州，曾开设茶馆并说书（锦州解放初在市内开私人茶馆）。后合营改制为锦州曲艺社一社。先后任锦州和平曲艺社、锦州曲艺社经理，并参与评书队演出。擅说《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后小五义》及《三侠剑》等短打篇目，尤以《五义》系列，颇得乃师真传。他平素敏而好学，融会百家，有“无书不晓”之美称。他还为他人写过不少“书梁子”，自己还编演过一部长书《风尘三侠》。后因年高病重，不幸于1987年逝世，仅留下《棍扫萧金台》、《杨香武三盗九龙杯》、《升仙传》等录音资料及一些“书梁子”手稿。出版评书作品：《三侠剑·棍扫萧金台》

刘阔漳不仅是位著名评书艺术家，还对许多历史知识颇有研究，比如对《封神榜》这部历史小说，他认为，《封神榜》其实是一部隐含的医学著作，其中“冰冻岐山”一节其实是用隐语来教授人保健知识，故有一部《封神榜》皆是病之说。

按照刘阔漳的总结，传统评书书目那可多了。但真正够得上分量的，据说只有 20 多部，其中公案短打要占去一多半，那么袍带书剩下多少呢？剩下 13 部：封神榜、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列国演义、隋唐传、薛家将、五代残唐、杨家将、十粒金丹、精忠说岳、明英烈、明清演义。这几部书封神榜、西汉演义、三国演义、列国演义全是墨刻书，墨刻书不是不可以说好，但是需要功力，是人保书的活。不管你是多大的演员，谁都不敢说我说这几套书保准火。姜存瑞研究了一辈子三国，80 年代录音还是没能火，当然跟年纪也有关系。这样，剩下的几部有价值的也就东汉演义、隋唐传、薛家将、杨家将、精忠说岳、明英烈六部。

裴福存将已故评书名家刘阔漳口述长篇传统评书整理成书目，该书目中一些资料性文字，涉及很多失传评书，极具史料价值。1987 年 3 月 18 日，农历丁卯年二月十九日刘阔漳逝世。

水彩画家 杜晓光

2008 年在韩国首尔举办的《水·彩·墨·韵》中韩画家八人作品展上，来自天津的水彩画家杜晓光的《晨曲》、《雪霁》、《初春》、《月光》、《雪后》等画作极具魅力，读来舌尖留香，令人陶醉，受到中日韩艺术家的一致好评。

杜晓光，1980 年毕业于天津美院，天津武清高村人。他自幼学画，后又考入天津美术学院深造，接受了系统的艺术教育。主学的是西画速写素描和色彩学院派，在中西文化的长河中浸淫日久，浓缩了他的人生精华。

水彩画形成于英国，传入中国也就是百余年的历史，杜晓光作为一名成绩卓著的水彩画家，他既有着丰实的文化底蕴又很重视美术基础技法。他的作品繁盛充盈、精巧秀丽、光彩照人、泱泱大度、曲高和众、雅俗共赏。

大凡学画者，皆有一个从无法到有法，再从有法到无法的过程。没有梦想的人是无法搞艺术的。对常人来说，梦只是梦而已，对艺术家杜晓光而言，梦就是他的日常现实生活。杜晓光是一个寻梦的人。他出生在华北大平原，他热爱华北大平原，所以他创作的水彩画大多取材于诗情画意的华北大平原，以他的灵感、才华、丰实的经历和智慧，观千剑而后识器，使得他创作的画面极富美感，这种美感不是宫廷皇家的富贵，也不是性情文人的野逸，而是一种超自然的清新淡雅，像被水洗过一样洁净，像清幽空谷能听到走路的声音，没有一丝尘

埃，有的是毫不夸张的活力和自在的生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丹青路漫漫，岁月悠悠情，杜晓光三十年对绘画的不懈追求，在中西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徜徉。纵观他的水彩画，让人感受到的是他调动全部智慧对人生以至自然宇宙的高层次的把握和理解。水彩画的学问里，水的运用颇为讲究，杜晓光在水、色、时间的控制上，意在笔先，笔意韵致，恰到好处地掌握水分色彩时间上的变化，水色交融，以型达意，意象之美、蒙胧之美，高度概括，品味之致，晶莹润泽，远处水多，近处水少，淡色水多，浓色水少，远景、中景、近景层次分明，再加上合理运用水彩画的干画法、湿画法、干湿结合画法、沉淀法、撒盐法、遮挡法、刀刮法，使得他笔下的乡间农舍、林间小路、茂密丛林、冬日雪景都赋予了一种宗教般的生命，让人留连忘返，沉思不已。

杜晓光现为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天津美术家协会水彩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天津青年水彩画展评审委员、民革画院理事、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客座教授、韩国水彩画协会国际会员，天津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新加坡星中国际美术艺术会客座教授。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及在韩国首尔、日本东京的美术展览并多次获奖，多幅作品被国内外文化机构及收藏家收藏。

天津近代收藏家 侯福志

2005年春节前夕，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人物》专栏，制作了系列节目——《流年碎影》，其中有一集是关于影星胡蝶的专题片，在大年初三晚上播出。在这一集中，有一个镜头是《天津商报画刊》策划的《蝶婚专页》。为中央电视台提供这一“孤本”的，便是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武清籍人侯福志。

虽然被繁忙的行政管理工作缠身，但工作之余，侯福志仍然要挤出时间来满足自己的收藏爱好。多年来，他曾多次将自己收藏的老报纸、老杂志、老图片无偿提供给相关单位，有的被用来编写史志，有的被用于名人传记，还有的用于拍摄电视专题片等。凭借收藏，侯福志被天津市河北区政协文史委聘为特邀委员，成为全国报刊收藏界响当当的人物。

刚过不惑之年的侯福志供职于天津市国土房管局，现为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天津市科普作家协会、地质学会、地名学会会员，天津市矿业协会理事。《中国国土资源报》、《法制周刊》特约顾问。自1986年开始，从事民国文献收藏和天津地方史研究。累计在《今晚报》、《天津日报》、《每日新报》、《中国老年报》、《天津老年时报》、《中国国土资源报》、《地球》等报刊杂志发表各类文章600多篇，其中有30余篇作品入选各类文集，多篇论文和研究成果获部、市级有关奖励。每至双休日，三宫等旧书市场就成了他淘宝的好去处，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三宫旧书市是出故事的地方，每当开市的时候，总有一些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某某人的珍品字画现身了，某某大师的小说手稿被低价售出了，某某名家的大批签名被北京买走了，等等，不一而足。由于侯福志是这里的常客并多有所获，所以有时候他也成了故事中的主人公。比如，有一次，他在三宫淘到一本解放前银行天津金城银行的老存折，由于该存折是活期的且未用完，加之存折的主人是南开中学创办者之一的王奎章，其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引起了银行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每日新报》以大幅版面对此发现加以介绍，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节目中滚动播出。

天津地方史志资料和解放前的老报纸、老杂志，构成了侯福志收藏的一大特色。目前，他在天津三宫、文庙、鼓楼旧书市以及北京潘家园收集到的涉及天津地方史志的书籍已达五千多册，包括各区县志、行业志、民间文学、文史资料，以天津为地域背景的小说也纳入了他的收藏视野。晚清民国时期，天津作为北方的报业中心，先后出现过三四百种报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报纸本身不易保存，故流传下来的老报纸已成凤毛麟角。经过十多年的苦心搜求，侯福志已收藏了六十多种、数百份。其中，有晚清时期用宣纸印刷的《醒华日报》，有鲜为人知的《小说月报》，有难得一见的《广播日报》，有用天津话“现世报”谐音命名的《现世报》，还有《新世界》创刊号、《北洋画报》纪念专号，等等。前几年，宫以仁先生为编辑其父亲、现代小说家宫白羽的传记而忙碌，但苦于没有宫白羽的早期作品，看到侯福志发表在报纸上的《宫白羽与〈东方朔〉》一文，披露宫白羽上世纪20年代末发表在《东方时报》副刊《东方朔》里的许多散文作品和文学评论文章后，非常兴奋，经多方打听找到了侯福志。侯福志提供了宫白羽早期作品的复印件，宫以仁向侯福志赠送了由他编辑再版的宫白羽先生的小说，还向他提供了宫白羽曾经用“杏呆”、“耍骨头斋主”等笔名发表作品的信息。侯福志根据宫以仁提供的线索，又以他收藏的四十多张《东方朔》中找到宫白羽发表的多篇文章，从而为研究宫白羽早期文艺活动和作品提供了实证。

把收藏与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挖掘天津的文化宝藏，为提升天津的文化品位做贡献，是侯福志收藏的宗旨。十几年来，他发表有关天津地方文史的文章已逾五百篇，还参与了《天津老街道》、《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等多部天津文化史书籍的编写或审定工作。去年，他还把多年收藏到的民国时期天津老报刊集结出版了一本《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在业内影响很深。这些成就，都离不开他那些从故纸堆里寻来的宝贝。

国家一级教练、一级裁判 马振华

2006年元宵节刚过，从香港传来好消息，在2月14日落幕的首届香港国际武术大奖赛上，以个人身份参赛的华北石油管理局综合五处退休职工马振华闯关夺隘，力挫群英，连夺太极五星椎、太极八卦刀、太极十三连环大枪等3块金牌，获得由著名武术家蔡龙云先生签发的获奖证书。此次大奖赛共设太极拳、南拳、传统拳、散打等6个项目，分为儿童、少年、

青年、老年 4 个年龄组，来自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名选手参加角逐，马振华在老年组比赛中身手矫健，技惊四座。

出生于 1940 年的马振华祖籍天津武清高村乡牛镇，出身于武术世家。祖父马玉精通六合门、少林门、八极门等派拳法，在武术界颇有声望，曾受聘担任民国大总统曹锟的护院，与当地太极名家李瑞东、通臂拳大师张策等武术名家经常往来交流，研讨切磋，关系甚厚。父亲马德录幼承家学，青年时期得到太极名家李瑞东先生创编的太极五星椎真传。

马振华 6 岁起随祖父和父亲习武，先后学习六合门、八极门、通臂门及少林门等众多武术门派的功夫，26 岁起跟随父亲学习李式太极拳及杨式太极拳杨班侯小架，39 岁时拜李式太极拳全套功法继承人李昭印先生为师。几十年勤学苦练，马振华博采众长，全面掌握了李式太极拳的八刚十二柔、九种架式及十二种动物之形、离、粘、随、秘传口诀，以及太极十三桩、太极十三丹等功法。

在几十年武术生涯中，无论是在新疆克拉玛依还是华北油田工作，马振华都要以武会友，他多次参加武术比赛，倾力投入武术教学，成绩斐然，桃李满天下。他曾获得河北省武术赛传统拳第 4 名，河北省职工武术赛传统套路第 3 名，河北省民间武术赛一等奖。他在新疆克拉玛依建工四团担任体育教师 20 年，同时被克拉玛依市体委聘为业余武术班教练，先后培养学生 400 多人，其中两人成为市体委教练。

从 1979 年来到华北油田，直到退休，马振华一直在华北石油管理局体委担任武术教练，几乎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武术教学中。他培养出的学生在国内外各类比赛中佳绩连连。第六届世界武术锦标赛长拳冠军、八运会武术全能亚军姜邦军就是他的高足。2005 年全运会男子空手对练项目第一名获得者天津武术队的程坤也是他的学生。此外，他培养的学生还获得九运会武术单项第二名，全国工人运动会武术比赛第一名，他还为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院、河北体院、沈阳体院等高校输送 13 名武术专业人才，为各地高校培养 20 多名武术特长生。

在 60 年习武生涯中，马振华风雨无阻，习武不止，痴迷不悔。他说：“一天不练心里空，两天不练手中松。”就连大年三十、初一，他也要坚持练功。在马振华看来，武术不仅仅是拳脚器械的搏击，其中更蕴涵着一种哲学和文化。马振华认为，练武要讲求武德，必须遵守《练艺十二不准》，包括不准不忠国家、不准不孝父母、不准不友兄弟等，此外还有练艺《三不传》、《大八戒》、《小八戒》等等。

几十年来，马振华不懈追求着武术强身健体的最高境界。对自己掌握的东西，从来是毫无保留，倾力传授，他曾获得由中国武术协会等单位颁发的“全国优秀武术辅导员”奖章。退休后，他受聘担任浙江大学李式太极拳协会总教练，培养出大批武术人才，在浙江省第三届国际武术大会中，获竞赛套路太极拳第一名，传统套路第一名，八极拳第三名，太极拳器械第二名，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太极拳竞赛中，6 人次获太极竞赛套路前 3 名。

马振华本人也在 2002 年杭州国际太极邀请赛中获得太极拳、太极剑、太极大枪等 3 个项目的金牌。2004 年在第二届浙江国际传统武术大会上获得李式太极拳、八极拳、太极大枪和传统杨式太极剑等 5 个项目的冠军，并获得全能优秀奖。

马振华目前是河北省武术协会会员、国家武术六段、国家武术一级教练、国家武术一级裁判，其业绩被《民间武术家名录》一书收录。在他的熏陶和影响下，他的儿子马宁也成为

一名武林高手，曾获得河北省第七届运动会传统拳第一名、石油体协武术比赛个人全能第三名、河北省武术比赛个人全能第五名。在这个武术世家里，正不断续写着新的传奇。

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武术教习、武术名家 高瑞周

高瑞周（1900～1958 年）名金城，男，天津武清人。近代武术名家李瑞东宗师的入室弟子。1947 年在民众的协助下，在北京成立了汇通武术研究社，并担任社长，八极拳名家张立堂、八卦掌名家马艺林、吴式太极拳名家王培生协助教练工作。

汇通武术研究社面向大众、青少年传授李瑞东门派优秀传统武术、李式太极拳（太极五星锤）及八极拳等拳械。每天下午、晚上，上百名学员们在汇通祠前广场练拳舞剑，既传播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推动了群众性的民族体育健身运动。汇通武术研究社还经常和兄弟武术馆校进行武术交流，以高瑞周老师为首的汇通武术研究社弟子表演的是五禽拳、翻子拳、五龙通花炮、太极五星锤和八极拳等拳械；以吴子贞老师为首的四民武术社弟子表演的是形意拳、八卦掌和戳脚翻子拳等拳械。在“汇通祠”前的广场“汇通”和“四民”两个武术社的学员，既交流了武术技艺，又增进了友谊。一时传为佳话。四民武术社的老学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系主任门惠丰教授回忆当年的盛况时说：在北城比较活跃的武术馆社就是汇通武术研究社和四民武术社。

1948 年 9 月在“汇通祠”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北京汇通武术研究社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北京市武术界的名家、各武术馆社的代表和学员五百余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汇通武术研究社的学员表演了精彩的传统武术套路和对打。

1953 年高瑞周老师的率领汇通武术研究社的优秀学员白玉玺、武淑清、赵淑琴、张旭初参加了华北地区武术运动会，同年参加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均获武术金牌奖。高瑞周老师担任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的武术裁判员。1951 年前后，响应国家号召多次率领弟子参加北京市运动会进行武术表演。1954 年，曾积极参加国家体委组织《精简太极拳》（简化太极拳的前身）的编写工作。

高瑞周老师曾是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的武术教习，梅兰芳先生经常练的太极拳和太极推手就是高瑞周亲传的李式太极拳。《中国武术百科全书》刊登了梅兰芳与武术师高瑞周练太极拳推手的照片。在梅兰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画册中，刊登了梅兰芳先生在庭院演练高瑞周亲传的李式太极剑“凤凰展翅”的照片。在 1955 年由著名戏剧家吴祖光执导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电影艺术片中，有梅兰芳先生在家中庭院演练李式太极剑的珍贵镜头。高瑞周还是著名针灸中医师，医术精湛，医德高尚。

革命英烈 张殿兴

张殿兴是抗战时期宛平县二区抗联主任。被捕后为党严守机密，宁死不屈，于1942年9月26日被日伪军杀害，成为革命英烈。

张殿兴1898年出生于天津市武清白古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参加革命前，父母兄弟一家五口，以扛活、卖苦力为生。张殿兴年轻时性情刚直，七七事变前的一年夏天，几个国民党兵痞到他家瓜地白吃瓜，他硬是不让。兵痞设计在瓜铺里暗藏子弹，诬他私藏枪支并将其抓捕拷打，他两腿被打烂也未屈服，幸得乡邻花钱具保才被放回。

抗日战争爆发后，40岁的张殿兴毅然参加八路军，在部队服役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因年龄较大、身体不好(患有气管炎)调离部队，分配到宛平县二区(现南各庄乡押堤一带村庄)任区抗联主任。9月，形势紧张，县区干部暂时撤离，张殿兴奉命坚持隐蔽斗争。他以“老道”身份，住进刘各庄村东寺庙内，村党支部书记李广林暗中协助其开展工作。张殿兴利用自己会柳编的手艺，经常帮助群众编织小物件，和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以此为掩护，走村串巷，搜集东押堤、北寺堡、大古霄等据点之敌情。

1942年8月，张殿兴被押堤据点的特务探知真实身份，不幸被捕。敌人把他关在地下室(俗称鸡闷子)里，对他严刑逼供。张殿兴始终坚贞不屈，严守秘密。9月26日，张在东押堤村南惨遭日伪军杀害。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干部群众收殓张殿兴烈士遗骨时，发现在他的锁骨、胳膊、大腿等处有六枚四寸长的铁钉。

党的儿子 穆汉祥

走进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的大门，迎接你的是“革命传统教育一条街”，这里有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馆名的上海交大校史博物馆，有交大百年校庆里程碑，有五卅运动纪念柱，更有一座引人注目的革命烈士纪念碑。这座碑上，铭刻着新中国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的亲笔题字：“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值得永远纪念的”。在这座纪念碑下，长眠着两位交大人引以为豪的优秀学长，两个年轻而伟大的生命——穆汉祥、史霄雯。

穆汉祥，祖籍武清杨村，1924年出生于湖北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43年夏，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穆汉祥从专科学校毕业，进了兵工厂，他决心用自己所学的本领为抗战出力。他与工人打成一片，向他们宣传抗日，抵制工头的贪污，深受工人的爱戴。然而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刻意找他的麻烦。穆汉祥逐渐认识到，民族的苦难不仅仅是因为外敌入侵，

还有社会的黑暗腐败，他苦闷地寻找新生的道路。

1946年，交大从重庆迁到上海。20多天的艰难旅途，穆汉祥和同学们经过川北、陕西等地，触目皆是贫穷悲凉的景象。他们看到国民党军队忙着拉壮丁、征军粮、运军火，内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祖国大地的满目疮痍，国民党政府“和平建国”的谎言，击碎了他对抗战胜利、国家未来美好的憧憬。

当年4月，全国19个省市发生灾难，尸横遍野，灾情严重的湖南省，平均每天饿死600人。穆汉祥和同学一起发起救灾运动，在党组织的引导下，迅速形成全市的救灾反内战运动。这是穆汉祥进交大后参加的第一次政治斗争。他省下饭钱，买来刻刀、画笔，学习漫画、木刻和写诗，他常对周围同学说：“我们要用笔作匕首，狠狠刺向敌人的心脏”，“多画一张漫画，就是多向敌人投下一颗炸弹。”他曾创作了《美国兵滚出去》、《向敌人炮口要饭吃》等大幅宣传画和标语，贴在当年交大的校门口，贴在请愿的火车头上。

1947年，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在斗争尖锐紧张的时刻，党组织批准了穆汉祥的入党申请。1948年1月，在国民党骑巡队冲向游行队伍的危急时刻，穆汉祥冲上前排，扭住敌人的马缰。敌人用马刀向他砍去，砍落了他的门牙，鲜血如注。

这一年，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国统区的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开始了血腥大迫害，大批被暴露的同学被迫离开学校去解放区。党组织考虑让穆汉祥到解放区去，但他主动申请勇敢而坚决地留了下来，他说，“为了斗争，我愿流尽我的鲜血，我们这一代不牺牲，会使下一代流更多的血。”1949年4月30日，穆汉祥不幸在虹桥路上被特务逮捕。5月20日，在上海解放的隆隆炮声中，被敌人杀害。后来，同学们凭借着被马刀砍剩的半颗牙齿，才辨认出他的遗体。他的指甲已被残酷地拔去。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一年，他年仅25岁。“我愿化为泥土，让人们践踏着走向光明的前方。”穆汉祥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后来，有人将穆汉祥事迹集结出版了《党的儿子穆汉祥》一书。

作家、翻译家 果永毅

果永毅，笔名果毅，1945年8月5日生于天津市武清区泗村店乡南马房村。

果永毅1965年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遂根据教育部指令，被选派到法国留学。于当年10月抵达巴黎，先后在语言中心和阿里扬斯学校学习法语。这批留学生是中央为准备加入联合国而培养的后备外事干部。本来学制四年，由于第二年国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被迫中断学业于1967年初奉命回国参加“文革”。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时，曾亲历了当时震惊全国的红场事件。归国后在外交部参加了一年多的“文革”运动。后于1968年奉周恩来总

理的指示，分赴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劳动锻炼。两年后的1970年秋，经所在部队陆军第二十四军批准入伍，当了一年多政治干事。1972年，解放军总政治部从全军征调外语干部，到海军参加对外国海军技术人员的培训。果永毅应调到上海海军东海舰队外训学校，任法语翻译，培训非洲及东南亚国家的海军舰艇人员。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果永毅自上海奉调到北京军委炮兵研究所任法语翻译组组长，前后从事法语口笔译十余年。1979年，恢复高考的第三年，他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报道专业，三年后毕业，获硕士学位，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国际部。自此，在人民日报社工作23年，先后担任人民日报社国际部记者、副主任，人民日报驻法国首席记者及高级记者，在为人民日报完成分管的国际新闻编辑、采写及评论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翻译了一些与新闻业务相关的书籍，已出版的主要著作和译著有《世界新闻简史》（与许崇山等合译）、《笑的历史》（与许崇山合译）、《好梦成真》（与郭泓合著）、《萨科齐奋斗之路：从移民之子到法兰西总统》（与云山合著）、《论国际政治漫画的评论作用》、《法国前总统蓬皮杜夫人回忆录》（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作序）。

2005年11月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去年5月起，参与创刊《非洲》月刊，任副总编辑至今。《非洲》杂志是为应对中国与非洲大陆迅猛发展的全面友好合作关系，由全国新闻出版总署特批的目前全国唯一一家专事报道非洲的大型中文月刊。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管（对外友协会会长陈昊苏兼任社长），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非友协会会长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任首席顾问）。

白山黑水抗日寇 天山脚下育英才

——记三代教育工作者崔荣昌、崔乃然、崔大方子孙不悔的追求

崔荣昌（1909—1941），天津市武清杨村人，1926年入伍东北军二十七旅四十一团，1930年毕业于黑龙江讲武堂，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调派东北抗日义勇军黑龙江步兵二旅任学兵连少校连长，参加了海拉尔以东的朱家坎激战和扎兰屯之战，为保卫祖国与日寇浴血奋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抗战失利后，于1933年转道原苏联西伯利亚到达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在新疆组织学兵连学员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后历任抗日军二旅少校营长、中校团副、上校参谋长；1934年调充新疆陆军军官学校任上校总队长，从事陆军军事人才培养工作；1936年调充新疆边防公署军务处任上校副处长；1937年入马列主义高研班学习，毕业后委派新疆骑兵四十八团任团长兼代喀什警备司令。1941年盛世才制造“崔荣昌学兵连阴谋暴动案”，诬陷其联合东北军学兵连骨干企图潜回内地抗日以瓦解新疆的军政力量，在迪化将其逮捕入狱，同年被害。崔案共逮捕涉案军官及飞行员124人。为维护祖国统一和边疆安定团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32岁。

崔乃然，1935年出生，中共党员，植物分类学专家，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享受者，新疆八一农学院和新疆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57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专业，后分配新疆八一农学院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5年调新疆师范大学后曾任植物学科首席导师、生物系主任。主要从事系统与进化植物学、农作物及牧草种质资源的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新疆极端环境植物种质资源调查研究、新疆草地资源调查研究、新疆野果林综合研究、新疆农作物野生近源种资源调查与收集等国家、农业部和自治区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植物分类学》，主编《新疆植物志》(第六卷)、《新疆重要饲用植物志》、《新疆草地植物名录》、《新疆植物检索表》、《天山野果林综合研究》等专著6部，参加《中国植物志》、《中国饲用植物志》的编研，发表科学论文30篇，发现植物新物种18个；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新疆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4项。曾被评为全国高等院校先进科技工作者、新疆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农业部先进工作者、新疆优秀专业技术工作者，获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二等奖。教书育人40多个春秋，为新疆高等教育和新疆畜牧业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5月退休。

崔大方，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广东省“南粤教书育人优秀教师”，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5年毕业于新疆八一农学院生物专业；后获西北大学硕士学位和中山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1997年任新疆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1997年调华南农业大学任教，后任学校植物学课程首席教师、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教务处处副处长；2007年任公共基础课实验教学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系统与进化植物学、资源植物评价的研究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部级科研课题近10项，已发现植物新物种32个；合作出版《中国苜蓿》、《新疆植物志》、《天山野果林综合研究》等专著8部；主编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植物分类学》、《园艺植物分类学》等国家规划教材，发表教研、科研论文80余篇，被SCI、CSSCI收录多篇。获新疆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广东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项、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深圳市科技创新奖1项。主持广东省高教教改工程等课题5项，获得广东省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华南农业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4项。2006年评为华南农业大学首批“教学名师”。

“文革”中蒙难的高干 高芸生

高芸生(1910~1966年)，名际洲。天津武清石各庄人。

1935年在北平参加少年共产主义先锋队，并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同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1937年与北平中共地下党40多名党员奔赴山西抗日，先后任晋西北县政府秘书、县长及晋东南、太岳区专员等职。1949年随军南下，任豫西专员、豫陕鄂行政专署主任、豫西行辕主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秘书长。1949年11月，先后任中共大冶工矿委员会书记、华中钢铁公司监委、经理，中南重工业部黄石市办事处主任，中共黄石市市委书记兼中共中南工业部华中钢铁公司(大冶钢厂前身)委员会书记、315厂筹备处副主任。在此期间

依靠技术骨干起草了扩建华钢的可行性报告,并于1950年初组织大冶设计组赴京会战。1952年12月,任部属华钢副总经理兼大冶钢厂厂长。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武汉钢铁公司副总经理等职。不久,参加武钢筹建,高和苏联专家一起确定武汉市青山区为武钢厂址,并率华钢的技术人员赴北京、鞍山的钢铁厂学习、练兵,领导了武钢建厂初期的基本建设工作。

1956年,调任中共北京钢铁学院委员会第一书记兼院长。1966年7月6日含冤去世,终年五十六岁,遗骸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79年3月3日高芸生同志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毛联珏主持,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致悼词。悼词说:高芸生同志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襟怀坦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坚持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建设工作。几十年来为革命事业竭尽全力,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北京市委决定,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而强加给高芸生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予以全部推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方毅、余秋里、胡耀邦、谷牧、王任重、康世恩等送花圈。薄一波、安子文、蒋南翔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北京钢铁学院的工作人员,以及高芸生同志的家属和生前友好,共八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政委 陈卫明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国庆阅兵盛典上,我们看到一支支英雄的部队踏着雄壮的步伐穿过天安门,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在那一刻,时间仿佛凝结,受阅官兵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风采永远地定格在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如果把受阅方队比喻成一条蛟龙的话,那么让这条蛟龙能够完美起舞的就是它的龙首,也就是一直担负着军旗护卫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大队。说起备受瞩目的三军仪仗大队,就不得不提起这支部队的政委陈卫明。

陈卫明1963年4月生于武清大黄堡乡四马营村,1981年10月参军入伍,研究生学历,大校军衔。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干事、指导员、政治协理员、教导员、教导队政委、特警团政委,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政委。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被北京军区表彰为“优秀旅团单位主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主要担负迎送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军队高级将领及纪念、庆典等重大国事活动的仪仗司礼任务。礼仪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精华,军人执行的国礼、军礼更是一种精粹。

三军仪仗队建队以来,先后圆满完成了外国首脑访问,香港、澳门回归政权交接仪式升国旗,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国旗升降、颁奖等3000多次仪仗司礼任务,被中央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赢得了国内外公众和舆论的广泛赞誉。

每一位来访的外国元首，踏上红地毯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陈卫明说：“仪仗司礼任务的逐年增多，充分证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事实上，仪仗队本身既是对外开放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他们向军内、军外甚至国外都是“开放”的。

陈卫明说，自 1981 年总参正式批准仪仗大队在不影响执行任务的情况下向全军适当输送练习骨干后，20 多年来，从雪域高原到天涯海角，从北国边防到万里海域，2500 余名仪仗精兵已“标兵就位”到全军各个岗位。他们像一颗颗优质的种子，生根、开花、结果，带出了好风气和过硬作风。

崇拜没有国界。2001 年 4 月，加蓬共和国国防部长阿里·邦戈来华访问时，对三军仪仗队威武的阵容和排山倒海的气势印象深刻，随即表示，希望中方能派专家到加蓬帮助培训一支国际水准的专业化仪仗队。这，就是仪仗大队

付出总有回报，三军仪仗队的考核成绩一直排在前列。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响亮。陈卫明政委自豪地说，三军仪仗队战士的步伐就是标准尺，他们不但自己的训练抓得好，还承担了帮助其他方队培养教练员的任务，而且还派出了 47 名优秀教练员去执教。

“我们把个性化管理灌输到任务之中，提出了‘休息好、娱乐好、保障好’的‘三好’人性化保障目标，使队员能够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阅兵训练之中。”

三军仪仗队方队是国庆阅兵的第一方阵。作为引领所有方队前进的“龙头”，万里挑一的仪仗兵们把正步当事业、当人生。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精彩，哪里就有喝彩。陈卫明政委很自豪地说，三军仪仗队的官兵们的辛勤付出获得了收获，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祝福：我们三军仪仗队常年担负着国家和军队的外事司礼任务，我们三军仪仗队有一个口号，叫作：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三军形象重于泰山。我们代表的是三军，通过阅兵，通过整齐的动作、良好的精神风貌、威武的形象，来展示我们三军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

陈卫明自 2007 年任三军仪仗队政委后，坚持把服务基层与排忧解难统一起来，把抓硬件与抓软件统一起来，把抓当前与抓长远结合起来，确保了三军仪仗队科学发展、质量发展、安全发展。带领部队先后圆满完成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仪仗司礼任务，第 29 届奥运会、第 13 届残奥会支援任务，六十周年国庆首都阅兵三军仪仗队方队任务，上海世博会议仗司礼任务等重大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所属单位被北京军区表彰为“先进党委”、“人才建设先进单位”和“阅兵工作先进单位”，还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被团中央授予“五四红旗团委”；陈卫明个人荣立三等功一次。

2008 年 4 月，在海南执行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仪仗司礼任务期间受到胡主席的亲切接见。

从三军仪仗队身上我们看到，正步走出来的是中国军人气度，每一滴训练场上的汗水，都凝聚成接受检阅的那光荣时刻，这其中也饱含着陈卫明的多少心血！

中国当代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曹理

曹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1936年生，天津武清王庆坨人。自幼师从曹试甘、朱宣玉、刘育和学习钢琴，11岁曾被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键盘专业破格录取，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

1955年被分配至北京西城区宏庙小学任教。1960年被选调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小学语文和音乐教研员。1972年到北京师范大学(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曾任音乐理论与教育教研室主任，为各层次学生讲授基本乐理、中学音乐教材教法、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并指导教育实习。通过多年奋斗，她完成了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小学教研员到音乐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转变。

1988年底，她担任国家教育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课题组负责人。1993年主编出版了课题成果《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0年12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会理事长，现为该学会名誉理事长、顾问，并为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特邀理事。

1986年至今先后参加国家教育科学、国家教委及北京市等重点科研项目，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中学音乐能力研究”、“音乐教育心理研究”等“八五”、“九五”重点科研项目课题组负责人及“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研究组成员。为中学音乐能力研究、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研究、外国音乐教育研究等专题组负责人。作为主编或主要作者还出版了《中学生学科能力目标·音乐》、《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音乐学习与教育心理》、《音乐教学设计》、《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丛书》、《小学音乐教学案例及评析》、《新课程音乐教学案例选评》、《与名师同行》、《一代名师曹试甘》、《曹理音乐教育文集》等三十余部。其中《中学音乐教学论新编》获199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音乐学科教育学》获2001年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在《人民教育》、《人民音乐》、《中国音乐》、《中国音乐教育》等刊物发表论文四十余篇。1958年至今，多次参与编写小学、初中、高中音乐教材，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学音乐》教材及教参(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副主编。自1995年始连续担任五届全国音乐教育论文及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录像课评比、全国中小学优秀音乐课现场教学评委。

1993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及人民教师称号，1997年获曾宪梓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二等奖。1959年、1960年、1983年、1989年、1993年先后多次获得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教育先进工作者称号及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享受1996年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民族英雄 刘髯公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北京沦陷，7月30日天津又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寇刚进天津，便对各种报刊严加控制。一方面威逼利诱少数没有骨气的报刊决策人，按照日本人的指令从舆论上美化入侵者的丑恶嘴脸；另一方面对众多抗拒与日本人合作的爱国报人疯狂迫害，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制造了多起令人发指的血腥事件，《新天津报》的社长刘髯公，就是因为敢于利用报纸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愤怒痛斥汉奸卖国，而惨遭日寇杀害的典型人物之一。

刘髯公其人

刘髯公原名刘学庸，回族，武清杨村镇人，生于1893年。他青年时代曾在北洋新军的王金标部下服过役，在法国驻华公使馆干过差事，还曾担任过天津法租界工部局的侦探长。1924年9月，他与好友段松坡、薛月楼三人合伙，创办了四开报纸《新天津报》，他任社长兼经理，段任副经理，薛任协理兼报纸主笔。刘髯公虽然出身寒微，接受的文化教育不多，而且他创办报纸，既没有实力强大的政治后台，又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却从创刊到停刊的十三四年间，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社会影响相当广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了解平民百姓注重实际与通俗化的文化需求，他把报纸的发行对象锁定在平民百姓阶层，并在《新天津报》的报头旁另印一行副标题：“平民化的报纸”，把报纸的宗旨明显地昭示给社会群众。这份报纸面世后，大量刊登老百姓所关心的某些社会弊端的评论文章和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他还派人到书场里，记录诸如蒋轸庭等著名评书艺人所说《雍正剑侠图》等长篇评书，经过编辑加工后，在《新天津报》上连载。这种以大众化、通俗化为特色的办报方针，受到为数甚众的老百姓欢迎。后来，刘髯公在已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又陆续发行了《新天津晚报》、《新天津晓报》、《文艺报》、《新天津画报》、《新人月刊》等附属报刊，日销量最高峰时达到五万余份，这个发行量在当年的天津报业实属罕见。一时间，《新天津报》一跃成为天津的名牌报纸之一。20世纪30年代，每到黄昏的时候，天津的街头巷尾随处可闻卖报人那“看报看报，新天津晚报”的叫卖声，它几乎成为当时天津街景闹市的一种特色。在扩充报社的同时，还设立私家电台，办新闻函授学校等，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报业集团”。

刘髯公为人豪爽仗义，性格倔强直率。还是他在法租界工部局任侦探长的时候，就深刻体验到在外国人手下做事的艰难，他一心谋划着有朝一日自己在社会上独立创业。他创办了《新天津报》后，自身的机警干练得到了充分施展。他对报馆内的人事安排是量才用人，使每位同仁都能各尽所能、尽职尽责地为报纸效力。他主持报馆工作，既严肃又轻松，他为《新天津报》制定的训词是：“大公对外，忠实服务，倘有陨越，上帝临汝”。他把训词制成镜框，悬于报馆墙上，每逢节日，他还要对全体员工训示一遍。在刘髯公领导下的《新天津报》同仁们，上下齐心协力配合，把报纸办得生机勃勃。刘髯公对外交际方面颇具人情味，善于结交不同阶层的人物。诸如刘春霖、严范孙、华世奎、赵幼梅等文化界元老名流；石友三、刘镇华、陈光远等在天津作寓公的失意军阀、政客；高兴桥、卞白眉、李魁元等金融界巨擘；

金少山、李少春、马连良、程砚秋、杨小楼、孟小冬、小达子、刘叔度、近云馆主等戏曲大家、名票，乃至三教九流中人，无不与刘髯公有密切往来。这些人物对于《新天津报》，都曾从不同角度给予过支持。刘髯公经常同一些京剧爱好者同出同进天津各戏园，看戏、吃喝等所有花销概由他一人掏腰包。同乡、同学、亲戚、属下凡来求他帮助者，他总是有求必应，慷慨解囊。他关心家乡教育，在老家杨村七街自家宅院办起了第一所回民小学。还出资举办杨村全镇学生演讲比赛会，奖励优秀学生。家乡的清真寺被雷击，后殿烧毁，刘髯公带头修缮。一年家乡发大水，他捐资 6 万大洋帮助乡民建一座排水涵洞。一天他听家人说，天仙戏院（今民主剧场）门前有一、两千难民正在雨中淋着，无处避雨。刘髯公立即给天仙剧院产权人打电话，提出让难民暂住进戏院，他付房租。1933 年秋，他请来同益呢绒店的裁缝师傅，为报馆的编辑们每人订做呢料大衣一身。他的一位同乡工人要结婚，去找刘社长借支工资，刘髯公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 40 元钱送给他作礼金。诸如此类数不胜数的事例，经报馆同仁们众口相传，刘髯公在天津社会落下良好口碑。

以敢骂权贵享名于津

自《新天津报》创刊时起，刘髯公经常不断地以髯公作笔名，亲撰社论，痛骂贪官污吏和无德的军阀党棍。他所写文章，敢于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痛快淋漓地说真话，而且文通理顺，浅显直白，很容易引起社会中下层群众的感情共鸣。刘髯公因此成为当时天津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有他，《新天津报》也备受读者青睐。当然，刘髯公因为常在报纸上痛骂实权在握的大人物，也给自己招来了不少的麻烦。诸如直隶省长李景林、天津督办褚玉璞、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盗窃东陵宝物的军阀孙殿英等人，因为挨过刘髯公的骂，而对他恨之入骨。由于在直奉二次交战时，《新天津报》明确表示拥护直系反对奉系的缘故，奉系首领张作霖之子张学铭 1931 年出任天津市市长时，有人煽动他勒令《新天津报》停刊。所幸恰于此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刘髯公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到处游说，才避免了《新天津报》被封的厄运。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具有爱国之心和民族正义感的刘髯公，在《新天津报》上著文，谴责东北军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更加深恶痛绝。他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在他领导的《新天津报》上加以引用。他在报上著文，大加褒扬马占山、冯占海等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声援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淞沪前线 19 路军和宋哲元指挥的 29 军大刀队。在民族危难的紧急时刻，刘髯公表现出与入侵敌寇拼争到底的决心。

刘髯公旗帜鲜明的抗日宣传，赢得了爱国人士的敬重与信任，却惹恼了日本特别机关和汉奸卖国贼们。应刘髯公聘请担任《新天津报》编辑部主任的报界精英朱晓芙，与刘髯公的抗日思想步调一致，积极在报上编发抗日新闻。1936 年秋，朱晓芙被日本特务暗杀在寓所里。面对反动势力的迫害暗算，刘髯公毫不动摇，毫不退缩，而且更勇敢地向日本侵略者、向凶狠的邪恶势力出击，他要为捍卫真理和正义战斗到底。

决心抗战，痛斥日寇阴谋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冀东成立了伪政府，通州保安队起义，奋勇杀敌。刘髯公为了宣传抗日以鼓舞沦陷区人民群众，及时刊印了《新天津报》号外，向市民大量散发。随后几天，华北地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刘髯公为避免日寇的迫害，决定《新天津报》暂时停刊。他在天津沦陷的前夕，在报纸上刊出文词悲壮慷慨的社论，向广大的读者暂时告别。

日寇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后，立即命令所有报刊和通讯社重新登记，派日本特务竹内以顾问的名义，督促伪市公署新闻管理所对各报进行审查，逼迫各报馆采用日本同盟社的电稿，不准刊登有关中国人民抗战的消息和言论。凡不服从日寇命令的报人，轻者查封报馆，重者进行人身迫害。天津《益世报》的经理朱宝常，就是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采用同盟社的电稿，而与秘书师潜叔一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后被枪杀。在日本侵略军惨无人道的高压下，除几家少数报纸附逆日寇获准出版外，其余大小报馆纷纷停刊，大批的报人或流亡后方或改作他业，天津的报业遭受了空前的沉重打击。

因为刘髯公在天津报界享有一定的威望，他还兼任天津回民领袖，日本特务机关便在他身上打起了如意算盘。他们派出了汉奸王小言到刘髯公跟前说项。这个王小言，原是天津东亚医院的日文翻译，曾经是刘髯公的朋友。天津沦陷后，他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作了汉奸。1937年7月29日，他当面向刘髯公转达了日本当局安排刘出任社会局局长的决定，还通知他出席汉奸组织天津市治安维持会筹备会议。刘髯公听说日本人让他当汉奸，雷霆大发，没容王小言把话说完，就将他骂了出去。不想第二天、第三天，王小言又连续两次开着车接刘髯公去出席维持会的筹备会。刘髯公将王小言拒之门外不与他会见，声言不准他再来登门。

日本特务机关听了王小言的汇报，知道刘髯公不是等闲之辈，他们绞尽脑汁要把他制服。日本特务收买报业中的民族败类，为刘髯公罗织了三条罪状。其一，他多年来一贯宣传抗日，不与日本友好。其二、他拒绝出任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伪职，不与日本人合作。其三、无中生有地往他头上扣了一项“国民党地下抗日宣传组长”的帽子。日本特务机关据此指使宪兵队对刘髯公实行抓捕。

惨死在日寇的酷刑下

自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后，刘髯公一直在意租界大马路（今河北区建国道）的住宅兼报馆里深居简出，他并不知道日寇已经做好对他下手的准备。九月的一天，有人告诉他，因为日军在近郊焚烧抢掠，造成大批农民到市里逃难，约有千余名饥寒交迫的难民露宿在特别二区的东天仙戏院一带（今民主剧场附近）。刘髯公亲自前去查看。时已初秋，他见到妇女儿童啼饥号寒，其情其状惨不忍睹，当即决定用汽车把部分难民安置到报社暂住，以解燃眉之急。但租界地有禁止难民入境规定，未能实现。刘髯公吩咐其子刘承年与报社记者姚一达一起，找天津商会想想办法。当时市面混乱，商会已无人负责。刘髯公再派其子向仪品房产公司求助，请他们拨几间空房给难民中的孤老妇幼们暂住。同时，他分别打电话给中国银行经理卞白眉、大中银行经理常铸久、地方士绅雍剑秋，商讨为难民筹募粮款事宜。他们全都答应全力支援。常铸久约刘髯公到法租界具体面议。刘髯公情急之下一时大意，当他乘坐汽车向法租界进发，途经万国桥（今解放桥）时，被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拦劫，然后把他押

送到宪兵队。

刘髯公一身正气，面对日本宪兵无理刑讯破口大骂。日本宪兵露出狰狞面目，挥舞木棒、皮鞭劈头盖脸地朝刘髯公打去，他的左腿胫骨当即被打断。一连几天，日本宪兵按照事先罗织的罪名，逼迫刘髯公承认。刘髯公据理辩解，日寇不容分说，对他施以皮鞭抽、棍子打、轧杠子、上电刑等种种非刑折磨，甚至把已经断了腿的他投入水牢浸泡。多次堂讯酷刑用尽，也没有审出任何结果。于是，日寇恶魔又变换一副嘴脸，他们假惺惺地劝导刘髯公与日本人亲善，与日本人合作。刘髯公面对日本强盗唱起了京戏，他把《击鼓骂曹》里的唱腔，改成他编的新词，狂歌痛骂。日本宪兵以为他被折磨成了疯癫，遂不再过堂，把他关进临时的牢房里。据当年曾与刘髯公关押在同一囚室的难友卞慧新回忆，那天他在囚室里见到刘髯公时，刘蜷曲着身躯，侧卧于榻榻米上，裤腿上的血污粘附在伤腿上，稍动一下就会牵动皮肉，痛苦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但看他的眼睛闪着充满仇恨和坚定的目光。卞慧新还谈到：“犹记羁中刘君叮嘱要写《华北沦陷之惨痛》，记述日军侵略暴行，以教育后人。”

刘髯公被日本宪兵队关押的消息传出后，天津各大清真寺的阿訇到宪兵队联名具保，要求放刘回家治疗。日本宪兵队以《新天津报》附逆出版为条件，要挟刘髯公的家属。刘的家属救人心切，只好答应了日寇的无理要求。1937年10月26日，刘髯公被释放出来。其实，被酷刑伤及内脏的他，呼吸困难，早已不能进食。被人抬回家时已经奄奄一息。他躺在病榻上，再三叮嘱家人们，决不能屈服日本人，一定不要按照日本人的条件恢复出报。接着又哼唱那句唱词：“我纵然为国家尽忠死……”。

刘髯公回家后，伤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几个月后便撒手人寰，时年只有45岁。1949年天津解放后，军管会曾经派人到刘髯公的家里慰问，并将他的夫人李淑贤请到广播电台，向听众讲述日本侵略者残害刘髯公的罪行。如今，人们再次回忆起这位具有强烈爱国之志和民族精神的老报人，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尽个人所能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最终献出了宝贵生命。他高尚的情操将成为一代一代的后来人永远学习的榜样。

民俗学家 许钰

许钰（1925-1998），1925年6月出生于天津武清，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故事学会副主席、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卷》副主编、“第一届钟敬文民俗学奖”三位获奖人之一。著有《口承故事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鲁班传说的产生和发展》等论文。许先生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的学生，一生专攻中国故事学研究。1956年以来发表民间文学论文多篇，编有《鲁班的传说》等。

许钰老师的《口承故事论》由“体裁论”、“流传演变论”、“讲述论”、“采录论”和“研究史

论”五部分组成，构成了中国故事学最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一部论文集，书中篇篇论文均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中国故事学上的基本问题在这里几乎都有精辟的阐述，堪称中国故事学的典范之作，对中国故事学的学习和研究都有指导意义。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编纂出版，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间口头故事文字化书面化的运动。这种民间故事资源共享的大好局面着实令民间文学工作者们狂喜不已。可以说现在已进入了研究民间故事条件最好的时期，难以胜数的民间故事作品足以满足研究者们各方面的需求。正如当年许钰老师所言“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它是大规模的口承故事从讲述到书面的系统工程。这项工作包括普查、讲述、记录(记录故事本文和故事有关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背景以及讲述现场情况)，还整理、编选、编写讲述家材料、制图表等。它在口承故事学中属于采录论范围，但它在工作中所涉及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处理，却与故事学各部分理论相关，工作中反映出来的故事分布、流传演变情况，更是故事学研究最为关心的。”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民俗学家万建中在《中国故事学二十年学术评述》中说，中国现代民俗学家中，大概许钰老师最专注于民间故事的研究。他在故事学理论方面的建树也最为丰厚。《口头叙事文学的流传和演变》(1994)一文论述了民间故事流变的五种形式：(1)主人公性格基本定型；(2)故事主题或主人公性格在历史传承中发生重大转变；(3)故事的中心母题不变，在传承中各种成分不断变化；(4)在传承中不断吸收其他故事的情节和母题；(5)故事流传后，在原来基础上又增续新的内容，使故事情节进一步发展。文章运用了世界故事流传学派和芬兰学派的观点，又突显中国故事的民族文化特色、书面文献流通影响等特点，代表了民间故事一般特征研究的水平。

钟敬文先生于2002年1月因病辞世。就在钟老去世的前一天，经他口授，指定了“第一届钟敬文民俗学奖”的三位获奖人，其中一位就是钟先生50年代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许钰先生。许钰教授一生专攻中国故事学研究，不幸病故于1998年冬天。钟老将这个奖项颁发给已经离世数年的弟子，其用意在于提倡许钰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精审的写作态度。在《口承故事论·序》中，钟老对这位故事研究家的默默笔耕有如下的评说：“当前，我们的口承故事学，不但在研究观点上是多元的，在研究成果上也多姿多彩，有的还成为灿烂的奇花。许钰教授，性格沉静，是个笃学之士。他研攻口承故事学，精神既贯注，用力尤勤勉。他不苟且执笔，或随便发表意见。一篇论文的出世，往往酝酿多年，虽然十年来发表的著作不算多，却是认真、严谨之作。在学术上，他不是哗众取宠的人，因此，知道他的人并不多。但是，有眼力的同行或认真向学的同学，大都承认他是个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老师。他现在因我和同仁们的敦劝，把自己过去多年所写的学术文章，编辑成这个集子问世。这个集子的出现，既使许钰教授实现了一个多年怀抱着的心愿，也是我们民俗学界一个难得的佳音，是使许多同行学者得到一份精神滋补品的好机会。”

在成都保卫战中英勇抗击日寇的武清人

近日，拜读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的名著《流年碎影》，在“乡里旧人”一节中提及河北屯石薄庄村原有一名在国民党军队里任师长的人，名叫石杰。便造访原籍石薄庄村的石文璞先生，石先生证实石杰确有其人，其子石大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曾驾机与日寇多次作战，战功卓著。在此之前，也有人传说，在日寇侵华时，一名武清籍驾驶员驾机钻到敌舰烟囱里炸毁敌舰。我小时候也曾听老人讲过这个故事，后经查阅有关资料，具体事实是这样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国民党在南京的官邸受到很大威胁。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战时的首都（陪都）。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六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

193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又空袭成都，横冲直撞。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慌失措队形大乱，四处逃窜。这架小飞机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空袭危险，翘首天际绷紧心弦，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由于敌众我寡，小飞机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殉难的驾驶员名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屡建奇功，为中国军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下了汗马功劳。其父石杰将军，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学马兵科，据说他骑术很高，不论如何暴烈的马，无鞍，只要他身贴马背，马就不能把他扔下来。他曾与蒋介石、张群同学。回国后，曾驻扎塞外，为察哈尔驻军某师长，军长为郑泽声，与孙殿英（东陵大盗主谋）、荣三点为同寅。石大陆殉难时，其父石杰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总教官。石大陆殉国后，石杰将军没有流下一滴泪，他抱着烧焦的儿子的遗体，拍下了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据张中行先生的《流年碎影》所记，石杰解放后仍健在，流落在四川，在街头摆摊，以卖各种名烟为生。

书法界才女 石瑞芳

在西安书画界，人们提起石瑞芳的名字，总会把她与石宪章先生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父亲名气太大，很少有人直呼其名，于是便有了“石宪章的女儿石瑞芳”这样的称谓，但出身名门的石瑞芳，并没有因为其父之名而沾沾自得，出身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父亲，在她心中更多的是一份自豪。

石瑞芳祖籍天津武清大碱厂镇杨凤庄村，1960年生于古城西安。中国民主同盟会会员，陕西省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任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兼书法教育委员会主任，陕西省文史馆书画研究员、陕西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兼陕西省青联艺委会主任、陕西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国家二级美术师，现供职于陕西省艺术馆，专职书法家。

石瑞芳从小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耳濡目染，7岁就跟随父亲学习书法，几十年的书法生涯，如今让她成为西安为数不多的女书法家之一，看到跟随自己学习书法的小孩，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谆谆教导仿佛仍然萦绕在耳边。

石瑞芳从小跟随父亲练字，自己的风格难免受到父亲的影响，如今在她的作品中仍旧摆脱不了父亲的大气、洒脱。但石瑞芳说书法之道唯有变化才能历久弥新。

石瑞芳说，过了中年，自己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石瑞芳的书法以行书见长，同时兼工隶篆，要秀则秀，要刚则刚，正是她性情的写照。虽然有时还未能脱尽石老先生的笔痕墨迹，但于灵秀飘逸中则更显得别具一格。

石瑞芳现在是陕西省艺术馆的国家二级美术师，每天除了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会呆在家里研习着自己的书法之道。受她的影响，她的女儿也喜爱上了书法，但石瑞芳说教女儿练习书法只是为了调节女儿的业余生活，因为白纸黑字的枯燥需要的是一种毅力去延续，而石瑞芳在这种延续中也将自己的性情挥洒其中。

出身名门的石瑞芳走上书坛人们并不为奇，也许自己的努力才是她立足于书坛之根本。石瑞芳说父亲的大名并不能让她走的太远，唯有不断创新才能成就其书法之道。

石瑞芳早年曾应邀为岐山五丈原诸葛亮庙、佳县白云山、开封翰墨园、周至楼观台、汨罗江屈原碑林等名胜景点篆刻碑石和题写牌匾。她不仅能书，也偶作兰草，闲写诗词，欣然能诵。其论文《学书琐谈》、《论草书十二意》等十余篇及诗词40余首曾发表于全国各大专业报刊。编著有《陕西省书法考级教材》、《石宪章书法作品集》。出版有《石瑞芳书法集》、《石瑞芳诗词选》等。作品和事迹被收入《中国书法选集》、《中国人物年鉴》、《中国书法艺术大成》等40余种中国书法专辑中，并被中国美术馆、毛主席纪念堂等单位和日本、美国、新加坡及港台等国家和地区收藏。1992年与其他四位书画家联合在陕西省美术馆画廊举办了《黄土翰墨五人展》。1993年11月与父亲石宪章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了《石氏父女大型书法展》。1995年荣获国际书画大赛一等奖，在“大庆杯”书法比赛中获“十大才女”作品奖；1996年荣获“陕西省十杰青年书法家”称号；1998年荣获“全国第八届群星书画大赛”优胜奖；1999年入选中国99位女书法家精品展，被推选为世纪之交陕西文艺界“十大新闻人物”；2000年荣获中国首届文化艺术书法大赛二等奖；2001年获全国“祖国颂书画大赛”金奖；2002年荣获全国优秀才艺奖；作品入选“全国第三届妇女书法篆刻展”；2003年其作品参加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书画展览并被收藏，入选韩国国际书法名人大展；同年，获“西北人才杯”书画大赛一等奖；2004年获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全国名人名家书画大展金奖；2006年作品入选“全国第四届妇女书法篆刻展”等。其作品和介绍，被收入《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日友好书法联展作品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数十家大型书法专辑中，并被众多国际国内大型博物馆和友人收藏。其学术经历和事迹被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全国政协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书

画报》、《书法报》、《书法导报》、《书法》、《收藏》、《中华热土》等全国近百家报刊、电台、电视台进行专辑报道。2000—2003 年期间曾应邀三次赴中央电视台接受专访并现场进行书法表演，受到各界人士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应用化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郑帼

郑帼，女，1957 年 7 月生，汉族，祖籍天津武清。1974 年 1 月于梅厂中学高中毕业后，在武清知青点砖厂大队插队；1977 年考入天津纺织工学院化学纤维专业，1982 年 2 月毕业，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82 年 3 月至 1984 年 12 月在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化纤研究所工作；1985 年 1 月至今在原天津纺织工学院和天津工业大学工作；1994 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99 年晋升为研究员，2006 年 3 月获得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同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2002 年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5 年被聘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助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工业大学精细化工研究所所长、天津工业大学应用化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郑帼主要从事纺织纤维界面处理技术领域的研究，该领域是以纤维界面改性为基础，与材料学、有机化学、应用化学、纺织工程学、环境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与融合的新兴边缘学科，它是通过化学改性或物理改性的方法，改变高聚物原本的结构或原有的性能，达到材料性能的最大化和应用的宽泛化，并赋予其一定的功能性，从而提升材料本身的附加值。通过该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使传统纺织产业升级换代，而且还能对新技术、新材料、高性能纺织品、功能性纺织品的研究与开发起到推动作用，对振兴我国纺织行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研究与努力，郑帼在该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完成了国家级科研项目 3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15 项，；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国家级新产品 1 项、天津市认定高新技术产品 2 项、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重点推广新产品 2 项。所承担的“新型大容量涤纶短纤维油剂”等项目先后于 1999 至 2006 连续八年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6 项、三等奖 4 项，“一种腈纶聚合物造粒剂的制造方法及应用”项目于 2005 年获天津市科技发明二等奖，“丙纶拒水拒油纤维油剂”项目于 2006 年获得天津市技术创新三等奖，“可分散涤纶短纤维助剂”、“新型大容量涤纶短纤维油剂”项目于 2006、2007 年获得天津市产学研联合突出贡献奖。先后在《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纺织学报》、《合成纤维工业》等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先后指导了博、硕士研究生 20 余名。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纤维界面处理技术、纺织应用化学品、纺织助剂、化纤油剂、高分子材料加工技术、产业用纺织品等。

郑帼现兼任天津市纺织纤维界面处理技术工程中心主任、天津市纺织应用化学品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全国工业表面活性剂协会副理事长、全国特种表面活性剂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农业技术推广专家 张福庆

张福庆，1965年6月出生于大黄堡乡四马营村，现任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酒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九三学社直属支社组织委员，中国园艺学会葡萄与葡萄酒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会员。

1982年7月毕业于武清县杨村第一中学。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9月—1989年7月北京农林科学院，研究生。1989年8月—1999年4月在天津市农业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工作，任病毒室副主任，团支部书记。从事葡萄栽培、病毒学、组织培养、实验分析、品种选育和技术推广工作。1999年4月—2006年8月在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酒有限公司原料基地部工作，从事葡萄栽培、品种选育、病虫害综合防治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2006年8月至今在中法合营王朝葡萄酒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工作，从事酿酒葡萄栽培、病虫害综合防治、葡萄酒酿造、葡萄酒文化宣传、公司科研管理工作。

张福庆自1985年开始从事葡萄栽培技术的研究，先后师从于我国著名的葡萄栽培专家罗国光教授、欧阳寿如教授和贺普超教授。

从事葡萄事业25年，始终工作在科研和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第一线，主持和参加科技攻关项目20余项，已完成15项，项目涉及酿酒葡萄种植、葡萄酒工艺、葡萄酒设备等方面。

荣获国家和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9次，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其中主持并完成天津市科技攻关、天津市青年基金、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天津农科院院长基金等5项课题研究，成果经专家鉴定均居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

1988年至今，发表论文40余篇，葡萄根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被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葡萄学》引用。

张福庆研究员在国内酿酒葡萄栽培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葡萄病毒的脱除与苗木快繁、国际酿酒葡萄名种梅鹿辄（Merlot）栽培疑难问题的解决、玫瑰香（Muscat Hamburg）葡萄品种特性与天津汉沽产地特征分析、酿酒葡萄栽培产地研究分析、葡萄叶幕结构和生物效应、葡萄果实生长发育特性、酿酒葡萄采收期、葡萄产量与质量关系、葡萄根系、酿酒葡萄施肥、蛇龙珠葡萄品种的提纯复壮与栽培技术、酿酒葡萄修剪、葡萄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其中关于梅鹿辄（Merlot）品种的研究为中国栽培该品种提供了指导，相关文章被中国农学会评为优秀论文。

航空航天专家 宋黎定

宋黎定，男，研究员，1963年10月出生于山西汾阳，祖籍天津武清，198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1984年7月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原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工程系信息处理专业。毕业后，在山东航天电子技术研究所工作。历任所康达公司副经理、民品总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任副所长兼民品公司总经理，1996年兼任机电设备厂厂长，负责军民品科研生产，2000年9月任所代理所长，2001年8月任所长，2004年6月兼任所党委副书记。2007年被某部聘为卫星系统技术专业组特聘专家

宋黎定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13所所长，烟台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山东省航空航天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省直青年联合会委员，“感动中国暨‘张裕杯’感动烟台2003年度人物”。

宋黎定从1984年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我国航天科研第一线从事专业研究工作。20多年来，他矢志不渝，兢兢业业，默默地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他先后参与了我国返回式卫星、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小卫星系列、导航卫星、资源卫星、海洋卫星和我国战略导弹、战术导弹武器等相关设备的研制工作，特别是我国神舟号系列飞船的研制工作，每一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无论是在工作条件艰苦的时候，还是在经济条件好转的时候，他都以一个科研工作者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祖国航天事业的深切热爱，栉风沐雨，顽强拼搏。在宋黎定的带领下，513所紧紧抓住创新这根主线，形成了不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科研成果先后获得两项国家科学进步奖特等奖，3项一等奖，3项全国科学大会奖及76项省部级奖励，在航天领域展翅高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为了普及航天知识，513所自己投资建成了一所航天科技馆，是山东省唯一一家以普及航天科普知识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和科普教育基地，现已接纳了全国30000多名青少年和成人参观者。他们要让航天知识家喻户晓，更想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航天科技人才。

1995年，宋黎定被提拔为副所长，担任民品公司的领导工作。他对依托航天科技为民用产品服务方面进行了探索，为513所开辟了民品发展的一条崭新的道路。他四处奔波，把他领导研制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消防报警系统、智能建筑弱电系统等产品投入市场，打开销路，为所增加收入500多万元。他干民品的时候，五院中投入产出比最好的是513所。现在513所每年收入可达1000万元左右，他用韧劲使513所上了一个大台阶。

2003年曾任烟台市十四届人大代表、教科文卫委委员，烟台市十届政协委员，2007年任烟台市十五届人大常委。2004年任山东航空航天学会副理事长，2007年任山东省国防科技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霹雳凌空 顽敌丧胆

——记空军战斗英雄 杨治基

1954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陆海空各一部，对台湾国民党军据守的浙江省东部六岛进行了一场联合登陆作战。原籍东蒲洼街大南宫村杨治基作为空军第20师第60轰炸机团射击主任，参加了这次战役。

中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残余部队退据东南沿海部分岛屿。在浙江沿海，就有一江山岛、上、下大陈岛等六个岛屿。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这些岛屿作为护卫台湾的屏障，反攻大陆的跳板，袭扰大陆的基地。

华东军区鉴于国民党在浙江沿海岛屿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是大陈岛，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和前哨据点，如攻占一江山岛，必能击中要害，沉重打击和震撼大陈岛守军，因此决定先攻占一江山岛，再取大陈岛，然后相机攻取其他岛屿。

1954年11月1日，杨治基和战友们接到命令后，迅速进入飞机座舱。此时他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实战锻炼。这位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原抗大）的高材生，曾经参加了开国大典，并驾驶飞机，接受检阅。今天正是自己经受实战考验的时候。机场上经过了片刻的宁静后，起飞信号升上天空，“开车”，一声令下，几十台发动机同时怒吼，真是震天撼地，威武壮观。几分钟后，全团集合完毕，杨治基和战友们驾驶着战机，编着整齐的队形飞向大陈岛。

当我军飞机接近大陈岛上空时，立即发现敌人各锚地的舰只象无头苍蝇在锚地乱窜，拖着水花四处奔逃，并且非常分散。按照战前分工，杨治基和战友们各自奔向各自的轰炸锚地。在一号锚地，一艘“太和”号正开动马力慌慌张张地往外逃跑，企图逃往外海。“就打它！打‘太和’号！”耳机里传来团长的声音。与此同时，敌人的高射炮也开始向我们射击。原来敌人已经发现我军战机向他们瞄准，便拼命的忽左忽右作着机动避弹动作，杨治基驾驶的战机不得不跟踪追捕，致使飞机也不能稳定。“投弹！”随着领航主任一声呐喊，一串串炸弹投向敌舰。炸弹在敌舰周围爆炸，升起了一束束高大的水柱。杨治基根据目测，炸弹的弹着点距敌舰最近也有20米，无一命中，最多也就是弹片杀伤甲板上的一些人员和设备。杨治基和战友们在预定空域里编好队安全返航。在返航中，电台里异常的安静，预示着这次出征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返航着陆后，机场上一片欢腾。人们敲锣打鼓，举着“欢迎英雄凯旋归来”的横幅标语，涌向停机坪。华东军区参谋长、浙东前线司令员张爱萍和军区空军聂凤智司令员同军区文工团的同志们一起向飞行员们献花。出乎意料的是，杨治基和战友们谁也不愿意接受这荣誉，他们一下飞机就钻进了接他们的吉普车。

十几天以后，杨治基和战友们接到了轰炸大陈岛军火库的任务。军火库位于大陈岛西北，有一条沿海的专用沙石路直通军火库，目标既隐蔽又难于对付。杨治基和战友们采用沿公路进入的办法，然后集中投弹。当时炸弹仍是一个不可控制的自由落体，它既不能拐弯，也不能钻洞，并且规定，既要打击目标，还不能使炸弹越过一道小山梁，因为翻过山梁就是一个

非常集中的居民区。这次由于采取了集中投弹，破坏性极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55年1月10日下午，杨治基和战友们接到上级命令，当天正值海上刮七八级大风，蒋军舰只被迫躲进大陈岛锚地，正是打击的好时机。飞机以低空大速度向前飞驰，电台内也是静悄悄的，生怕吓跑敌人。

大陈岛、敌舰艇就在眼前了，当敌人发现我们时已经太迟了，杨治基和战友们直扑一号锚地。锚地中有两只敌舰。“打哪个？”“打大的‘中权’号！”“好”。杨治基打开炸弹舱，开始瞄准。“注意沉着，要冷静。”“是，沉着，冷静。”“向左，再向左点。”“好，保持，保持，投弹！”一颗颗炸弹直指“中权”号舰。杨治基根据弹道射向，预感到有命中的可能。当他看到第一颗与第二颗炸弹爆炸时所激起的水柱距离时，立即断定第三颗炸弹肯定命中无疑。杨治基的心情还是在这0.25秒的等待时间里紧张到了极点。“命中了，命中了！”第三颗炸弹不偏不倚，正好命中在“中权”号的甲板上，当即发出了一簇火光，瞬间，一股浓浓的黑烟直冲天空。团长立即问道：“杨治基，是命中了吗？”因为看弹着点杨治基的位置是最佳位置。杨治基回答：“没错。千真万确！看到‘中权’号爆炸啦！”话音未落，一股更浓的黑烟又从“中权”号上升起

这次战斗，杨治基和战友们出色完成了任务，不但炸毁了敌“中权”号舰，还重创了敌“太和”号舰，在晚上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前指首长表扬杨治基和战友们说：“你们为人民立了一个大功，同时也在我们空军建军史上首创炸毁敌舰的纪录。”

1955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一江山岛登陆作战。3个轰炸机大队和2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掩护下飞临一江山岛上空，对敌军地面设施实施地毯式轰炸，杨治基所在的一中队，目标正好是一江山岛东端203高地上的敌指挥所。上午八点整，第一颗炸弹准确地击中了目标，随着一声巨响，拉开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的帷幕。当杨治基和战友们驾机掠过一江山岛后，一江山已经全部被硝烟所吞没。

一江山岛解放后，驻守在大陈岛上的敌人不断向一江山打冷炮。1月19日上午，杨治基和战友们接到命令，用两个大队的机群轰炸大陈岛上所有的炮兵阵地。当天天气突然变化，海上云层不过1000米，飞机被迫在600米高度飞行，机群只能拉大间隔，实施低空轰炸。敌军想不到在如此复杂气象条件下，30多架飞机低空突然闯入，瞬间敌人如惊弓之鸟，乱作一团。实施轰炸后，杨治基和战友们顺利返航。

一江山岛解放后，台湾当局被迫于2月5日决定将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为中心的台州列岛。至2月25日，在美国海空军掩护下，国民党军全部撤离，至此浙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1955年2月8日，浙江省在省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广播祝捷大会”，杨治基荣幸地以陆海空三军功臣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

1958年杨治基复员回到家乡。在服役期间，他荣获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现在老人在家颐养天年，谈起当年的一江山岛战役，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侃侃而谈。

一代书法名家 王济

王济，字石涛、慈航，1926年9月生于天津武清王庆坨。自幼受其父辈影响，酷爱书法艺术。在长春，陕西工作期间，利用闲余时间研习书法艺术。他在继承传统书法艺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创作的小楷中堂在陕西影响较大，陕西的同道称他是“现代王羲之”。其书法作品被陕西省文史研究馆收藏，并曾多次参加国内外大展，并有获奖。

虽然远离家乡，但是他无时不惦念着家乡的父老，他曾多次写信询问家乡的变化，盼望有时间一定回家乡一看。由于身体原因，这个愿望没能实现。

他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宝鸡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

王济先生的书法，尤其是小楷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即便是被称为书坛泰斗的启功先生，对他的小楷作品也佩服不已。有一年全国神剑系统（即国防工业系统）在北京举办书法作品展，有位著名书法家看了王济先生的作品，立即要见他本人。当有人把王济领到这位书法家面前时，他立即后退三步，向他十几岁的王济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王济先生的书法艺术造诣高古，而更令人仰视的是老人高尚的人格魅力。有一年中国书协副主席刘炳森，邀王济先生及西安的书法家石宪章，在北京举办天津武清三书家作品展。计划在北京展出后，再回故里武清向父老乡亲汇报。他们都希望办成此事，这对提高王济先生的声望，进而提高宝鸡的知名度，不啻是一件大好事。可是王先生却受宠不惊，将这件事冷处理了。他对人们说，和中国书协副主席在一起办展览，有沾光、媚上之嫌，我一辈子都不求名分，何必多此一举，还是不办为好。记得在宝鸡市金台区文化馆给老人办了一个小型作品展，也都是学生们张罗的，老人并不热衷。王济先生崇尚淡泊，甘作隐士，原本就不愿做这类热闹一时的事情。后来，宝鸡书法界推荐他为书法家协会主席，被他婉言谢绝。

王济先生学养丰厚，文笔雅致，他为李子青先生撰写的墓志铭堪称书艺、文采合璧之妙。一次谈到学习古汉语，他说学什么古汉语，你只要能把《古文观止》上的文章读熟，古汉语就通了。在这之前人们就知道老人能背诵《古文观止》上的任何一篇文章，在以此为题材创作书法作品时，可以不翻检原文，随手写出。

王济先生不仅对经典作品、正史著述熟悉，就连野史民俗也知道很多。一次某君找他找到清姜集贸市场，就和老人边走边聊。忽遇一魔鬼身材的女子，穿着喇叭裤，裤角及地，裤边故意用刀划开，絮里索罗拖着。王先生说这种东西早在唐代就有了，叫斩（縗），是重孝在身的人穿的。我一听哑然失笑。小女子如果知道她穿的是孝服，她还穿吗？可是，打死她，她也不知道呀！

1997年10月王济先生病逝于陕西省宝鸡市。

农业科技专家 王学利

王学利，1955年8月出生，天津市武清区王痢庄人，中共党员，1982年1月毕业于天津农学院农学系，现任天津农学院园艺系副书记、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科技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专家，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库专家，天津市农业技术顾问委员会专家。主要从事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获天津市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天津市第二届十大青年改革科技先锋科技新星、天津农学院教学楷模。

代表性的成果：主持“冬季日光温室生产克服障碍性天气关键技术研究”项目，2004年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克服日光温室冬季生产障碍关键技术推广”项目，2008年获天津市级成果；主持“昆虫病原线虫防治韭蛆的研究”项目，1997年获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参加“天津市新型日光温室及机械化综合配套技术推广”项目，1999年获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

先后发表论文24篇，主要有：“五种杀虫剂对紫薇长斑蚜的毒杀效果研究”；“温室白粉虱的发生及防治”；“克服日光温室冬季蔬菜生产障碍的关键技术”等。

目前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有科技部：“设施蔬菜安全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开发”；天津市科委：宅基地复垦高标准设施栽培技术与示范；天津市科委：构建天津特色农业比较优势的对策研究；天津市农委：“天津市杨树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开发”。

在从事设施农业生产、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方面的研究工作中，率先使用昆虫病原线虫防治温室、拱棚与露地韭蛆获得成功，总结出韭菜迟眼蕈蚊在天津地区的发生规律及防治方法。首次发现并报导了韭菜蛾在天津的发生情况，提出了防治方法。

1999年主持天津市科委市级重点农业攻关项目“冬季日光温室生产克服障碍性天气关键技术研究”：1.该课题通过对温室内外气象指标的系统观测，首次用数学分析理论研究发现了天津市冬季日光温室内光照强度、日照时数、地温、气温及空气湿度变化规律，制定出了冬季日光温室生产克服障碍性天气综合技术操作规范；2.针对冬季日光温室生产常见的障碍性天气，引进、筛选补光设备，首次研究出冬季日光温室内补光技术措施，克服阴天寡照障碍，有效地改善了温室内环境，为蔬菜的增产增效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3.改良温室结构，研究设计出经济、实用、保温性能强的“薄壁管全过渡型”节能日光温室结构，利用计算机语言编制出温室结构数据模型，使温室达到理想的保温效果；4.在综合分析冬季日光温室内温度、湿度和光照变化规律的基础上，研究出五种不同茬口安排的高效种植模式。

主讲课程情况有研究生课程：果树检疫病虫害；本科生课程：园艺植物昆虫学，农业昆虫学。

武清——梨园沃土

津沽武清，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从武清走出了不少享誉梨园界的名家，他们根在武清，却在艺坛闻名遐迩，成为武清乃至天津的“文化名片”。

河北梆子名角崔灵芝，祖籍武清太子务。1887年崔灵芝17岁那年，随师在上海大戏院唱的第一场戏——《苏三起解》红起来的。当时，《上海时报》以《一颗璀璨之星——崔灵芝》为题进行了报道，接着又唱了几场《秦香莲》，名传全国。崔灵芝凭借天生的男性女相和一副好嗓子，以及深厚的艺术功底，一时间被捧上了天。在上海走红后，崔即随师到了北京，经常被请去给名流和官家唱堂会。不久，便被传旨进京为慈禧唱戏，在宫里一唱就是几年。由于扮相俊美，嗓音浑阔，深得慈禧赏识，几年中攒下了不少积蓄，故此成为大户人家。后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常称崔灵芝为师伯，梅兰芳也得到了崔灵芝保留下来的很多剧本，对梅兰芳成长起到了一定作用，也算是对中国戏剧的贡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戏剧家协会派员来武清搜集整理崔灵芝的艺术生涯材料，高度评价崔灵芝为“一代河北梆子名角，是中国戏剧史上颇具影响的艺术家”。

评剧“百灵鸟”张柏龄（约1885——约1940）。工旦角，西、东两路均唱。武清庞庄子人。幼年投西路戏班习艺，与金叶子、刘宝山交往甚密。后入南孙班改唱东路。1912年（民国元年）随孙凤刚（三架子）、孙凤龄（开花炮）、朱景贤（朱小六）从营口来到天津献艺。张柏龄工旦角，经常与金叶子合演西路蹦蹦戏。他嗓音宏亮，表演入戏，人送绰号“百灵鸟”。

张柏龄会拉弦，人极老练，自从评戏畅兴以来，他得到此中的秘诀。约1920年前后，在家（南市天安里后身）和同庆后茶园以授徒为业。

张柏龄之兄张柏顺（绰号“化迷鸟”），长期与评戏第一代女伶花莲舫同台演戏，工小生，曾与花莲舫在百代公司合作灌制唱片《马寡妇开店》；《杜十娘》，在天津较有影响。叔伯弟张柏仲，工小生；叔伯弟张柏朋，在戏班演些“零碎”活。天津评戏界戏称他们为“张家四虎”。

1922年前后，由张柏龄主持，与张柏朋、张柏仲三人在天津法租界天祥商场四楼的“乾坤楼”（后搬到劝业场六楼，天乐舞台）组建“张家班”。“张家班”是续前“孙家班”（南孙班）之后，赵月楼的“娃娃班”最大，又一个以培养徒弟为主，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评戏班。该班张柏仲挂头牌小生，每天以徒弟为主坚持演出和教学，培养出一大批较有名气和很有成就的演员，其中旦角主演有李宝珠、李宝玉、李宝翠（反串小生），开蒙演员有钱玉舫（艺名“小摩登”）、张月亭、张月娥、花迎春、林红霞、陈凤娥和后挑“张家班”的王金香，带艺学徒的杜文彬（艺名杜小楼）；张柏仲收徒张品三、汪德华、汪月娥等；尤其是刘翠霞（1911年生于武清敖嘴村）。6岁随母逃荒来津，13岁拜何丑子为师到大连学唱辽宁大鼓。因教法不良，刘贪玩心盛，不甚造就。14岁回津。家住天安里后身，与张柏龄对门。张当时所收门徒四、五十人，每日拉弦教戏，刘深受熏陶，毅然拜张柏龄为师改学评戏。刘翠霞15岁

登台，16岁唱帽戏，18岁唱红津门，走红于大连、济南等地。此间，张柏龄因某一种关系与刘翠霞脱离，刘又投赵月楼为半师半友关系，进行深造。可以说，先有张柏龄授艺辅佐，后有刘翠霞唱红成名。故此，“张家班”在天津评戏界很有影响。1929年8月天津最大的报纸——《益世报》刊登：法租界劝业场六楼“天乐评戏园”的字样。

张柏龄病逝于天津南市。

张柏龄之女张艳秋（工旦）；养女张玉秋（1924-2007。天津南市戏装商店工作）；女婿李文元（1913-1977。著名丑角，曾傍筱俊亭、花月仙等同台献艺，病逝天津）；外孙李永庆（1941年生，河北省交河县评剧团，工小生）；外孙李永强在津从事戏衣销售工作。

评剧第一位女旦、名伶花莲舫，祖籍武清王庆坨，生于1893年。花莲舫少年时代曾在天津落子馆学唱河北梆子，后改学梅花大鼓，十多岁时曾到上海等地演出。回津后，在“孙家班”随孙凤鸣（艺名东发红）学唱评剧。她嗓音宽厚，唱腔丰富，曲调朴实，气息饱满，吐字有力，在唱念上保持了冀东语调，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加之她有唱梆子和大鼓的底子，所以入戏很快，不久便与李金顺不分伯仲。后来，花莲舫与李金顺等人组成“金花玉班”，由后来成名的评剧女艺人刘翠霞、白玉霜配戏。她先后在“新中央”（即滨江剧场）、“同庆”（即后来的国光影院）等戏园（院）演出，其中在“同庆”一地便演出长达11年，她的艺术功力可见一斑。花莲舫演出的剧目主要有《打狗劝夫》、《杜十娘》、《占花魁》、《王少安赶船》、《桃花庵》等，其中最擅长的是《马寡妇开店》。解放后与著名评剧艺术家新风霞同在中国评剧院任教。

“奉天落子”巨擘、评剧“四大名旦”、李派创始人李金顺，祖籍武清王庆坨。李金顺幼年曾习京韵大鼓、京剧、小调，十六岁拜孙凤鸣为师学唱落子。转艺多师，融汇众长，形成“李派”演唱艺术，是把奉天落子改进提高为评剧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蜚声东三省。她热心评剧革新，在原有四大件乐器伴奏同时，增加了笙、管、箫、琵琶、三弦、二胡、四弦等，以烘托音乐气氛。李金顺是评剧史上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家，她创立的李派对后辈影响甚大，刘翠霞、白玉霜、芙蓉花、花云舫、筱麻红、喜彩春、鲜灵霞、喜彩莲等均受其教益和影响。李金顺的唱腔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说唱艺术的韵味，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腔美韵浓、节奏多变、刚劲委婉、说唱结合的艺术风格。李金顺一生为评剧女腔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作用，是评剧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富于改革的评剧坤伶李银顺(1914—1948)，评剧女演员，工旦行。幼年学唱单弦和乐亭大鼓。8岁从赵兰亭学京剧老旦，10岁登台演出。13岁拜张存凯学评戏，并向珍珠花、杨柳青、刘兆祥等求教。16岁任明玉剧社主演，与孙凤岗、吴福臣、李义廷等同台演出。1938年入京、评、梆合班的聚祥社久演于津，偶亦至奉天、北京等地。代表剧目有《铜碗丁》《云罗山》《媳孝孙贤》《蝴蝶杯》等。30年代中期，歌林、宝利、丽歌、昆仑公司为其录制了唱片。

李银顺嗓音纤细柔润，纯净甘美。艺宗李金顺并有所革新。她将李派唱腔化刚为柔。讲究气、字、劲、味、追求音色美，以悠扬舒展的唱腔取胜。唱腔旋律常用跳进。行腔归韵中，其自然颤音委婉动听，形成一种清新流畅的艺术风格。她演唱的迷子腔中“杀了人的天爷呀”的“天”字长腔独具特色，后被鲜灵霞等

评剧名伶李宝顺，1923年出生，天津武清王庆坨人，工旦行。幼年曾学河北梆子，12岁从李金顺改学评戏。15岁拜张存凯为师，又受益于珍珠花、杨柳青。曾与李金顺、李银顺、花玉兰、新翠霞同台演出。30岁独立挑班，曾赴北京、张家口、济南等地巡演。在东北与京剧演员董盛岩合作，串演京剧《苏武牧羊》等戏。50年代初在津入捷化剧社。1956年在天津戏校任教，为培养评剧接班人贡献力量，崔连润、兰佩珍、马淑华等都是她教出来的学生。1960年在天津评剧院少年训练队任教。代表剧目有《对金瓶》、《劝爱宝》、《珍珠衫》等。40年代丽歌公司将其《花为媒》唱段录制了唱片。1966年退休。

评剧早期“四大名旦”、“评剧皇后”、刘派创始人刘翠霞，祖籍武清敖嘴。十岁时学唱大鼓，十一岁时，进入天津的李金顺落子班，从此走上了评剧艺术之路，十七岁时与李华山一起成立“山霞社”，曾常年在福仙茶园、北洋戏院、大舞台、天宝大戏院等场所演出，并应邀赴北京、济南、沈阳等地演出，名震华北，特别是京津地区。刘翠霞是继李金顺之后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艺术家，她在继承李金顺艺术的基础上，创造了高亢宽广，铿锵淳朴的刘派艺术。刘翠霞是评剧旦角里的女高音，她的丹田气足，唱腔调门高，音程跨度大，曲调紧凑连贯，节奏急切有力，她的高音挺拔悠扬，激越奔放，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她在舞台实践中不断改革不断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演唱风格，代表剧目有《雪玉冰霜》、《劝爱宝》、《奇冤巧报》、《一元钱》、《玉镯记》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高亭、百代、蓓开、昆仑、宝利等公司分别为其录制了唱片。新翠霞(小翠霞)等很好地继承了她的艺术，成为天津评剧院的著名演员。

评剧白派传人李兰舫，祖籍武清黄花店。幼时随父到天津戏园子以卖小吃为生，因此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十一岁拜雷喜福学京剧老生。十二岁拜赵月楼改学评戏，同年入“山霞社”。十三岁入“白玉霜班”，又拜牛怀为师。此间在白玉霜、刘子熙指导下技艺日渐成熟。1937年在津独挑育德社演出，后又与爱莲君合作。1931年到1957年间多次巡演于东北的沈阳、锦州、营口、大连、哈尔滨及北京等地，颇受欢迎。1949年后任天津市勇风剧社主演。1957年调沧县评剧团(时隶属天津市)。代表剧目有《砸粥缸》《母子两代英雄》《骨肉情深》、《潘金莲》、《珍珠衫》、《桃花庵》、《玉堂春》、《孔雀东南飞》、《秦香莲》等。李兰舫嗓音宽厚宏亮、圆润动听。中、高音饱满坚实，低音浑厚深沉，白派韵味浓郁。在现代戏里，她于白派唱腔委婉华丽的基础上，追求苍劲高亢的风格。她是白玉霜之后最具代表性的白派演员。此外，李兰舫戏路极宽，除旦行外，生、净、丑行均擅。常在一出戏中兼演两种行当的角色。1954年，参加天津市第一届戏剧观摩汇演，主演《孔雀东南飞》荣获二等奖。李兰舫曾向中国评剧院的刘萍，天津评剧院的夏霞传授白派技艺。

京剧名伶赵筱楼，祖籍天津武清大三庄，出生于京剧演员家庭。八岁时，由父亲作主，拜江南一位武生演员为师。赵筱楼跟随师父，各地流动演戏，风里雨里，吃尽辛苦。二十岁以后，离开师父，从南方返回天津。经过几年搭班演戏，同妻子又回到生活和演戏都熟悉的江南。

赵筱楼在长江上下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和杭嘉湖一带，常年跑码头演戏。东来西往，流动不定的岁月，度过几年，到了30年代中期，在武汉的天声舞台挂“头牌”，挑大梁，作为主要演员，传统剧目和新编连台本戏中担任主要角色，从此站住脚跟，得以长期稳定地在此演出。

赵筱楼本工武生，长靠、短打均为擅长。他所演的武松、黄天霸等人物，勇猛矫健，气势夺人。他兼演小生和老生，文戏、武戏俱有精彩表演。他用大嗓演小生，刻画人物性格，认真、细致，表现人物感情，饱满、深刻，很受观众欢迎。在武汉与著名旦角毛剑秋经常合作演出，毛剑秋是当时大红大紫的女旦，赵筱楼与她同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赵筱楼在演出众多传统剧目之外，还演出戏剧家欧阳予倩编写的《桃花扇》和《梁红玉》等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优秀新编历史剧。他还主演了歌颂抗日英雄宋哲元将军领导大刀队英勇杀敌的新戏《宋哲元》，演出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和奋起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于1937年12月31日在武汉成立，赵筱楼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担任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平剧（京剧）组组长。

赵筱楼一片爱国之心，在协会里做了很多工作。他以协会京剧组组长的身份，积极组织和推动武汉京剧界，参加武汉戏剧界抗敌协会发起的“劳军公演”活动，演出多场京剧，他自己也参加演出多次。每场演出所得，全部捐献武汉后援会。

赵筱楼耿直豪爽，乐于助人。抗日战争以前，在武汉演戏，同时担任后台经理。作为沟通戏院一方同演员之间的联系人，他经常为演员同行说话，出面向戏院负责人要求不要辞退某个演员，挣钱养家很不容易，一旦被辞，就无法生活。在赵筱楼的说情下，年轻的、年老的保住了饭碗。

赵筱楼遇到不平的事，常常仗义执言，为同行争个公道。替别人讲理，争得面红耳赤，气忿填胸，因此在同行中颇有威望。

赵筱楼演戏从来是认真的，只要一上台，就使出全副的精气神，一招一式，眼到手到，绝不含糊。演武生、小生，刻画人物，感情充沛。他的女儿赵燕侠，从小跟着父亲赵筱楼练功学戏。赵筱楼的治艺态度本是严格，教戏也是严格，培养女儿更是严格。赵燕侠在父亲赵筱楼的教育下，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功底，掌握了精彩动人的表演技艺，学到了不少的优秀传统剧目。

赵燕侠经过多年的艺术创造和实践，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赵派艺术。为京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举世公认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不能不归功于赵燕侠的父亲赵筱楼为女儿在京剧艺术事业上奠定的基础。

多年的风雨飘泊，饥饱忙碌，赵筱楼积劳成疾。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他热切地盼望

能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舞台上演戏。他几乎每天去中山公园，拉“山膀”，踢腿，打“飞脚”，珍爱他的来之不易的武功，希冀尽快恢复健康，好上台演戏。后来，经过医治，终于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在1953年，他五十一岁那年，与世长辞。

赵筱楼曾主演的主要剧目有：武戏，《一箭仇》（饰史文恭）、《潞安州》（饰陆登）、《连环套》，（饰黄天霸）、《四杰村》（饰余千）、《洗浮山》（饰贺天保）、《铁公鸡》（饰张嘉祥）、《铜网阵》（饰白玉堂）、《嘉兴府》（反串花脸）等；文戏：《斩经堂》（饰吴汉）、《萧何月下追韩信》（饰萧何）、《骂杨广》（饰伍建章）、《桃花扇》（饰侯朝宗）、《南阳关》、《梁红玉》等。

戏曲活动家赵广顺（约1860—约1935），别名海亭，武清大三庄人。清末民初天津戏曲界组班邀角之能手。

赵因幼时家贫，吃了梨园饭。初学青衣，后改司鼓。清光绪末年与吕月樵等在天津下天仙戏园首组“鸣凤班”。先后与元元红、玻璃翠、崔松林等为主，生意不佳；继约“京角”杨小楼搭班，营业大振。赵每月慨送杨包银高达三百八十两。民初，更常邀梅兰芳、余叔岩、刘鸿升等来津演出，民间遂有“看好戏到下天仙”之语。1925年下天仙改新明大戏院后，赵又陆续改邀沪伶演出海派戏。1927年名伶刘汉臣、高三奎刚到“新明”演出不久，因获罪于前直隶督办褚玉璞遇难，赵仗义营救，未成。“新明”渐衰。约1929年赵离津南下，在南京经营福利大戏院。后卒于此。

赵一生以戏园为家，极重戏德。他广结人缘，推门哪儿都进。不尚豪奢，却慷慨施人。每于年节都要发起义务演戏助赈，深受天津乡里赞誉。

赵弟广义，工小生。子赵庆元司鼓。侄赵筱楼工武生。侄女赵美英，侄孙女赵燕侠工青衣花旦。

鼓师周悦先（约1872—1928），小名羊头。武清人。

周少时，曾在乡间梆子班坐科，习青衣，经常在天津一带跑帘外。约十三岁时，在天津拜张福增为师，改习锣鼓。曾为梆子鼓师。1903年，应下天仙戏园赵广顺之邀为京剧司鼓。

周的武戏打法，独具特色，被天津梨园场面誉为“一代宗师”。例如锣鼓点子中“急急风变冲头”的奏法，“九锤半”、“导板头”加铙钹等，在天津均为周所创用；《青石山》中“四门镜”之鼓点设计，亦为周创用。

周为李吉瑞、尚和玉、薛凤池等人打鼓多年，极得李、尚的称道，每赴外地演出，必厚资邀周同行。某次李在上海演《翠屏山》，多耍了一套刀花，而伴奏曲牌的鼓点已毕，重打乏味，周立将点子倒打以应之，博得满堂采声。现存李吉瑞的唱片《独木关》、《刺巴杰》等均为周司鼓。

梨园坤伶赵美英（1894—1966），女，京剧演员。幼名小美英，武清大三庄人。

赵美英幼聪慧，在父、伯赵广义、赵广顺的家传渊源下，又从津角陆秀云、小珊宝等习艺。启蒙后经常以“小客串”名义演出于天仙茶园及普乐茶园，颇得好评。

赵美英不仅成熟较早，而且技艺全面，她擅演正剧、悲剧，对玩笑剧、喜剧、摔打武旦剧、泼辣剧亦皆擅长。排演新戏更为出色。她爱好广泛，能歌善舞，对游泳、打球、骑马、射猎，无一不能。她的一些行止，在当时被引为趣谈佳话，赵本人则被称为“美艳亲王”。

1925年，赵与天津驯马师尤某订婚。事被北洋政府军阀、曾任直隶督军及山东主席的李景林得悉，竟从天津国民饭店将赵骗劫至海河“大连码头”并转往济南，软禁之后，强纳为侧室。数年后，经赵多方挣扎、托情，终于逃出魔掌，潜回天津，时尤某已就任英商登禄普橡胶公司高级职员，二人终于结合。

1931年，赵又重登舞台，参加天津天华景戏院演出，与梁一鸣、陈莲舫等合作，排演了不少新剧目，深得天津观众的喜爱。

赵的早期代表剧目有《云罗山》、《宏碧缘》、《北汉王》、《日月图》等，中期为《洛阳桥》、《斗牛宫》，后期为连台本戏，如《牛女姻缘》、《狸猫换太子》等。1942年因身体关系息影舞台，1966年病逝于天津。

赵妹美艳，亦工旦角，经常随美英同台演出。美艳嫁天津武生盖春来，后同去东北，1972年在东北逝世。

河北梆子青衣金艳芬（生于1909年，卒年不详），女，河北梆子演员。本姓张，名小芬，艺名金艳芬，武清人。少时师事王金钟、私淑小香水，出师后应工青衣，常与小香水、金刚钻一台同演，艺事多得二人提携，因此，戏路与演技同小香水、金刚钻相仿佛。

金艳芬工于唱而拙于做，喜演悲剧，以唱胜。她丹田气足，行腔朴实，翻高时轻松娴巧，拖腔时痛快淋漓。从1927年至1937年，在天津梆子舞台上充任台柱，其间有时上北京、保定等地演出。擅演剧目有《四郎探母》、《秋胡戏妻》、《算粮》等。

金艳芬性格孤僻、清高，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对慕名而至的捧角家，一概谢绝会见。

1937年“七·七”事变后，金艳芬去农村跑帘外，从此在天津剧坛销声匿迹。

河北梆子老生演员王金城（约1900年—卒年不详）武清杨村人。

王金城原在天津鼓楼东徐朴庵家佣工。徐系清末英商麦加利银行的买办，捐官候补道。王自幼喜爱河北梆子，嗓音天赋出众。暇时常去票房票戏。私淑元元红（魏联升），艺术上得过张国义（人称王八子儿）、宋直深的指教。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王在天津“下海”为伶，宗“元派”，先后与金刚钻、刘香玉、李桂云、秦风云、梁蕊兰、陈艳涛、小菊处、柳香玉、小莲芬等许多坤角合作，演出于春和、东天仙、大舞台、北洋、中国、天宝、国民等戏院。1939年天津水灾过后，他带头组织梆子艺人在中国大戏院举行赈灾义演，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三十年代中后期和四十年代前期，

他在河北梆子处于衰落的形势下，不仅能够维持演出，而且售票情况良好。舆论界对他评价为“元元红（魏联升）之后第一人”。

王金城不尚武功，但懂得做戏，面部、眼睛都能演出情绪来。他的嗓音洪亮，模仿元元红确有几分相像。擅演剧目有《江东计》、《南北合》、《桑园会》、《雪弟恨》、《算粮》、《蝴蝶杯》等。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到朝鲜釜山灌制河北梆子唱片。现存有国乐、胜利、百代等唱片公司为其灌制的《汴梁图》、《打雁》、《探母》、《拜寿算粮》等许多种。

1944年8月，王金城离津赴济南，行前曾在国民戏院作告别演出，此后绝迹于天津舞台，不知所终。

津门文丑佟崇湖（生卒年月不详），武清人。工丑。师事大家乐，并受益于王德山。因武功欠佳，只演文丑。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经常搭班天华景稽古社赵美英、梁一鸣班，擅排本戏、小“玩笑戏”，如丑角“小八出”，最为拿手，与玉兰花（谷玉兰）配戏可称珠联璧合。

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祖籍武清曹子里乡大三庄。自幼在父母督导下练功学艺，七岁随父赵筱楼在杭州、上海、汉口等地搭班演戏。十四岁在北京向诸茹香拜师学艺。后先后拜李凌枫、荀慧生、褚玉香、何佩华等名家为师学习青衣、花旦，学习了王、荀、梅派的艺术特点。十五岁演出《十三妹》（与侯喜瑞合演）、《大英杰烈》，开始在京剧舞台崭露头角，并与前辈名家金少山、谭富英、杨宝森、马连良等联袂演出《武家坡》、《二进宫》、《霸王别姬》、《坐楼杀惜》（与杨宝森合演）等剧目。1947年，十九岁的赵燕侠组建“燕鸣社”，在京、津、沪等地演出，由她担任主演的《红娘》、《玉堂春》、《荀灌娘》等在继承荀派风格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唱、念、做、打别具一格，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新中国成立后，“燕鸣社”改名“燕鸣京剧团”，后于1961年并入北京京剧团，赵燕侠任副团长，多次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老一辈艺术家同台演出。赵燕侠经常在《白蛇传》《红梅阁》《碧波仙子》等剧中唱大轴。1964年，赵燕侠主演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即《沙家浜》，成功塑造了阿庆嫂的艺术形象，为实现传统艺术形式与革命内容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79年，赵燕侠任北京京剧团一团团长。此后，她着力培养青年演员，大胆进行艺术团体的改革。她戏路宽，青衣、花旦、刀马旦、文武小生等多种行当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都能演。而且从剧中人物性格出发，突破程式、行当的界限，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她做戏洒脱，唱腔悠扬婉转，节奏鲜明，她结合个人条件，大胆突破，念白清脆甜亮，咬字清晰，为业内外行家所称道。

京剧名配角苗胜春，祖籍武清王庆坨。童年时入天津靳庆云办的德胜魁科班习梆子，后改皮黄，工文武老生，得赵春瑞的传授，擅演黄派武老生戏。如《剑峰山》、《反五关》、《莲花洞》、《八蜡庙》等，也兼演其他武生戏。倒仓后，改习文武丑，舍旦角外，他几乎无所不能，无戏不演。清光绪乙巳年（1905年），苗胜春初来上海，在老天仙茶园搭班。后来他离沪去海参崴，结识周信芳，并与马德成、张少甫、李琴仙及周等五人同结金兰之好。不久，苗胜春、李琴仙随周信芳来到上海，先在群仙茶园，继入新新舞台，苗、李始终与周同进退。

尤其是苗胜春与周信芳同时加入了丹桂第一台，成了周不可缺少的搭档，周得苗配如鱼得水。那时周与苗形影不离，苗也宁愿放弃正戏不演，甘为绿叶，不仅为周之演出生色不少，且教了周不少武戏。苗胜春在大舞台演出不久，又过班到黄金荣经管的共舞台，在共舞台达数十年之久，为黄金荣所器重。后来黄开办黄金大戏院，他与高雪樵、粉菊花、韩金奎等人又成了黄金大戏院的基本人员。苗对青年演员极为提携，特别是 20 世纪 40 年代对高盛麟钟爱有加，奠定了高的大武生地位。解放后，苗胜春当时已年近古稀，且耳聋重听，已无法演戏，乃以授徒教戏为主。后任南京戏校教师。1954 年起，苗任戏校副校长。

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武丑张春华，祖籍黄庄街东洲。少时为家境所迫，年方 10 岁就正式到天津天华景稽古社科班学戏，工武丑、武生，得娄廷玉、丁秉春等传授，并得尚和玉指点。出科后，在京、津等地搭班。1943 年春节，代叶盛章演出《时迁偷鸡》名噪津门，同年正式拜叶为师，赴京随富连成科班演出。同年，赴沪与贺玉钦同台合作。早在上个世纪的 40 年代，因其主演外国故事京剧《侠盗罗宾汉》而初露峥嵘。后来凭着他主演的《盗甲》、《酒丐》、《巧连环》等多出精彩剧目活跃在京、沪京剧舞台上，尤以白口脆快、开打火爆的高超技艺取胜。在所演的剧目中，张春华的表演十分注重遵循技艺为塑造人物服务这一宗旨，其中尤以擅长设计武打动作而最为驰名。1946 年与张云溪合作成立云华社。1949 年参加戏曲改进局京剧实验二团，后转入中国京剧院，与李和曾、张云溪、李洪春等长期同台合作。1951 年与张云溪一起改编《三岔口》一剧，成为驰誉南北的优秀剧目。他还演出了《三打祝家庄》、《猎虎记》、《五鼠闹东京》等许多新编剧目，并向川剧名丑周企何学演了《秋江》，使其成为京剧保留剧目。1979 年后，他仍坚持舞台演出，与李世济、张云溪等经常巡回演出于全国各地。1988 年在全国新剧目汇演中与天津青年京剧团合作主演新编剧目《草莽劫》。他幼工扎实，技艺精湛，台风光彩照人，允文善武，是叶派武丑的主要继承人。1951 年赴德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以哑剧形式参赛，主演《三岔口》，获表演一等奖。1952 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获演员一等奖。1955 年随中国艺术团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士、英国、南斯拉夫等国演出，轰动巴黎、罗马、伦敦等西欧城市。1978 年随中国艺术团赴美国各大城市演出《秋江》一剧，受到美国广大观众欢迎。1987 年赴英国卡迪夫，给来自世界各国的京剧爱好者讲授京剧表演艺术以及京剧武丑的艺术特点，并在伦敦高夫先生举办的东方古典艺术研讨会上演出了《秋江》与《借扇》，受到各国艺术家和新闻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欢迎。

著名评剧名丑和表演艺术家李哈哈，祖籍武清李各庄村，原名李景裕。是石家庄市评剧团奠基人之一。李哈哈家庭出身很苦，小时候流浪到天津当杂工，后来学过京剧，演过文明戏，曾在北方影片公司，配合电影明星——滑稽大王殷秀岑、韩兰根等名家拍过影片《永不归》。从此崭露头角，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33 年他开始改演评剧，专攻丑角兼彩旦。由于他五官相貌、脾气性格等天赋条件都非常适合演丑角，再加上他勤奋好学，苦心钻研，勇于创新，很快就声望大震，蜚声剧坛。他先后给当时的评剧著名坤伶花玉兰、爱莲君、筱金珠、筱玉凤、郭砚芳、筱桂琴等配过戏，在东北、上海、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巡回演出，深受观众的爱戴与欢迎。他的艺术特色是善于演喜剧和闹剧，如《黑白会》、《砸面缸》、《贱骨头》、《空谷兰》、《姊妹花》、《大皮包》、《傻子招亲》、《少姑奶奶的戒指》等戏，都有独到

之处，他的表演特点是，丑而不俗，喜中透雅，闹而不过，讲究分寸。因此曾轰动一时。李哈哈的面部肌肉非常松弛，眉、眼、耳、鼻、嘴都运用自如，可以说是二目传神会说话，浑身上下都是戏，观众看他演出，会情不自禁地捧腹大笑，因而亲切地赠送他一个富有喜剧特点的艺名——“李哈哈”。1947年石家庄解放初期，李哈哈认真工作，艰苦创业，和其他艺友一起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一天只领三角钱的饭费，仍坚持慰问解放军，并积极带头排演革命现代戏，如《光荣花》、《宝山参军》、《九尾狐》、《唐小烟》、《刘巧儿》、《罗汉钱》等，为剧团赢得了荣誉，也为剧团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著名评剧小生吴俊亭，武清人。1932年前后，年仅十一岁的吴俊亭加入了山霞社，成为一名小生演员。当时，同在“山霞社”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白（白玉霜）派传人的另一位武清人李兰舫（1936年二人结为夫妻），吴俊亭学戏刻苦、认真，经常在后台偷戏（行话称为捋叶子），同在“山霞社”的著名女小生桂宝芬，非常受欢迎，于是吴俊亭就主动向她学习。后来，在桂宝芬缺场的情况下，吴俊亭就与刘翠霞配戏，逐渐成为一名具有特色的小生演员。当时，他参加演出的剧目有《雪玉冰霜》、《人面桃花》、《盗金砖》、《武松》等。吴俊亭的形象好，动作潇洒漂亮，跑台、亮相十分帅气。他嗓音音域宽，音色明亮，曲调迂回委婉，优美动听。他的唱腔具有特色，以低腔低调为擅长。孔广山、刘小楼等著名小生都受到吴俊亭的影响。1938年，吴俊亭赴东北演出，从此再没有回过天津。一直到解放后，吴俊亭加入了沈阳评剧团。成为一名集导演、演员为一身的双栖艺人。1950年东北文协评戏工作组与唐山评戏院于1950年在沈阳首演《小女婿》（原戏名《青春》），吴俊亭饰演田喜，该演出在评戏界引起反响。值得一提的是，吴俊亭曾于1959年在沈阳评剧院执导了《人面桃花》，并饰演了小生崔护的角色，尤其是题诗一节，传神的动作，洒脱的书法，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

著名京剧花旦赵桐珊，武清人。自幼热爱戏曲，八岁时，只身离家赴京学艺。初学梆子，拜赵庭玺为师，向麻子红学梆子青衣。十岁时就与梆子名角崔灵芝、丁灵芝、李灵芝、任灵芝及还阳草同被列为“梆子六草”；十二岁入正乐班后不久就又与尚小云、荀慧生被并称为“正乐三杰”，向梆子名家大玻璃翠、冰糖脆学戏，后又向著名梆子旦角老五仙、老十三旦、崔灵芝等边学边演《双锁山》、《汴梁图》、《游湖阴配》、《七星庙》等戏。当时正值京梆“两下锅”（合演）时期，在正乐社时，赵桐珊就向王桂山学过二簧花旦戏，又曾得京剧名花旦田桂凤指导，学会了《战宛城》等田的拿手戏，后又拜王瑶卿为师，成为王门弟子之一。他扮相俊俏，嗓音清亮，又敏而好学、钻研刻苦，未满师时就崭露头角。十六岁在上海演出连台本戏《女侠红蝴蝶》，以杰出演技驰誉春申，从此专演京剧。在他50年的舞台生涯中，与之合作演出过的著名演员有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欧阳予倩、赵君玉、李玉茹、童芷苓、黄桂秋、高庆奎、周信芳、马连良、林树森、陈彦衡、侯喜瑞、时慧宝、李永利等，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表演艺术受到各地的欢迎好评。1919年曾随梅兰芳去日本演出，载誉而归。20世纪50年代后，他专心致力于戏曲教育工作，先后在华东京剧实验学校、东北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校任教，把全部的技艺连同他宝贵的艺术创作和演出经验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戏曲教育事业。他的学生刘秀荣、谢锐青、杨秋玲、刘长瑜、汤小梅、陈和平、艾美君、王小蓉、李维康等，都成为舞台上和戏曲教育事业中的佼佼者。

评剧名生贾学章，1910年生于武清北县毫村。十三岁时拜贾云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十六岁正式登台演出。十九岁拜寇文治为师改学评戏，经常在天津、北京、唐山等地演出。1936年4月，作为主要演员的贾学章曾参加朱宝霞、朱紫霞的“双霞社”到上海演出，剧目有《桃花庵》、《珍珠衫》、《杨乃武与小白菜》、《雷雨》及连本戏《墓中生太子》，同行的还有李子巍、李小楼、单宝峰等。上世纪四十年代，先后与花月仙、新凤霞等名角配戏，在天津升平戏院、天宝戏院演出。1942年6月12到18日，贾学章曾与著名的评剧名家李金顺、花月仙、筱俊亭、花迎春、桂宝芬等在升平戏院共同合作演出。剧目有《白牡丹》、《杨贵妃》、《麻疯女》、《说不出的苦》、《潇湘夜雨》等。与众多名家一起登台演出，足见贾学章的功力之深厚。建国后他参加了聊城评剧团，1955年左右回到天津参加了进步评剧团（后并入天津评剧院），曾随团赴沧州等地参加慰问解放军的演出活动。

贾学章的个头儿不高，但嗓音高亢洪亮，他板眼扎实，赶板垛字清楚利落，演唱快板、闪板技巧很高。他扮演《马寡妇开店》中的狄仁杰，进店观景时的大段唱，层次分明，一气呵成，凸显了他稳健扎实的唱功基础。

1942年前后，新凤霞带领的戏班在天津演出《唐伯虎三笑点秋香》。十三岁的新凤霞饰演老夫人的丫环石榴，而其师伯、已四十多岁的贾学章饰演唐伯虎。石榴手提一条木棍拦住唐伯虎唱：“今年我二十八岁了还没有找到如意郎，我像一团火，你似冰一样凉……”由于二人配合默契，动作认真，唱腔优美，幽默风趣，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梆子名旦邢永喜，1870年生于杨村，曾用艺名鲜牡丹，坐科永胜和班。

永胜和班是戏曲史上著名的演出团体。原为梆子班，同治四年（1865）成立于宝坻县。十九世纪末，梆子演员兼习皮簧者日益增多，永胜和便成为梆子、二簧（京剧前身）“两下锅”的班子。领班人为张国泰，共培养了四科艺徒。该科培养的旦角演员艺名皆以“灯”字命名，其他行当皆以“永”字命名。如程永龙、吴永顺、潘永真、刘永奎。邢永喜也为永字辈，工刀马花旦、武旦，以擅演武戏著称，拿手戏为《取金陵》、《摇钱树》、《樊梨花斩子》等。

由于邢永喜扮相俊美，动作洒脱，在晚清天津戏剧舞台上颇为叫座。大红大紫之后，由于被人嫉妒遭毁容，几次痛不欲生，最后在同科师兄弟程永龙、刘永奎、毕永才等劝说下总算把伤养好。由于面容被毁无法演出，被迫离开舞台。失业后他陷入极端困苦之中。后来，由于演出《跳加官》需要戴着面具，对于邢永喜来说正好一举两得，于是在师兄弟的帮助下，就以演出帽儿戏《跳加官》为职业，并以蟒袍“变脸”绝活而继续扬名天津舞台。

所谓《跳加官》，是指正戏开演前的独角舞蹈戏（也称帽儿戏）。“加官”寓意加官进爵。过去在戏园开戏时都要擂鼓三通，稍静后由“加官”在小锣伴奏下上场。演出时，“加官”脸戴面具（俗称“加官脸儿”），身穿蟒袍，手持缎制可变条幅，上书“天官赐福”、“加官进禄”等字样。然后一手持牙笏，一手持元宝，做出不同的舞蹈动作（行话称之为“醉步”）。《跳加官》只有动作，没有唱念。过去，加官一般都由老生或者小生扮演。还有一种旦行，称为女加官。后来，表演加官的多由底包扮演。

邢永喜为了把帽儿戏演好，苦练各种身段，并为适应当时堂会的临场彩头，特制了一件多种颜色的“加官蟒”。这件蟒袍演出时可以变换各种颜色，类似于川剧的变脸艺术。演出时一撩蟒袍，然后迅速背过去，蟒袍由绿色变成黄色，再到一个段落时又由黄色变成红色。“变脸”结束后，加官把一个特制的大元宝从蟒袍内变出来，向事先等候在台下的堂会主人扔出去。主人接起后，径直将元宝摆在正堂，一出象征吉祥喜庆的帽儿戏终场。人们被其精湛的技艺所震撼，台上台下欢呼雀跃，掌声叫声叠加，声如鸣雷。

梆子名生孙培亭，男，河北梆子老生，生于1872年，故于1922年6月，终年五十一岁。据《中国戏曲志—天津卷》载，“孙培亭也作孙佩亭。河北梆子演员，艺名十三红。据《燕尘菊影录》称，孙为河北省武清县（今属天津市）人。”

1887年，孙培亭入北京宝胜和班。光绪30年（1904）前，在天津与女伶金月梅、赵紫云组成会元班，常在万福茶园演出。曾于当年被挑选入宫为慈禧演出，受到慈禧太后的奖赏。

1909年，清末太监李莲英之侄李继良与薛固久（艺名“十二红”，梆子生角）、孙培亭等3人，在北京创立三乐班科。京剧名家尚小云经李春福介绍曾入该班坐科，取名尚三锡、尚三霞，与芙蓉草（赵桐珊）、白牡丹（荀慧生）、王三黑、沈三玉、赵三凤、庞三秃等为同科学友。

1913年，薛固久退股后，民乐园经理金瑞泉与李继良、孙培亭等人在三乐班基础上，合伙创办了“正乐社”，该班也因此移至“民乐园”（1912年创办，位置在王广福斜街山西汾阳会馆内，以演曲艺、杂耍为主）。该科班仍然是梆、簧“两下锅”班。该社之尚小云、白牡丹、芙蓉草，时人誉为“正乐三杰”。

1918年，崔灵芝、薛固久、孙培亭、马全禄、刘兴周、田子衡等10家股东，在歌舞台联合创办群益社。该社仍然是梆、簧“两大块”的科班，社长系素有“梆子梅兰芳”之称的崔灵芝。先后共培养学员64名，入科八、九个月后即能演出。演员有常德林、孙培亭、崔灵芝、全武行、袁德光、于洪珍等数十人，剧目有《富贵图》、《金雁桥》、《药茶计》、《群英会》、《探庄射灯》、《宋金郎》、《牧羊圈》、《托兆碰碑》等。1922年，孙培亭因病去世，群益社失去驰名老生，演出大受影响。

京剧坤伶王雅兰，天津武清人，1922年8月8日立秋生人。因为家里穷得过不下去，8个月大时，送给一家在戏班子里做事的中年夫妇。

王雅兰自幼学习京剧，十六岁登台，先工刀马旦，曾在天津、徐州、唐山等地献艺。十九岁时，已经名声鹊起，没几年，便挑班挂头牌。

1941年《新天津报》有评论说“王亚（雅）兰演《玉堂春》，唱则嗓音洪亮；做则细腻非常，且文武不挡。名虽尚未轰轰烈烈，但伊之艺学亦足独当一面也。”1942年，王雅兰在“导正新剧支团”时已是台柱子了，《大观园戏报》曾作报道。1943年加入“共和社戏班”。当年9月3日《天声报》载文：“坤伶王亚（雅）兰为老生老旦王德山之女，工演青衣花衫，颇有造就。今与刘俊文辍演中国戏院，曾一度出演新中央，未几又解约。今闻河北天桂戏院不惜重金特约王伶担任大轴，并约勇猛武生何宝童加入演出云。”当年，王雅兰和许多著名

的京剧、评剧甚至文明戏的前辈都同过台。如刘文俊、李和曾、齐和昌、马祥麟、贾多才、何宝童、费玉策、筱俊亭、宁萱等等。其中李和曾、费玉策直到“文革”后还与王雅兰保持联络。

王雅兰的戏路很宽，文武皆能。她的拿手剧目有《虹霓关》、《樊江关》、《穆柯寨》、《四郎探母》、《玉堂春》、《法门寺》等。

1941年至1944年，王雅兰在天津演出的场所就有河北天桂、小广寨、新中央、升平、上光明、大观园、大观楼、中国大戏院、聚英等多家。

1944年，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和她合作在天宝大戏院演出《四郎探母》，王扮公主，侯演前后的萧太后，中间演小生杨宗保；演《法门寺》，王演孙玉姣带宋巧姣，侯演贾桂。有一次演出全本的《玉堂春》，王雅兰演苏三，侯宝林先演解差崇公道，后演巡按王金龙。因为事先没排演，临到园子时，才发现了问题。因为，前场崇公道下场后，紧接着下一场王金龙就得上台。侯宝林卸妆、换妆的时间太紧。还是侯宝林脑子快，他对演蓝袍的演员说：“崇公道下场后，请您加个过场，编几句词儿，按《黄金台》的路子，唱二黄，先是导板、碰板再转四句原板，然后自报家门，接着唱两句散板。有这工夫，我就能打扮整齐上场了。”结果，演出时效果很好。王雅兰很钦佩侯的机智、热情和对京剧的熟悉，侯宝林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合作了两年，彼此配合默契。到了1946年水到渠成喜结良缘。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高雪樵，作为全国享有盛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十几岁时，在东北演出就崭露头角；后来在上海主演武功戏，引起了轰动。他与梅兰芳、盖叫天、金少山、周信芳、林树森等大牌名角经常合作演出。1931年上海出版的《南北名伶图》一书中，就刊登了高雪樵的大名，并与北派名演员高盛麟合称为“南北二高”。1956年，高雪樵应聘湖南常德出任京剧团首任团长，他亲自筹建剧团，为戏剧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年，高雪樵在上海演出武打戏时，无论在化妆、服饰、使用道具以及筋斗过城墙等方面，都有许多创新之处和独特的表演技艺，而且他对演出非常认真，不管观众多少，不管在城里或乡村，他总是一丝不苟。

高雪樵是武清稍子营人，1912年生，出身于京剧世家，父亲高俊亭，长兄高月秋都是京剧演员。他从小跟父兄学戏，勤奋好学，不怕艰苦，每天散戏之后，仍留在舞台上练功，翻腾扑跌，从不懈怠，练就了厚实的功底。高雪樵十五岁时，开始随父兄在哈尔滨市登台演出。有一次，其兄高月秋在演出前突然生病不能上台，高雪樵登台试戏，初出茅庐的他年轻、英俊，武功干净利落，唱作俱佳，彻底征服了台下观众，当时在哈尔滨市引起了轰动。从此他的演出不断，声誉日高。1930年，他就组成一个小班随哈尔滨的剧团去中苏边境城市——伯力（即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演出，以其娴熟精湛的翻腾技巧和炽热火爆的把子功夫令苏联观众瞠目结舌。演出归来不久，他看到当时全国京剧界著名演员大都汇集在上海，如梅兰芳、赵松樵等。他非常渴望能学到他们的技艺。为此，他决心赴上海演出。但其兄担心他难以在名家荟萃的上海立足，开始并不同意。但高雪樵说：“越是这种情况，越是学艺的有利条件，越是要去闯一闯。”高月秋被弟弟的勇气所打动，亲自陪他前往上海。

到上海后，高雪樵连续演出三场打炮戏：《大刀王五》、《铁公鸡》和《四杰村》。上海出

现了“满城争说高雪樵”的局面。他终于一举成名，在上海站住了脚。有一次，他与著名武生赵松樵、徐辅霆、谭富英、李仲麟、张翼鹏等7个武生同演《长坂坡》，由高雪樵演大轴，演完后管事夸赞他扮相英俊，功架稳重，显得既有大将风度，又特别注意到君臣的身份，刻画人物，入木三分。

1937年上海罗汉出版社出版的《南北名伶照相图》，高雪樵排第二页，并被冠以“名伶武生”美称。

1956年，高雪樵应聘到常德出任京剧团首任团长，

高雪樵对演技精益求精，对演出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即使遇上不愉快的事情，也不会带着情绪上台。他不仅自己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对待别人演出也要求很严。

高雪樵为人正直、正派，一贯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义务。高老的后十年，则处于“文革”动乱时期，高老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尽了屈辱与折磨，后几年则在病中度过。1978年初，高老在常德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终年66周岁。

高雪樵不但艺术超群，艺德高尚也在梨园行中传为佳话。他敬老尊贤，对兄弟友爱，对晚辈爱护。老人们都很喜欢他，晚辈对他都十分的尊敬。

著名京剧武生筱高雪樵，原名高德山，武清人，1926年生。国家一级演员。工京剧武生，生长梨园世家，自幼随父亲高月秋、叔父高雪樵学习京剧。七岁开始练功，十七岁正式登台独立演出，主工长靠短打武生。家传猴戏《八仙斗白猿》为筱高雪樵早先常演剧目。在高雪樵的指导教习下，筱高雪樵打下了扎实的武功基础，1942年开始在杭嘉湖一带及温州挑班唱戏，艺术精进。1947年进上海四大公司及上海大舞台、中国大戏院等挑班演出名声大噪。随后与白玉艳、赵燕侠、李如春等合作，巡演全国。所演《潞按州》、《广太庄》、《金钱豹》、《铁公鸡》、《战宛城》、《龙潭鲍骆》、《恶虎村》等武生戏，名扬全国。

筱高雪樵也曾与著名演员李如春及周信芳大师合作演出本戏《白蛇传》、《唐明皇戏月宫》、《包公》、《荒江女侠》等。

1962年加入上海京剧院。主要剧目有：《驱车战将》、《龙潭鲍洛》、《挑滑车》、《一二三四本走麦城》、《金钱豹》、《盘丝洞》、《十八罗汉收大鹏》、《八仙斗白猿》、《孙悟空棒打万年青》、《长坂坡》、《狮子楼》、《斩经堂》、《投军别窑》、《群英会》、《韩信》、《独木关》等。

早期京剧小生名家王楞仙，武清人，生于1859年，卒于1908年，名树荣，字桂官，艺名桂花。

他名为四喜班鲍福山弟子，实受教于徐小香。他与谭鑫培、陈德霖共组三庆班，一度曾为班主，有“活周瑜”之誉，与谭鑫培同演《状元谱》时称“双绝”，曾为清宫内廷供奉。中年后因嗓音喑哑，改研医学，精于外科。

代表剧目：《拾画叫画》、《琴挑》、《奇双会》、《悦来店》、《八大锤》、《借赵云》、《状元谱》、《岳家庄》、《镇潭州》、《连升店》等。

他的表演做功极为细致，演唱讲求四声，喷口有力，以字谱声，不尚花哨。所创造的大笑、怒笑、冷笑、讥笑、苦笑、傻笑、假笑等各种小生笑法，为后学者所效仿。

程继先、陆杏林、金仲仁等继承了他的唱法和做功。

京剧名角李桂林，天津武清人，曾随张玉亭习河北梆子，后改演京剧，工短打武生兼小生。尤擅翻打，为盖连仲配演马童，深受欢迎。早年，曾在包头演出，后到宁夏银川“庚辰俱乐部”唱京剧，与盖连仲、高富厚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京剧在宁夏全盛时期的主要演员，成为当时宁夏京剧界的著名艺人。解放后“庚辰俱乐部”改为“人民京剧团”。1949年9月26日晚，李桂林等“庚辰俱乐部”成员为解放军19兵团演出了《豆汁计》、《三岔口》、《玉堂春》等传统剧目，博得满堂喝彩。

京评梆谙熟的王顺义（1890—1965）原名王燮臣。天津武清黄花店人。十二岁时在乡间坐科梆子班，习武老生。十四岁在天津从李德启改学锣鼓。二十岁时改在鼓师周悦先手下从艺，深得教益。他对京剧、河北梆子、评剧场面皆谙熟，尤以掌河北梆子鼓板为精湛。曾为小达子、银达子、小香水、金钢钻、小爱茹、葛文娟、梁蕊兰等人司鼓。与河北梆子琴师王恒、俎宪章（栓柱）、郭小亭等人合作多年。他能戏极多，撙腔打挂（掌握唱腔和伴奏的尺寸和力度）讲求轻重疾徐，与弦配合入微入妙，浑然一体。1956年，应聘到天津戏曲学校任教，后转河北梆子剧院附属学校。他先后授徒有姜三、于又泉、刘玉起、韩廷文、徐金栋等。其子王绪钧、王绪明均在天津京剧界司鼓。

梅派名角花艳云（1915—1969）女，本名王秋霞，武清人。1924年学唱河北梆子，后从师王瑶卿学梅派京剧。青衣、花旦、刀马花旦兼而习之。十五岁出科后，即挑梁当主演，流动演出于东北各地。1936年在牡丹江兴亚舞台演出过《大战宛城》、《连香传》、《花田八错》、《汾河湾》等剧目。后在哈尔滨演出《五花洞》时，由于唱功绝妙，加上丈夫吴玉海伴奏，博得观众数次满堂彩。1939年到1945年一直在佳木斯佳明舞台演出，合作的主要演员有邢威明、李丹林等。抗日战争胜利后，1947年演出新戏《王贵与李香香》（饰演李香香），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1948年演出《穆桂英》、《白娘子》，并向驻军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演出的梅派主要剧目有《春秋配》、《金山寺》、《奇双会》、《花田错》、《金玉奴》、《生死牌》等；1950年调到齐齐哈尔市，先后在黑龙江省京剧团、黑龙江省戏曲学校担任教师。培养出一批京剧女演员，其中有赵蕊兰、胡亚芹、董淑华、李凤兰等。1954年，黑龙江、松江两省合并后，调黑龙江戏曲学校京剧科任教，又培养出一批女演员，如周洁敏、李玉双、宋桂珍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迫害，积愤成疾，病逝。

京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李金鸿。原名李士芳。祖籍武清，1923年生于天津。

1930年考入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金字科，初学老旦，又习老生，武生，后归武旦、刀马旦和花旦。师从张善亭、阎岚秋、诸茹香等名师。在校常与袁金锦合演《焰火棍》、《打

瓜园》等，备受赞誉。1939 年毕业后，演于京津沪等地，曾与叶盛章、李世芳等合作。又向王瑶卿先生学习刀马旦，向萧长华先生学习花旦，向李凌枫先生学习青衣，向韩世昌先生学习昆曲，向包丹庭先生学习小生，从而打下了全面扎实的艺术功底。1942 年拜尚小云、梅兰芳为师。1946 至 1947 年在上海与黄桂秋、言慧珠、周信芳合作演出。1947 年曾入焦菊隐组织的北平艺术馆。1949 年加入永春京剧团。1951 年加入首都实验京剧团。1952 至 1973 年加入中国京剧院一团。1973 年调入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任教，1988 年退休后继续任教。

曾任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和中国戏曲学院实验京剧团团长。中国戏曲学院首批被评为教授职称的专家，并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待遇。

代表剧目擅演《金山寺》、《扈家庄》、《无底洞》、《小放牛》等，20 世纪 60 年代曾演《桃花扇》、《佘赛花》、《群英会》、《谢瑶环》等小生戏。

京剧表演艺术家丁至云，原名学秋，别名学芳。原籍武清大王古丁辛庄，世居天津，工梅派青衣。自幼爱好京剧，曾受业于王云卿、王庾生、金碧艳等。十余岁即参加天津渔阳国剧社，经常票演于京津各地。1938 年为深造梅派艺术，向王瑶卿、徐兰沅请益，经常与金少山、谭富英、杨宝森、李多奎及名票王庾生、包丹庭、从鸿奎、朱作舟等合作演出。1942 年，北平举办全国京剧票友大赛，丁至云以赵学芳名义参赛，名列榜首。1944 年曾创办同芳慈幼院，为幼儿慈善事业不遗余力。1948 年拜梅兰芳为师，并得到了王少卿和魏方莲的指点。1956 年，任天津京剧团副团长。所演剧目有《玉堂春》、《凤还巢》、《太真外传》《西施》、《奇双会》、《生死恨》、《宇宙锋》、《四郎探母》、《贵妃醉酒》、《红鬃烈马》、《霸王别姬》、《宝莲灯》、《穆桂英挂帅》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入天津市京剧团为主演。晚年致力于书法、绘画，以画梅花、牡丹最为出色。

著名黄梅戏演员王少舫，祖籍武清。1920 年出生于梨园世家，八岁随母学唱京剧。1950 年应丁永泉的邀请改唱黄梅戏，在黄梅戏的表演和唱腔上王少舫做了很大贡献。王少舫声音宽厚洪亮，吐字清晰，行腔流畅，韵味浓郁。扮演的人物生动传神，令人难忘。他曾获华东区戏曲汇演一等奖和文化部颁发的金质奖，两次获省戏曲一等奖。严凤英和王少舫两人不仅仅是表演艺术家，更是戏德高尚的艺术家。1953 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后改为黄梅戏剧院）在合肥成立，严凤英、王少舫等一批骨干由安庆调到合肥。剧团相继推出了《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一批黄梅戏艺术精品。这段时期，黄梅戏在舞台、广播、电影等许多艺术实践中，全方位地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王少舫在《天仙配》中饰演的董永，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并且受到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广大观众的青睐。1986 年在合肥因病去世。

评剧宗师韩少云（1931—2003），评剧代表人物，现代戏的霸主，评剧韩派创始人。幼年师从养父韩德金学艺，祖籍武清南蔡村韩营村。历任沈阳评剧院一团副团长、艺术顾问。197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52 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演员一等奖。表演朴实细腻，唱腔圆润醇厚，吐字清新，髡（疙瘩）音运用尤佳。以演《小

女婿》《洪湖赤卫队》著称。主演的《小姑贤》已拍戏曲片。

九岁学戏，京、评、梆兼学兼演。稍后便专工评剧。师从刘子西先生学戏，学了《开店》、《哭井》、《朱买臣休妻》等一批评剧初创时期的剧目，同时学了《盘丝洞》《李慧娘》、《雷雨》等大量的移植新剧目。十五岁即担任主演，经常演出于山海关至天津一线，深受观众喜爱。十九岁崭露头角，成为河北地区的名角儿。当时著名的评剧艺术家金开芳老师闻名而往，看过她演的两场戏之后，便决定把韩少云接到沈阳工作。1950年8月韩少云到沈，参加东北唐山评剧院。此后她相继在东北评剧实验剧团、辽宁戏曲剧院评剧团、沈阳评剧院工作。1952年，韩少云饰演评剧《小女婿》的主角杨香草一角，《小女婿》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韩少云因此获得了演员一等奖，并在怀仁堂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汇报演出。1953年，《小女婿》在东北地区汇演时，她再次获得优秀表演奖。韩少云的人生由此亮丽起来。翌年，《小女婿》又参加了东北区汇演，她再获优秀表演奖。她扮演《杜鹃山》中的贺湘，获1963年沈阳市汇演优秀表演奖。就在韩少云的艺术大之巅峰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她在《红霞万朵》中饰演的一个次要角色，因为她高超的表演技巧得到了观众更大的关注，因此被指控为违反了“三突出”原则，韩少云遭到了严厉的批判；1970年，全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韩少云被禁止唱戏。可是就是如此，韩少云也没有放弃她深爱的评剧艺术。

在1978年和1979年沈阳市举行的两次表演赛中皆获荣誉奖。她主演的《小姑贤》于1953年在“东影”拍成电影，它是我国建国后第十部戏曲片、第一部评剧艺术片。《人面桃花》于辽宁电视台录成。十多出剧目的唱段、选场或全剧录成唱片和盒带。若干唱段已收入沈阳音乐学院等几所院校的教材中。若干唱段被选入《中国戏曲艺术家唱腔选》韩少云专辑。她的名字和照片已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和其他典籍中。

半个世纪，她上演近二百出戏。代表剧目有：《小女婿》、《小二黑结婚》、《杨三姐告状》、《洪湖赤卫队》、《杜鹃山》、《江姐》、《红嫂》、《友谊之歌》、《梅雪遇》、《家》、《沂蒙山人》、《貂蝉》、《桃花庵》、《李三娘》、《凤还巢》、《人面桃花》、《天雨花》、《红楼梦》、《西施》、《小姑贤》等。塑造了无数鲜活的舞台艺术形象。她炉火纯青的技艺、无比高尚的艺德，在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人民艺术家。她擅演现代戏已有定评，她所扮演的“五四”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妇女典型都形象逼真。特别是她对于其中一些女干部形象的成功塑造，为评剧表现现代生活和扩大表现题材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她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从表演上看，其扮演的角色均各具特色。并以朴实、细腻、优美、大方的表演风格而著称；从唱腔上看，她历史地受到了评剧初创时期唱腔的刚劲酣畅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演新移植剧目中的）新唱腔的柔媚洒脱的两种特性的影响，结合自身条件，溶化成为音域宽广、刚柔兼济、行腔适度和韵味醇厚的特点。而她的吐字和疙瘩腔更别具一格。她的表演和唱腔浑然一体，形成了总体的艺术风格，被广大观众誉为“韩派”。关内外都有她的传人。

韩少云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不图虚荣、只为艺术，不计门派，精心育人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她教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杨晓彦、胡桂秋、冯玉萍、周丹、宋丽、刘虹等，这些艺术界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出自韩少云的调教。其中冯玉萍更是在全国两次获梅花奖，其获奖剧目《风流寡妇》、《疙瘩汤》也是出自韩少云的指导。宋丽在沈阳评剧院

时虽然曾拜韩少云为师，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并获得过戏剧梅花奖，但自从调到中国评剧院后，由于受环境的影响或其他原因，改学白派。

新中国成立以来，她先后出席了全国第二次青代会、第九次团代会、第四届青联委员会、第五次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和第四次剧代会。曾任沈阳市政府委员、市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省妇联执委，市青联副主席，全国青联委员会委员，全国六届人大代表和全国第七届人大代表、辽宁省剧协副主席、沈阳市剧协副主席。后为沈阳评剧院艺术顾问、沈阳文学艺术专家委员会委员、沈阳市荣誉艺术家、辽宁《不老松》画会的顾问。此外，韩少云还投资开设了具有文化品位的云阳酒家，并兼任董事长职务。

韩少云晚年来一直在政府创办的老年大学中学习国画，并在纪念从艺六十年时举办了个人画展。韩少云最擅画梅花，她笔下的梅花枝干虬逸、劲蕊吐芳，正如她丰盈美丽的艺术生涯。

2003年7月20日7时15分，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韩少云逝世，享年72岁。韩老师的仙逝是戏曲界的一大损失，无数的戏迷依然怀念德艺双馨的评剧大师韩少云！

二人台演员班玉莲 1935年出生，汉族，天津武清人，二人台演员，工小旦。

代表剧目：《走西口》、《玉莲》、《压糕面》。1955年，参加内蒙古第一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戏剧观摩演出大会，在《走西口》中饰玉莲获演员一等奖。上世纪60年代初，该剧被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剧艺术片。

解放前，二人台基本上没有女演员，1946年，有一个二人台小班正在乌兰花演出，偶遇一个十二岁孤苦伶仃的女孩子，老艺人秦五毛眼见她聪明伶俐，有个好嗓子，遂推荐给同班的著名老艺人计子玉收为徒弟，这个徒弟叫班玉莲，她是从武清流落到武川的，后来，他们一同在土默川一带演出，人们听说有个女旦叫班玉莲，人们感到非常新奇，所以轰动了河套川。人们曾流传着这样一些话“宁可抽恒火烟，也要看女旦班玉莲”，“不吃白面吃稀粥，也要去看班玉莲的走西口”，观众场场都爆满，很有名望。班玉莲是第一位二人台女演员，并常年参加演出活动。1953年，被称为新时代二人台第一个女演员的班玉莲，在呼和浩特市演出《走西口》、《卖菜》等剧，轰动了全城。后来，刘银威和班玉莲的《走西口》被拍成了电影。

在《魂牵梦绕二人台》一书中介绍当年班玉莲在《走西口》中扮演玉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班玉莲自己讲演好玉莲最主要的是哭板那一段，止不住的泪蛋蛋一道一道道往下流，要随着真实的眼泪唱出来。

河北梆子名角黄景荣，1941年生，笔名黄金荣。天津武清人。1962年毕业于天津市戏曲学校。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一团二级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38年的舞台生涯中，演出了40多个性格各异的不同角色。主演的《红灯记》、《让新房》、《三棵栗树》、《朱砂梦》、《方增光》等戏的唱腔都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认可和赞扬。《人情》一剧饰经理，1982年在天津市现代戏汇演中获二等奖；《三棵栗树》中饰老顺叔，获1983年天津新剧目汇演表演奖；

《关羽认妻》中饰刘备，获 1986 年天津首届戏剧节优秀演出奖；《朱砂梦》中主演老米京，获天津市第二届戏剧节优秀演员奖；《方增光》中饰方增光，获 1994 年天津市第三届戏剧节优秀演员奖。另外，主演的一些剧目还被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

河北梆子名角时银海，男，1953 年 10 月生于武清石各庄敖南村。现为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一级演员。1970 年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学习河北梆子表演专业，师承张少英、胡文才、左庆权老师。毕业后留校继续深造。1975 年，进入河北梆子《杜鹃山》剧组，饰温其久，《红灯记》饰李玉和，《红色娘子军》饰洪常青。1976 年随《杜鹃山》剧组并入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

到剧院后，师承于田春鸟老师，专习小生，主演《宝莲灯》饰前部刘彦昌，《陈三两》饰李凤鸣，《蝴蝶杯》饰田玉川，《张羽煮海》饰张羽，《桃李梅》饰彦文敏等剧，均获得了观众的肯定和好评。

在 1984 年河北省河北梆子青年演员汇报演出中荣获演员二等奖；1992 年荣获第三届河北省戏剧节演员二等奖；2000 年荣获河北省河北梆子优秀剧目展演优秀表演奖；2001 年获得省文化厅嘉奖奖励。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雷英，武清杨村人，原天津青年京剧团演员，主攻青衣，是张君秋先生的入门弟子。

1975 年，十二岁的小雷英凭着她迷人的嗓音和标致的身段，被天津市戏曲学校录取。

她的表演课从一入学就分在青衣组，启蒙老师是天津市京剧团的台柱子林玉梅老师。1976 年以后，戏校的专业教学恢复了以传统戏为主要内容。林老师发现雷英的嗓音格外脆亮，唱出的声音甜美圆润，这种嗓音天赋最适合唱梅派，在林老师的支持下，雷英的主攻方向从程派改到梅派上来。经过一个阶段的教学，雷英果然唱得流畅、自然，声乐天赋得到很好的发挥。

在雷英进入高年级的时候，学校又安排李近秋老师教她学演张派《四郎探母》、《春秋配》、《大保国·二进宫》等剧，为了重点培养这个剧坛新秀，尽力开拓雷英的戏路，学校还请来尚小云的大弟子孙荣蕙和孟宪老师分别指导她学演《金山寺》、《十三妹》、《昭君出塞》、《梅玉配》、《望江亭》等梅、尚、张多种流派剧目。更让雷英深感荣幸的是，学校安排她跟杨荣环老师重点工梅派，杨荣环是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拜梅兰芳先生为师、得过梅先生亲传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他教雷英学戏，唱腔、念白、表演全都一招一式地给她作示范，启发她按照自己的条件适当发挥。1980 年即将从戏校毕业的雷英，以杨荣环老师所亲授的《霸王别姬》参加天津市青少年演员基本功汇报演出。舞台上她把虞姬的人物形象塑造得别具一格，获得好评如潮。她被公认为戏校的高材生。这次汇演，她获得优秀表演奖。

80 年代，在天津戏校京剧演员进修班的基础上，创建了天津市青年京剧团，雷英为主要演员之一。雷英扮相端庄秀丽，雍容华贵，嗓音嘹亮甜美，在社会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1987 年天津青年京剧团在北京演出，雷英利用空闲时间三次到张君秋先生的琴师何顺信家里问艺。何先生见雷英学艺心切，态度诚恳，就把张派唱功的行腔规律、发声技巧、气口的掌握等耐心教

给她,雷英经过何老师的指点,得窥张派艺术的真谛,从而投拜张君秋大师的愿望更加迫切。1986年3月,天津日报社为庆祝张君秋舞台生活50周年邀集散落全国各地的张派优秀传人,在天津中国大戏院连续九天举办张派艺术展览演出,特邀雷英参加,与来自武汉的王婉华,山东的薛亚萍、张萍,北京的蔡英莲、杨淑蕊、关静兰,上海的孙淑珍,天津的张学敏、刘明珠、贵州的张晓虹等众多张门弟子和名家同台献艺。市长李瑞环以此为契机,向他的好友张君秋力荐雷英作他的徒弟。此前,张君秋曾经几次看过雷英演出,对她各方面专业条件都很满意,于是慨然应允,于当年3月7日借天津干部俱乐部举行了张君秋收雷英为徒仪式,当雷英把手捧的鲜花虔诚地敬献给师傅的那一刻起,她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她成为了张君秋先生第68位弟子,当年她23岁。

雷英在师父提携下,更加刻苦地钻研张派艺术。她还反复地跟随录音机学习师傅唱腔,琢磨其中的奥秘。在不长的时间里,她的张派修养日渐加深。就在她拜师那年的秋天,天津市举办首届戏剧节,青年京剧团拿雷英主演的张派《刘兰芝》参演。雷英运用婉转有致的歌唱和细腻传神的情绪动作,把一个人格温驯、饱受婆母欺凌却逆来顺受的古代妇女形象塑造得生动感人,她在这届戏剧节获得了优秀演员奖。此后不久,她再次登上北京的舞台,以嘹亮甜润的声腔、稳重大方的台步、深沉凝炼的表演、端庄秀丽的扮相,震动了首都剧坛,荣获了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天津戏剧界继王立军之后摘取的第二朵梅花。

1987年秋,天津青年京剧团首次赴香港演出,剧团以其青春朝气和整齐的行当,赢得当地观众高度关注。身为该团头牌旦角的雷英恰在妙龄,天生丽质,她扮演《凤还巢》里的程雪娥,一出场便光照舞台,魅力无限。她在与王立军、杨光合演的《野猪林》里扮演林娘子,香港媒体称赞她“使这台戏更具珠联璧合之美”。这一年她还获得了全国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优秀表演奖。

雷英在拜师后四年多的时间里,跟张君秋先生先后学习或者重新加工了《望江亭》、《状元媒》、《刘兰芝》等一批张派剧目。她在继承张派的同时还不放弃同样爱好的梅派,她请梅派名家沈小梅老师给她加工《凤还巢》这出戏,后来她又向梅葆玖先生请教,得到梅派后人嫡传。

雷英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如痴如醉,为了钻研某一出戏或者学习某一个表演技巧,有时竟至废寝忘食。她还喜欢读书,一有空闲便扎到书堆里,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以及中国的古文遗训,都成了她加深个人艺术修养的精神食粮。凭着在艺术长河中遨游的切身体验,她明白一个道理:修养浅薄的人成不了真正的艺术家。

就在雷英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剧坛上熠熠闪光的这颗明星突然从京剧舞台上销声匿迹。她远赴异国开辟新的领域,众多热爱她的戏曲艺术的戏迷们为她息影舞台倍感惋惜。一晃十多年过去,不想2005年10月,天津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在天津举办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85周年诞辰系列活动,久违舞台的雷英突然从海外赶来,于10月17日登上天津中国大戏院的舞台,扮演得之于恩师张君秋亲授的《状元媒》中的柴郡主,她在后台刚一搭架子,便得了个满堂的碰头彩。及至出场后,观众看到阔别舞台15个春秋的这位艺坛明星,听到她嗓音依然嘹亮甜美,看到她扮相依然典雅俊俏,一个个都从内心为她感到高兴。千余位观众为了表达对她的欢迎之情,几乎她每使一个花腔、每做一个表情动作都能获得一次喝彩,一场戏获得的掌声竟多达数十次之多!这种盛情是雷英出台前不曾预料到的,她为此激动得双手微颤,嗓音发

涩,心跳如同擂鼓,进入剧情许久还缓不过劲来。乡亲们给予的厚爱让她感觉无以为报,她在心里说:在外千般好,不如乡贤亲啊!

京剧名票、河北梆子天才张宝奎,1957年3月生于天津武清东马圈村。现为河北省任丘市文化馆干部、任丘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少年时,他就是村里京剧团的小演员,时常同大人们一起登台演出。1976年,十九岁的张宝奎凭着对京剧的酷爱与激情,到廊坊市报考京剧团。却正逢京剧团外出演出,于是,他又走进廊坊市河北梆子剧团,被“伯乐”一眼相中,成为一名专业剧团的正式演员,并很快成为团里的台柱子。1983年,他毅然离开廊坊河北梆子剧团,走进了唐山市京剧团,以圆自己多年向往的“京剧梦”。接着,他又先后拜中国京剧院邓少卿先生、中国戏曲学院刘国通教授为师,专攻老生。经过名师的指点和自己对京剧的感悟与刻苦训练,张宝奎在演唱艺术上有了明显提高。他音域宽、音色美,尤以高、甜、脆、柔见长,唱腔处理细腻、委婉,很快成为观众喜爱的京剧名角。

张宝奎京剧演唱艺术水平的提高,还得益于不辞劳苦的奔波演出。近年来,他经常同一些大型戏剧艺术团体的名角同台演出,切磋学习技艺,接受名家指点。他时常深入部队、油田、农村、基层,为普通战士、工人、农民演出。特别是接连不断地高规格的戏剧比赛,更使他有幸得到同行高手的点拨,艺术水平不断提高。

1996年至2002年的6年间,他先后荣获第四届、五届“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一等奖,并获得“中国京剧十大名票”和“功勋票友”称号。

优秀大武生黄齐峰,1976年3月出生于武清。他出身梨园世家,受家庭艺术氛围的影响,黄齐峰自幼就喜欢唱戏、唱歌。天生一副好嗓子,在杨村二小读小学时引起音乐老师张东生的注意。1988年秋,张老师陪同他,报考天津艺术学校,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最终脱颖而出,被天津艺术学校录取。

最初,黄齐峰学老生戏,学校根据他的嗓音宽亮、扮相俊美的条件,让他改学小生。经过祈荣奎、张春孝两位名家的调教,前后学了5年,成为尖子学员。长到十七岁,身体发育变声,戏校见他好动,考虑再三,再让他改学武生戏。黄齐峰虽感到“半路出家”要吃很多苦,但他热爱京剧艺术,听从安排,从头学起,开始了新的艺术征程。

大武生,是武生中较难演的一个行当,要求腰腿功夫好,扎大靠翻扑跌打功夫过硬。开打稍一不慎,会伤筋动骨。黄齐峰有一股刚强的倔劲,对老师说:“我已坐科5年,哪怕再学10年,再难再苦,我也要把大武生戏学好!”

潜心向京剧名家学习请教,是黄齐峰的家常饭。王金璐、李光、张春孝、苏德贵、杨少春、张幼麟、董文华、李景德、杨乃彭、王宝春、祁荣奎、刘希锐、郭秉新、郭文俊、曲咏春等老师都先后教过他,不光学艺,从他们身上还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2001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第四届全国京剧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黄齐峰以刘希锐老师教授的《火烧裴元庆》一剧勇夺金奖,同时获得大赛直播当中的每日一星称号,为当时的实验团赢得了此次大赛中唯一一枚宝贵的金奖。

2005 年秋，中央电视台再次举办“全国京剧青年演员大奖赛”。恰逢剧院奉派赴墨西哥、哥伦比亚等美洲国家演出。到底要不要报名去央视参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长辈、戏迷的热情鼓励下，黄齐峰毅然报名，以张幼麟教授的《金翅大鹏》一剧参赛，在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后，黄齐峰与因团里多数演员出国而临时组成的参赛小组表现出色，再次为实验团取得一枚金奖。

1994 年至 2006 年，黄齐峰作为当家武生，先后随团 10 次赴日本、香港、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在泰国演出很隆重，是向该国时年 80 岁的国王登基大典纪念庆贺演出。所到之处，观众热捧，为他推波助澜。

观众看了黄齐峰演出的拿手好戏《火烧裴元庆》、《金翅大鹏》、《闹天宫》、《武松打店》，兴奋异常，赞不绝口。他收到了数百封来信，年轻人说：“能看到同辈人演出这么优美的京剧，让我们了解了京剧，爱上了京剧。”老年人说：“黄齐峰条件全面，向大武生方向发展，以表演为主，太美妙了。”手机短信不断，每日要收到五六条或祝贺，或鼓励慰问，或提建议的内容。

2004 年东京电影节开幕，放映了由霍建起导演的中国故事片《暖》，黄齐峰在片中扮演一剧团武生。北京举办华表奖颁奖晚会，黄齐峰应邀向影视明星们表演耍锤。

2006 年，拍摄 40 集电视剧《采桑子》，曾导演《四世同堂》的林汝为邀请黄齐峰和他的艺校同学、“程派”青衣吕洋加盟，在剧中担纲主演，分别饰演民间艺人和大家闺秀，演绎了凄美的爱情故事。黄齐峰跻身影视圈，缘于他在京剧中的出色表演。

爱国京剧艺术家唐韵笙师傅唐景云，武清人，原系宝坻“永胜和”坐科，工刀马旦兼花旦。曾是河北梆子演员金刚钻的琴师，当年班主唐景云带领戏班到福州演出，他夫妇与主演恰在定居福州的原系清朝军官石秀川家院内借住，每日在此练功、吊嗓、排戏。石秀川次子石斌魁，自幼酷爱戏曲，这下更是“走火入魔”，天天在旁观看，还跟着比划，并帮助做些零杂活儿。唐景云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人又机灵，自己无儿无女，非常喜爱石斌奎，便产生收其为徒之念。通过试探询问，得知石斌魁非常愿意，在征得家里同意后，把石斌奎收为义子。就这样年仅 9 岁的小斌魁即告别亲人，踏上了艺术的道路，斌魁天资聪慧悟性好，又具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在唐景云的极力培育下，十三岁即于上海新新舞台演出汪笑侬、刘鸿声两派之戏，一炮而红。唐景云遂取笙管笛箫之悠扬韵味含意，将其艺名改为“唐韵笙”。

唐韵笙曾受汪笑侬、夏月润、潘月樵、冯子和等对京剧改良的影响，对他后来勇于创新，起到一定作用，他借鉴了旦角的唱腔，花脸的念白，武行的跌扑，恰到好处地揉进所演角色之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艺术才华。他文武兼精昆乱不挡，戏路宽绰，演技全面。他本工老生，且能武生、红生、大嗓小生、铜锤、架子花、老旦、彩旦乃至旦行，演来皆有独到之处，为内外行一致推崇。他在舞台上塑造角色之多，在京剧史上是少见的，而且还是一位集编、导、演、教于一身的全才艺术家，他常一晚演文武双出，并能三戏连演，由于他具有一定文化，熟读《三国》、《列国》、《东西汉》，编演了不少列国戏，被称为梨园才子，40 年代是唐韵笙的鼎盛之期，出神入化的精湛表演，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与麒麟童、马连良鼎足而立，被誉为“南麒、北马、关外唐”。

唐韵笙多才多艺，功底深厚，昆乱皆精，文武兼备。除去本工老生外，净、老旦，他都能演，是老生行当中的多面手，后随师唐景云在山东、河北、上海、东北等地演出。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东北享有盛名。

唐韵笙是一位爱国的艺术家，抗日战争时期因演出影射日寇的《后羿射日》而身陷囹圄。建国后曾任沈阳京剧院副院长，先后主演了《云罗山》《郑成功》《詹天佑》等新编历史剧。

京剧活动家高聘卿，1909年生于天津武清。20世纪30年代开始，先后经办宝利、国东以及北京的胜利和百代四家唱片公司，致力于京剧、地方戏、曲艺、音乐等唱片的灌制，为当时很多著名演员票友录下了精彩唱段，曾参加北京国剧学会。他对京剧史和京剧论的研究造诣很深，为弘扬民族戏曲，尤其是对京剧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高聘卿少年时期就酷爱京剧，私塾10年后，至哈尔滨慎昌洋行当业务员，同时参加“中东铁路俱乐部”，为会员，并向陈远亭、吴喜年、周喜增、李妙兰、南铁生等学戏，曾学过青衣，后改老生。还向言菊朋、马连良、余叔岩、徐兰沅、雷喜福等人请教过，并经常参加演出活动。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胜利唱片公司在哈尔滨成立分公司，聘高聘卿任副经理，是以经销唱片为主。后来调至天津宝利唱片公司任业务部长。在此期间对一些唱片厂家所灌的唱片高感到不妥当，如选材、选段、演员及唱片处理方面不适合，或有的音质不好、有的不是演员拿手唱段、有的不是著名演员等，高聘卿决心有机会组织灌唱片时一定灌制能流传百世的和具有特色的名唱段。

一二年后，高聘卿被调到北京为成立国乐唱片公司做准备工作，又曾至日本学习灌制唱片的音质和音响的处理。

1933年，在宝利唱片公司的协助下，高聘卿带领一批演员及名票到日本东遗言灌制唱片，这些演员是：评剧演员爱莲君、爱三侠，河北梆子演员秦风云、王金城等，京剧票友孟广亨、乐朴荪、张吾翼、顾珏荪等，为国乐公司灌制了第一批唱片。所有唱片的音质、音响、选段，全部由高亲自掌握。这批唱片心上印有“宝利公司贡献”字。

1937年，国乐唱片公司在北京正式成立，经理为日本人，高聘卿任文艺部主任，地点在北京景山后街。收音所（即灌音室）在和平门内东栓马桩，即当时的“中央广播协会”（会长是周大文）。国乐公司总部在日本东京，唱片厂在日本横滨。国乐唱片不报场，音质好、音量大，就是很旧的唱片音量也很大。高聘卿说，灌唱片就灌名人名唱，或特点突出的剧目，或没有人灌过的戏。

国乐公司成立后曾为京剧演员言菊朋、马连良、余叔岩、李万春、金少山、李多奎、萧长华、诸茹香、裘盛戎、马德成、李少春、程砚秋、荀慧生、奚啸伯、陈丽芳、谭富英、周啸天、李世芳、宋德珠、毛世来、艾世菊、吴素秋、陈少霖、王泉奎、小杨月楼、万啸甫、杨菊秋、杨菊芬、管绍华、韩世昌、高聘卿、酆缙云、茹富蕙等灌过唱片。曲艺演员有王佩臣、刘宝全、小彩舞、小蘑菇、赵佩茹等，还有其他地方戏、音乐等唱片。

国乐唱片公司从1937年至1939年，三年间灌制了不少当时成名的演员的精彩唱段，共

约 400 张；1940 年结业，全部设备、模版等转让给太平唱片公司。1940 年，高聘卿被聘为“华北演艺协会”剧务科科长，当时的会长是周大文。

1941 年，胜利唱片公司聘高聘卿到北京胜利公司任副经理。百代公司相继聘高为该公司顾问。两家唱片公司合用一个灌音室——百代公司灌音室。灌片内容、演员、音质都由高负责。此间又为一些名演员灌制了不少剧目的名唱段。有马连良、言慧珠、奚啸伯、金少山、李多奎、萧长华、马富禄、陈少霖、姜妙香、程砚秋等，评剧如喜彩莲等，为当时在北方的名演员留下了宝贵的音响资料。

胜利、百代公司于 1945 年结束。高聘卿后到沈阳中央信托局工作，1950 年到太原建筑工程部工作，直至退休。

1945 年至 1965 年，高聘卿收藏并整理出大量京剧资料，著有京剧史、京剧理论研究及名京剧演员表演艺术浅谈等 30 余万字，准备出版，不幸“文革”期间被焚毁。“文革”后，又通过回忆重写，但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仅写出部分资料，尚待整理。

高聘卿退休后，曾为很多京剧票友、爱好者和业余京剧团说戏，排戏，进行艺术指导，还改编京剧剧本《南天门》等。退休后住在天津市南开区，每日饮酒自得，唯红星二锅头，佐以西红柿几片、花生一小碟。为人谦逊和善。津门一以老唱片为业者，尝从彼处借得若干珍贵资料，借而不还，流失不闻矣。与名琴票从鸿逵住处仅隔三个路口，但二人皆八十开外，腿脚不便，神交而终未谋面。1997 年因病卒于养老院，终年 88 岁。

程派传人张巨萍，1958 年 2 月 17 日生于南蔡村郭庄村，1972 年考入甘肃省京剧团，现为北京京剧团程派青衣，国家二级演员，1983 年在北京进修，毕业于北京市戏曲学校，授业于贾士珍、张玉英、李文敏、王吟秋、李丹霖等老师，后求教于著名程派青衣李世济老师。她嗓音宽亮醇厚，演唱婉转优美，气度从容，颇具程派神韵。曾主演《红鬃烈马》、《锁麟囊》、《六月雪》等传统剧目。1991 年获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荧屏奖，1992 年获北京市青年戏曲演员汇演最佳表演奖。

京剧演员曹建红，1984 年 12 月 18 日出生，女，京剧老旦。生在天津武清一个工人家庭，母亲是一个酷爱艺术的业余文艺爱好者。

在父母的支持下，1996 年考入天津市艺术学校京剧班。师从姜志军老师。在校期间，学习了《钓金龟》（含《行路哭灵》）、《望儿楼》、《遇皇后》、《打龙袍》、《赤桑镇》、《六月雪》、《罢宴》、《四郎探母》、《秦香莲》等剧目中的老旦应工。

2002 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准在天津市艺术学校圆满结业。为了能在艺术的道路上向前迈步，2002 年她在天津市艺术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下，顺利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曲舞蹈分院深造。在上海戏剧学院，王梦云老师主动请缨，担任了建红的专业导师。王老师言传身教，一段唱腔、一个身段的捉肘教习，至此让其得到了她《岳母刺字》、《罢宴》、《李逵探母》、《赤桑镇》、《徐母骂曹》、《沙家浜》、《朱痕记》、《甘露寺》、《桑园会》、《凤还巢》、《捧印》、《大登殿》等剧目中老旦表演的许多真传。

2005 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舞蹈分院毕业后，得到了重庆市京剧团领导和京剧同仁们的接纳，成为重庆市京剧团的一名青年老旦演员。

说到梨园人，还要提到一位主要从事戏曲美学和戏曲文学方面研究的武清籍专家吴毓华。

吴毓华，曾用名吴毓骅，笔名吴文梓。研究员，1937 年 3 月 1 日生于天津武清朱家码头村，共产党员。1961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获哲学学士学位。1961 年 9 月分配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工作。1978 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工作，至 1998 年 10 月退休。先后在戏曲史研究室、戏曲文学研究室从事戏曲研究。1991 年起担任戏曲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学会理事、文艺人才研究会理事。

主要从事戏曲美学和戏曲文学方面的研究，着重从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着手，摸索出戏曲美学和戏曲文学发展的脉络，从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与戏曲艺术的渊源关系上，总结戏曲美学的发展规律。并密切关注当代戏曲发展，着重从戏曲文学角度进行研究。近几年着重从美学文化学方面研究京剧，总结近代戏曲美学的发展规律。

吴毓华多年来著述颇丰，共发表研究著述 6 种和 120 余篇论文，共约 230 余万字。计有：《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1990 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传统戏曲研究资料丛书·说唐三传》1989 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与人合作）1992 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古代戏曲美学史》1994 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中华传统文化大观·古典戏曲》1993 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国伦理学大百科全书·职业道德卷·艺术伦理学》1993 年 12 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已发表的论文、评论共 120 余篇，共 70 余万字，主要有《试论元杂剧清官戏的思想意义》，载《戏曲研究》第 1 辑；《古曲戏曲剧目的道德价值》，载《戏曲研究》第 11 辑；《戏曲序跋的美学价值》，载《戏曲研究》第 16 辑；《要突破传统的典型观》，载《新剧本》1985 年第 6 期；《论戏曲艺术的寓言性特征》，载《戏剧》1985 年冬季号；《艺术伦理学初探》，载《艺术研究》1989 年冬季号；《戏曲美学探源》，载《艺术研究》1990 年夏季号；《风神美韵自高绝》，载《戏曲研究》38 辑；《戏曲意象论在明代的开拓》，载《戏曲研究》45 辑；《情的观念在晚明的异变》，载《戏剧艺术》1993 年 4 期；《清初戏曲美学由情向理的反复》，载《艺术研究》1993 年 3 期；《明代的心灵觉醒与唯情论》，载《戏曲研究》48 辑；《简论戏曲艺术的平民化》，载《戏剧艺术》1998 年第 4 期，等等。

提到梨园武清人，就不得不提到与武清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梨园界人物，一个是民国时代的女伶刘喜奎，另一个则是评剧女皇白玉霜。

民国时代的女伶刘喜奎，五位总统都不嫁，却嫁给了一个小小军卒崔承炽，崔承炽武清杨村人，其原因，只是因崔承炽在报纸上揭发了他上司的贪污行径，赢得民众好评，刘喜奎钦佩这个男人的敢做敢言，因而托付了终身。这样的事情，如今听起来特别遥远，的确，这已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了。

刘喜奎生于清朝末年的天津，红于二十世纪初，当时曾与鲜灵芝和玉兰并称为“女伶

三杰”，是一位著名的河北梆子兼演京剧的女演员。民国初年，在京津两地，她的戏场场爆满，票价竟然一时盖过了谭鑫培。在梨园界，一度传出了“男有梅兰芳，女有刘喜奎”的佳话。

刘喜奎身材小巧玲珑，眉目如画，气质尤其高雅清丽，打扮起来特别漂亮，与她配戏的尽是精挑细选的美人坯子，她未出场时，满台都是莺莺燕燕，个个美如天仙，令人目不暇接。一到刘喜奎登场，一声婉转娇啼，唱腔圆润，与她配戏的坤伶们相形之下，就都变成了庸脂俗粉。为她着迷的上至达官贵人，中有士绅名流，下至贩夫走卒，真是轰动九城，颠倒众生。有一次，一个“粉丝”闹出了大动静。那年，刘喜奎于北平三庆园挂头牌演出《独占花魁》一剧时，场场都是观者如山，一天散戏以后，有人趁散戏时冒险闯到前边强吻她，后被警察以“调戏妇女”为名罚款五十银元，据说这个人竟是当时的执政段祺瑞的内侄，这件事曾是当时各大小报的八卦头条。

当然，红坤伶的头牌位置，也给她带来了太多的诱惑和麻烦。历史上有名的“辫帅”张勋，民国二年在北京江西会馆做寿，京津名伶一概召齐。演戏期间，张勋对刘喜奎垂涎不已，软硬兼施，非要纳她为妾，刘喜奎被逼无奈之下，开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张勋要把嘴上的胡子全部剃光；第二，力行“一夫一妻制”，张大帅要立即赶走全部姨太太，保证今后不再纳妾；第三，让张勋提供爱情保证金 20 万块大洋。不想这么苛刻的条件，张勋竟然答应了，可见张勋是真看上刘喜奎了！可刘喜奎根本不想嫁给这个大帅。万幸的是，就在张勋还没最后咬牙准备剃掉胡子的当口儿，段祺瑞组织的“讨逆军”开进了北京，张勋慌忙出逃了。

虎去狼来，后来凡是看过刘喜奎戏的津京政要们没有一个不对刘喜奎垂涎三尺，段祺瑞叔侄，大总统袁世凯父子，还有黎元洪，甚至连六十岁的曹锟也盯上了刘喜奎，还采取银洋攻势，白花花的银洋，一筐筐送到骡马街刘家，刘家父母对曹锟要娶刘喜奎为妾的要求早已点头应允。但是刘喜奎以死抵拒，后来多亏了崔承炽急急地找到曹锟的夫人刘氏，向她求情，而曹锟又是出了名的怕夫人，这样刘喜奎才得以逃出曹锟的手掌。

刘喜奎是怎么相识和嫁给了当时只是内务部小职员的崔承炽的呢？据说，刘喜奎每次唱完晚戏，总有一辆车跟在她的车后边，你快他就快，你慢他也慢，在暗中保护着她。这位“护花使者”就是崔承炽。

两个人婚后定居在天津，并育有一子，后来崔承炽于民国十三年病歿于天津，刘喜奎从此以后再没有登舞台，在每日的诵经读书中守寡度日。谁会想到这样一个守节的女人竟是当年面对千两黄金岿然不动的“武艳亲王”呢？

对爱情的坚守是最令人感动的故事，刘喜奎以她对爱情的坚贞，向人们展示了一代名伶的传奇人生。

白玉霜在三里铺

1937 年 2 月，一条爆炸性新闻轰动上海滩，评剧女皇白玉霜突然失踪。当时，关于她的传闻很多，被害说、被拐说等等，不一而足。而实际上，白玉霜是与玉顺班打饶钹的李长生到武清乡下种田去了。

白玉霜，原名李桂珍，又名李慧敏，是莲花落艺人李景春之女。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1907年生于天津，她11岁初开始学京韵大鼓，14岁拜老艺人孙凤鸣为师改学评剧，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先后在北平、上海、南京和天津等地演出。代表剧目有《秦香莲》、《杨三姐告状》、《桃花庵》、《马寡妇开店》等，她还与京剧演员赵如泉合演过京评两腔的《潘金莲》及电影《海棠红》等。她的唱腔低回婉转，音色纯正，鼻音共鸣好，中底音宽厚圆润，富于抒情性。同时创造了低弦低唱的演唱方法，形成了评剧的“白派”表演艺术，上世纪30年代与刘翠霞、李金顺、爱莲君并称评剧“四大名旦”。

李长生，是武清三里铺（现黄庄街南三里屯村，在杨村火车站以南不足三百米）人，父亲早亡，母亲失明。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很有几分书生气。十一岁独自离家到天津谋生。一开始，在天津某梆子戏班跑龙套，闲在的时候，跟底包学打铙钹。1932年春，二十四岁的李长生进了白玉霜的玉顺社，此后便长期跟随白玉霜在京津两地演出。白玉霜对李长生的表现很满意，除按月给他包银外，还经常给点“茶钱”和“烟钱”。

1936年初，白玉霜因演出评戏《潘金莲》和电影《海棠红》成功而轰动了上海滩，被冠以“电影明星”和“评剧皇后”的头衔。紧接着一些绯闻也接踵而至。恰在此时，报纸上又传来一代影星阮玲玉自杀的消息，白玉霜感到，在演艺圈子里混，即便是明星，也难以摆脱“供有钱有势人任意玩弄的命运”。从阮玲玉的不幸遭遇，白玉霜仿佛也看到自己将来的结局。于是萌生了离开演艺舞台，找一个靠得住、听话的人陪着，到一个没有人认识自己的地方，过几年清静日子的想法。

1937年2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白玉霜与玉顺社的铙钹手李长生“私奔”，她们先由上海乘火车到南京，后又转车继续北上杨村。在李长生的老家三里铺，夫妇间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白玉霜让李长生买了十几亩地，原想自己种地，可没多久就受不了，只好雇人管理。不甘寂寞的白玉霜又逼着李长生开了一间豆腐坊，李长生天天起五更推碾子磨豆腐，白玉霜则换上一身农家衣服，走街串巷卖豆腐。每逢农历一、四、七杨村集的时候，俩人便一同赶集市去卖。没有集的时候驾着马车到龙凤河、北运河去兜风，还跑到村外土坡树林子里逮蝈蝈、摘酸枣。不久，白玉霜出资盖了三间大瓦房，村上的人都说，李长生是在外面发了大财，此番回来是报孝老母的。1937年8月，在养母李卞氏的诱骗下，白玉霜被迫离开了三里铺，重新开始了她的舞台生活。

在三里铺的半年多时间，是白玉霜一生当中最难得、最幸福、最太平的时光，善良的村民，淳朴的民风，一望无际的黄土地，离开三里铺多年后，白玉霜仍然念念不忘。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朱相臣（1908—1971）。生于武清。自幼家境贫穷，为张庆森代拉师弟，属于何少亭门下。在东北曾与许多相声演员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返津，在南市连兴茶社演出，1947年与郭荣起合作，在群英戏院演出。同年又拜张寿臣为师，艺术不断得到深造。与郭荣起合作的《打牌论》、《汾河湾》、《拉洋片》、《怯拉车》等段相声都取得轰动的效果。1953年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1956年与苏文茂合作，使其艺术得到进一步发挥，演出相声《论捧逗》、《批三国》、《文章会》等，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朱相臣为相声捧眼演员，以语言含蓄为特点，善于使用“蔫包袱”，令人听后回味无穷，取得强烈的剧场效果。1971年病故于天津南郊。其弟子有蔡培生、师胜杰等。

快板书大师李润杰，原名玉奎，艺名宝珊。1917年生于武清城关大桃园村。早年的李润杰家境贫穷，解放前一直过着卖艺乞讨的生活。全国解放以后，他成为天津市广播艺术团的专业文艺工作者，走上了艺术之路，专攻快板书创作、表演。李润杰敬业爱岗，坚持传统艺术与创新时代艺术相结合，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努力，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艺术大师，为快板书的创立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他创作表演的《千锤百炼》、《劫刑车》等百余段力作感情充沛、质朴醇厚、形象生动、幽默犀利、字正腔圆、声韵脆美，被人们广为流传。他曾担任过天津市曲协副主席，并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工作者，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他还连续当选为全国三、四、五届人大代表，赢得了人们的热情拥戴。1990年10月11日，李润杰在天津逝世，享年73岁。

著名相声演员师胜杰，祖籍武清杨村镇，1953年4月出生，汉族，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黑龙江省曲协名誉主席，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国家一级演员。师胜杰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潜心钻研相声艺术，成就显著。创作表演的相声作品曾分获全国曲艺调演、文化部作品评比、全国相声新作比赛、首届中国艺术节一等奖。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和“心连心”艺术团，积极参加抗洪救灾等慰问演出，经常深入基层为群众服务，以实际行动落实“三贴近”的要求。被评为黑龙江省劳动模范、黑龙江省德艺双馨艺术家。

著名相声演员王谦祥，1948年2月出生于武清城关大桃园，现为国家一级演员。1960年入北京市曲艺团学艺。1984年师承相声巨匠马季，长期与捧哏名家李增瑞合作。任中国煤矿文工团曲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他的基本功扎实，说唱俱佳，感情充沛，格调清新、诙谐、富于艺术魅力。他的主要作品有《风灾》、《驯马专家》、《叔嫂情》、《方言外语》、《换包装》等。

2003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演出时，他们合作演出的《方言外语》，即用中国方言讲英语，受到外国驻澳大使、领事们的欢迎，美国驻澳大使握住他的手连连称赞：“你讲的英语太好了，到我们国家最高学府去教英语好了。”有播种就有收获。王谦祥凭着天分和自己的勤奋努力，在艺术事业上结出丰硕果实。他先后荣获文化部全国曲艺节目调演表演一等奖、北京国庆40周年征文比赛创作、表演双一等奖、文化部“金狮杯”表演一等奖、文化部第九届“文华奖”表演奖。

据著名作曲家赵玉兴撰写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坻评剧》一书记载，民国初年，西路评剧，武清县“周墨清班”较有声望的演员有会瑞德（艺名小白薯）、刘子琢、武金红、段志贵（艺名盖京东）、段贵芳（后给爱莲君配戏）、穆金凤、元志古（姓陈）等。一般平调梆班八、九个人，有七忙八不忙之说。最大的班十多个人。武清桑园、大务、小王古庄等，这些子弟都是高良田传授。像刘凤起（小生，武清小王古庄人）。评剧武清的“德月和班”也很负盛名。评剧名伶吴寿朋，艺名小元宝，1901年生于武清县，工旦。前唱西路蹦蹦戏，后改唱东路。授徒喜彩莲、邢韶英等。喜彩莲再收徒小喜彩莲、李忆兰等。王傻子，杨村人。前唱西路戏，后改东路戏。刘小香，艺名大香蕉，女，工旦，杨村人，在天津与王守成结为

夫妇后，辗转于外埠。还有白广杰，艺名白菜心，杨村河北梆子演员田百岁等在当时也是较有影响的艺人。

同治十一年，署名晟溪养浩主人者所撰《戏园竹枝词》20首，和署名云间最不羁生的《梨园竹枝词》，均对清同治、光绪年间在上海献艺的天津梨园界名伶多有详细评述，如“一盏灯来风月谱，宝林情态更娇憨，若从梆子论真派，所到首推太谷三。”第四句里的太谷三，就是武清人，当年在上海也享有很高声誉。

戏曲评论家孙点，署名顽石撰写的《梨园声价录》，对同治初年至光绪初年这十余年间，常见诸上海戏台上的153位皮黄和梆子艺人所作点评与介绍。这本书以简洁、生动的文字，对所选演员按扮行当，分别以上品、中品、次品三档逐一评论，每位艺人的别署、籍贯、师承、擅演剧目及角色能详尽详。在这些艺人中，若以作者标记为准，天津籍占很大比重。如武旦上品者2位，其中之一韩桂喜为天津武清人，他是清同治年间天津梆子艺人在上海唱红的主要名伶，从而使河北梆子在外地产生了较大影响。

王殿臣，是原双树上九百户村人，早年师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瑶卿，唱念做打、执板拉弦样样精通。他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交谊甚深，二人在给一个军阀唱堂会时，因志趣相投结为“口盟”。后因年事渐高，淡出了北京梨园界。

回乡后被河西务京剧团聘为艺术指导培养了大批京剧人才。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指导的河西务京剧团曾到天津中国大戏院登台票戏，在天津梨园界轰动一时。

武清为有这些“梨园名人”的老乡而自豪，也从中感受到武清有可充分挖掘与利用的“文化软实力”，武清被人们称为梨园沃土当之无愧。

后记

作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的我，总想把在各条战线做出突出成绩的武清人呈现给后人，《天津日报·武清资讯》“武清人”栏目给了我一个平台，之后，该报总编高元勃先生集结出版了《武清人》一书。后来，我又参与了区政协《武清人物》的编写工作。读罢两本书，心情总是不平静，因为据我掌握的资料，武清仍有相当一部分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人物，因为种种原因，没被列入这两本书中。作为一名武清土生土长且爱好文字写作的我，有责任有义务将这些富于时代精神的人物，通过文字的形式展现出来，目的是让这种武清精神发扬光大，以激励后人。

利用三年多的时间，采访这些有影响的武清人，确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没有其他嗜好，假日出去采访名人成了我工作之外最大的乐趣，一年中数次上京下卫，走南闯北，深夜里挑灯夜张，平日电话沟通联系，在外采访，街头小馆仓促一顿，有时干脆忍饥挨饿，虽然苦点，但收获的是精神慰藉，这是金钱所不能买来的，情趣爱好，相得益彰，也就不觉得苦和累了。有人说，人生最大的财富就是精神富有，确实是这个道理。我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我坚持用自己手中的笔，书写我的父老乡亲，书写我可亲可爱的武清人。

采访过程中，我也曾遇到过不少国宝级的武清人。他们是国家的英才，是武清的财富，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从他们身上，不但学到了武清人永不服输的精神，而且学到了很多知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在采访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编剧蓝荫海先生时，老人家给我提供了在外有影响的武清人数名。这位曾经与焦菊隐、老舍、曹禺等名家共同工作生活，并受到周恩来、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的老剧作家，年高德劭，得知我正在搜集整理有关武清民风民俗和历史掌故时，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了旧时武清的民俗，使我受益匪浅。在采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春华时，将我刊登在《运河》杂志上写他的文章送到他手上时，老人动情地流下了热泪，说：“我在外演了几十年的戏，可却没给家乡演过一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要不是我年纪大了，我真想回去给乡亲们演上几天。告诉武清的乡亲们，我张春华心里惦记着他们。”电话采访台湾国学大师、著名学者张家麟先生后，他得知我是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就免费给我寄来了他的领导干部讲座光盘，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武清父老的期望。在采访开国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时，其子李亚军将其父亲全部资料寄过来，嘱我在家乡的报刊上刊登一下，来弘扬先辈的精神。一次次感人的采访，一次次动人的场面，饱含着乡情，饱含着眷恋，饱含着游子对家乡的召唤，也感动着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清后生，我没有理由不把他们写出来，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的事迹展现给后人。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天津近代收藏家、我的文友侯福志先生为本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特别感谢区委袁桐利书记为本书书写了书名，特别感谢副区长、区文联主席李伯怀同志为本书书写了精彩的序。

在采访过程中，因为工作环境等原因，许多优秀的武清人未被列入此书。比如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杜希平，总政治部办公厅副秘书长、少将李凤山，军医博导王兆元，中国第

一冶金建设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苑玉成，人造花工艺师赵松海，我国制浆造纸专业的创建人萧连波，著名导演薛英俊等一批名流，在此表示歉意。集结此书，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是众多优秀武清人中的代表。

由于自己的水平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在书写过程中，避免不了出现纰漏和不足之处，恳请诸方家赐教。但我想，这本书只要能为武清发展建设起到一点点作用，证明我的一点心血就没白费。

2010年9月10日于武清育德草堂